

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言論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597

院所

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言論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1966年·北京

· 內 部 讀 物 ·

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冒險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號)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20 元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frac{1}{4}$ · 字数 208,000

1966 年 3 月第一版 1966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815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1964年7月，已经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内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党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陆续分册出版，以供读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保加利亚共产党自1963年7月15日至1964年10月的材料，共計五十二篇。书中的小标题和异体字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工人事业报》社論： 为社会主义和和平的一貫的列宁主义政策	1
拉·托多洛娃： 全世界的母亲热烈支持苏共的政策(节譯)	5
《新时代》杂志社論： 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6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让列宁主义的旗帜更高地飄揚起来！	22
托·日夫科夫： 在铁路員工节庆祝会上的讲话(节譯)	37
尼·伊里巴扎科夫： 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左傾”学究主义和冒险主义	39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 月 1 日声明	51
《工人事业报》社論： 忠于列宁的党，反对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	72
保加利亚通訊社的声明	75
迪·迪莫夫： 在亚姆保尔市一家新建的“童佳”紡织厂开幕 式上的讲话(节譯)	79
托·巴甫洛夫： 沒有邏輯！	80
《工人事业报》社論： 充当着“狂人”右翼的角色	89

《工人事业报》社論：	
为伟大的目标服务的政策(节譯).....	91
托·甘切夫：	
我們的时代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針.....	92
密·格里戈洛夫：	
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胜利的源泉(节譯) ...	100
格·皮林斯基：	
广島會議(节譯)	106
保共中央就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給	
全国人民的賀詞(节譯)	107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而团結起来(节譯)...	108
《工人事业报》国际評論：	
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	109
尼·伊里巴扎科夫：	
世界革命的进程与和平共处(节譯)	111
鮑·鮑日科夫：	
当代世界矛盾的辯证法和中國教条主义(节譯) ...	114
伊·米哈伊洛夫：	
在米哈伊洛夫格勒举行的庆祝保加利亚九月	
起义四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节譯)	117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离开正确的	
列宁主义道路！	120
瓦·伊万諾夫：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发展和中国領導人	
的教条主义(节譯)	123

留·斯托揚諾夫：	
世界革命之反面(节譯)	128
彼·庫宁：	
爭取裁軍与和平的战士的坚强堡垒	131
薩·加諾夫斯基：	
和平共处和階級斗争(节譯)	135
托·伏洛夫：	
在“自力更生”幌子下的民族主义(节譯)	142
卢·彼特罗夫：	
严重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利益	144
瓦·伊万諾夫：	
現时代的性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155
恩·雅赫叶尔：	
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当代	
的主要矛盾	173
《党的生活》杂志編輯部文章：	
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和中国领导人对个人	
迷信的辯护(节譯)	183
彼·魯謝夫：	
党的发展問題与現代教条主义	185
柳·格奧尔基耶夫：	
反对经济理論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論(节譯) ...	205
雅·拉代夫：	
社会主义国家問題	224
《工人事业报》社論：	
在反对分裂主义者的斗争中我們將	
加强团結一致	242

保共中央三月全會的決議	246
格·鮑科夫： 誹謗者和派別分子在共產黨員的法庭面前 （節譯）	253
薩·加諾夫斯基： 中國修正主義的哲學基礎（節譯）	254
維·多布里揚諾夫： 個人迷信思想的保衛者和傳播者（節譯）	258
勒·阿夫拉莫夫： 沿着格·季米特洛夫的道路，走向保加利亞 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 （節譯）	261
伊·多涅夫： 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柱和可靠的盾牌（節譯）	262
《工人事業報》社論： 爭取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團結！	265
鮑·彼得科夫： 中國領導人阻撓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 （節譯）	268
保共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意識形態委員會 擴大會議的材料： 蘇聯共產黨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旗手（節譯）	271
《人民軍報》編輯部文章： 在藝術上也是庸俗化者（節譯）	272
——中國領導人在文藝方面的特殊方針	
《工人事業報》社論：	

召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會議：	275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中国领导人的两面性、自相矛盾和十分	
无原則性(节譯)	278
《工人事业报》評論：	
北京玩忽各国人民的命运	280
托·日夫科夫：	
在保德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講話(节譯)	284
科·巴伊琴斯基：	
第一国际的遺訓(节譯)	285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卓越的紀念日(节譯)	286

为社会主义和和平的一貫的 列宁主义政策

《工人專業报》社論

报纸上发表了特别重要的党的文件——苏共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一文件针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14日的信件，論据充分地 and 精辟地阐述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基本問題上一貫的列宁主义政策。它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閱讀它。它获得了我国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热烈的支持。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同中共领导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共同方針的、沒有根据的、誹謗性的攻击和顛覆活动完全相反，它从头至尾充滿了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充滿了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团结的关怀，表达了苏联人民以及为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客觀地和合情合理地阐述了中国领导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之間的分歧的真象。列举的事实和解释令人信服地表明，苏共曾尽了一切可能来防止产生的分歧，恢复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原則观点的一致。其他的兄弟党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但是，中国领导藐視共同利益，继续执行自己的錯誤方針和加深自己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差异。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指出，在1960年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會議上，中国代表团固执地坚持自己

的錯誤观点，只是在出現了它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才签署了声明。之后，中国领导不是恪守声明的精神和文字，而是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越陷越深，开始越来越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组织的活动和国与国之間关系上。

同中共领导的分歧和爭論的实质是当代各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問題；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問題；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中国领导人頑固地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1957年、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文件关于这些問題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办法。

不能不指出的是，他們对和平与战争問題的不正确的、极端有害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点的理解。苏共和兄弟党认为，防止战争是完全现实的任务。但是，中国同志的立場正在解除和平战士的武装，因为照他們的論点看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避免。他們认为牺牲亿万人是容許的，說什么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也就是在热核战争以后，“将建成美好的未来”。但是，各国人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尽一切可能防止新战争，各兄弟党的責任是，实现和平共处政策来证明人民的这些希望。

中共领导在关于資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与方法的問題上和民族解放运动、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上，同兄弟党相对立。它竟然这样用荒唐的、駭人听聞的断言，誹謗苏共拒絕支持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不是別人，正是中国同志以自己的“总路线”执行着錯誤的、既对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害、也对民族解放运动有害的方針。苏共和兄弟党一向強調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它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

条件之一，是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联盟和进行合作。

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有充分地强调指出，中共领导人在基本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理论竭力把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并破坏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团结。中国领导人的实践就是根据这种“理论”的，他们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援助。

依靠苏联的巨大和无私的帮助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发展的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就确信，要使社会主义得到胜利的发展，必须走使它们紧密团结和全面加强兄弟合作的道路。

紧密团结在以党中央委员会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周围的我国劳动人民，再次表示对伟大的苏共的热烈支持，表示自己同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表示自己的热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他们之所以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是因为这封信充满着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真理，是因为它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表达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和为加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愿望。

正如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一再指出的，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培养起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几十年来一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伟大的列宁党保持牢不可破的一致、团结和兄弟情谊。对他们来说，对苏共和苏联的态度一直是检验他们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我们

同苏共的团结是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因为苏共坚定地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高举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胜利的旗帜。

(译自1963年7月17日保《工人事业报》)

全世界的母亲热烈支持

苏共的政策(节译)

拉·托多洛娃

中共领导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是极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例如:中国领导人反对和平共处、反对爭取和平与裁軍的斗争,认为保卫和平的斗争和和平共处政策无助于提高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威信,使之成为吸引本国劳动者的一种力量和去团结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力量。

不久前,在和平的首都——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是这条路线的正确的证明。出席这次大会来自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和一百三十个组织的代表。很遺憾,中共领导人不擇手段地企图搞垮这次大会。中国代表对于苏联妇女、世界上第一个女宇宙航行員瓦·捷列什科娃的神話般的功績只字不提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惊讶和費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极端錯誤地认为各国人民准备去自杀。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千百万普通人都要求活着,不願意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所以他們热烈支持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譯自1963年7月17日保《工人事业报》)

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

《新时代》杂志社論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今年7月14日公布了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14日信件中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問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个文件貫串着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精神，充滿着对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怀、对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关怀、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以及对维护与巩固和平的关怀。因此它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贊同和积极支持，得到了坚决站在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爭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贊同和积极支持。

保加利亚共产党高度评价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意义。保共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开信中所闡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因为这也是它的路线。这封信的突出特点是始終如一地捍卫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与通过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間的分歧并不是在一些不大重要問題上的分歧。这些問題涉及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涉及到对于当代基本問題的理論观点和政治观点，諸

如：和平与战争、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与发展、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问题。

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党、工人党的两次莫斯科会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增添了許多新的原理和结论。这些新的原理和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新阶段。对这些问题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同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原则性的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向前进展、并且在实践中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时候，中国同志现在却想把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路线强加于它，使工人运动向后倒退。这样，他们就与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作出的最重要的结论相对抗，并提出了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各兄弟党曾以巨大的耐心，委婉而妥善地对待中国同志的错误。早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试图同中共领导人讨论所发生的分歧。但是，中共领导漠视来自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方面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摒弃了中共领导的错误主张和行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但是，当代表团知道得不到支持而且可能完全被孤立的时候，才被迫签署了声明。当然，现在弄清楚了，中共领导在声明上签字，并不是真心诚意的。会议后不久，中共领导就更加积极地宣传和传播自己的特殊观点。为此，还利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

苏共中央为消除分歧，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了最大的努力。根据苏共中央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倡议，组织了与中共领导人的集体会见和双方的会见，以便找出克服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观点的途径。尽管如此，中国领导同志却继续公开维护和加深自己的错误观点，在许多共产党的队伍中竭力制造派别斗争。

我们党对近年来由于中国同志背离莫斯科会议共同通过的路线而引起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极为关切。我们党曾积极促进与中国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达成谅解。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会议上，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我们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此外，中央委员会特地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不同意中国领导人背离莫斯科会议决议的一系列观点和行为。

中国领导人力图以自己的路线和对当代基本问题极为错误的观点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方针相对抗，指责大多数共产党，其中首先指责伟大的苏联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害怕帝国主义”等等。

中国领导人喜欢教训别人应该用阶级观点评价各种事件。但是，当他们不知羞耻地诬蔑其他兄弟党的时候，又表现出了怎样的阶级观点呢？现在，他们正在对列宁的伟大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对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毫无根据的、诬蔑性的、是共产党人所不应提出的指责。他们指责其他共产党从属于苏共，影射兄弟党“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转。他们这样作，实质上是利用反共主义的思想武器。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坚决摒弃中共中央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

的列宁主义政策以及对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这些攻击的目的在于降低苏共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先鋒作用，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們党严格地尊重并且遵循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遗言：“除了对苏联的态度，此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另一种更为正确的标准来确定誰是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誰是敌人，誰是民主与和平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格·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警告涉及所有口头上老說自己是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是馬克思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拥护者，而行动上却阻碍人民群众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

中国同志喜欢教訓其他兄弟党要善于把表現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相应各国的具体特点相結合。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个正确的要求同他們的立場統一起来呢！他們认为，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是一个党的決議，因而对其他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沒有任何意义。众所周知，苏共这些代表大会的決議是十月革命路线的继续，它們体现出民族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真理对所有国家都是有效的。可是現在我們了解到，中国领导不同意这一点。它宁願夸耀并且实行某种“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是想摒弃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而代之以狹隘的民族主义嗎？

在中国领导詭辯地、歪曲地援引共产主义运动所通过的文件中的公式和論点、粗暴地歪曲各国共产党的立場的背后，存在着中国同志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許多重要問題上的真正差异。这些差异最終归結为：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以及如何在今日条件下运用它？

对现代的分析，是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正如大家从莫斯科会议声明中所知道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是两个对立体系斗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革命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现在开始决定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决定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从这里产生了解决现代问题的许多重要结论。

但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信中默默不提对现代的这一分析。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識的。他们认为，现代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志为了把这个根本错误的看法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观点加以兜售，硬说各兄弟党否认了当代世界其他矛盾的作用：垄断资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之间的矛盾。但是，既忠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又否认或者低估我们时代其他矛盾的共产党是没有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苏共在实践中证实了，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应当怎样正确地利用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

当代的基本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现实情况出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它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而是因为和平力量，其主要支柱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能够以团结的力量来防止它。应该开展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而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开始。争取和平的斗争要求保持最大的警惕性，要求不倦地揭露战争贩子，激起各国人民对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神圣的愤慨，进行全面裁军的斗争，加

强所有爱好和平力量的組織性和团結，并且正确地实现和平共处政策。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的是怎样的立場呢？中国同志宣传这样的論点，說什么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防止的；說什么和平共处是暫时的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資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总原則；說什么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阻碍了革命斗争。

简单地說，和平共处原則意味着拒絕把战争作为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有爭論的問題的手段，不干涉内部事务，承认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一切問題的权利，在完全平等与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与文化合作。

当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和平共处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贏得時間，为了确保和平的外部条件，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以后，由于世界力量的新的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并且由于未来的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性质，和平共处有着更为重大的任务和意义。它的最終目的是为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資本主义創造最有利的条件。

不同社会体系国家間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調和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和丧失革命前途。正好相反，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的全面进攻，是世界革命进程继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它是这两种社会体系之間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同时还为被奴役人民和被剝削阶级反对資本主义統治的斗争創造有利条件。如果认定与此相反的东西，就意味着支持那种通过战争来“加速”革命进程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然而生活完全证实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正确性，即：工人阶级不是通过发动各国人民之

間的戰爭，也不是通過外來的“恩賜”，而是通過在各國內部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來戰勝資本主義。

這就是和平共處政策的實質，這就是和平共處政策的意義。在莫斯科聲明中，它也是這樣被論證的。遺憾的是，現在中國同志否認對這個問題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甚至他們不顧一切地對其他共產黨的立場進行捏造，指責他們鼓吹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帝國主義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但是，何時、何地、哪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宣傳了這樣的東西呢？正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過去和現在正是堅持與此相反的觀點。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闡述蘇共的路線時說：“當存在着帝國主義，當存在着殖民主義的時候，就將有解放戰爭。這樣的戰爭不僅是容許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殖民主義者不會自願地把獨立交給各國人民。因此，各國人民只有用鬥爭，包括武裝鬥爭，才能獲得自己的自由與獨立。”

社會主義各國兄弟黨正在以自己的和平與和平共處政策給予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以現實的援助。在和平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科學和技術方面正在取得新的成就，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發展並且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只有通過這一途徑，社會主義才能贏得資本主義世界勞動人民的心，並且在實踐上加速革命的進程。列寧教導說，“……我們是用自己的經濟政策對國際革命給以主要的影響……在全世界範圍內鬥爭已經轉到這個方面來了。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是在國際範圍內真正地最終地取得了勝利。”

蘇共、我們黨和其他兄弟黨都遵循偉大列寧的這一遺囑。但是也有這樣的同志，他們不同意列寧的這個原理。中國同志把事情說成這樣，好像只有他們關心世界革命，而其他的黨則

“忘記了”革命，“害怕”革命，并且用爭取和平、爭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和提高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爭取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直接利益的斗争来“代替”革命。他們指責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議會迷”，只是因为这些党沒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当某个国家还缺乏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会使工人阶级遭受失敗。每一个粗略通晓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明白，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爭取和平、民主与社会进步的斗争，能加强他們与群众的联系，帮助他們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軍。而中国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呢？他們“为了革命”，实际上恰恰是摒棄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并且强迫別人接受这种使各国共产党脱离群众的方針。

在“革命詞句”的掩飾下，中国同志还在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問題上歪曲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在許多公开材料里，他們力图证明大多数共产党是站在反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的，因为它们們“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力图证明，“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可是，这里有明显的捏造。究竟是哪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何时、何地只是承认革命的和平道路呢？任何人都可以在莫斯科會議的文件中、在苏共綱領中讀到可以和平地和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另一国采取什么形式过渡，取决于許多情况。党只有正确地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巧妙地把它們結合起来和运用这些形式，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冲击資本家、夺取政权。

中国同志认为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过和平过渡的先例的說法也是不正确的。在一系列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革

命已经成为沒有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事实。甚至在尚无任何经验的时候，馬克思也认为，工人阶级有可能不采取武装流血斗争，“用和平手段”在某些国家取得政权。提醒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我們沒有必要提及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列宁不仅在理論上預見到这种可能性，而且在准备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一段期間里，当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客观条件时，他也是竭力在实践中来证实它。

中国同志为什么必須利用这种恶劣的辯論手法呢？因为，这样他們事实上就否定了利用和平斗争方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而只承认武装起义。看不到这个教条主义的立場，就意味着沒有抓住在詭辯的詞藻掩盖下的问题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上，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傾向也是严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并且支持了为反对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而进行的斗争。否則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当时问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摒弃自己机体中那些与本身不相容的、束縛人民力量并沾污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观点和作法。苏共中央本着对历史和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高度負責的精神，首先开展了反对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斗争。这样，就大大帮助了也包括我們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恢复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的准则，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曾贊同这条路线。他們不只一次地強調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巨大的国际意义。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援引了毛澤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国领导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現在中国同志們来了一个急剧的轉弯。他們充当了个人迷信维护者的角色。更为奇怪的是，他們企图以列宁的名义来論证这一立場。可是，难道列宁不正是那个为反对任何

个人迷信而进行了最彻底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中国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们把个人迷信问题与领导人的威信问题混淆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生为反对对个人的迷信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但是他们始终强调工人运动需要有才干、有威信的领导人的必要性。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正是符合这种精神的。

中国同志把自己扮演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而斗争的最坚定的战士。然而，事实表明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对个人迷信的维护证明他们是赞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独出心裁的修正的人，证明他们是脱离了生活的、陈腐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拥护者。

始终不渝的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的准则，使共产主义运动有可能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显著的成就。我们党以克服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因此，更为广泛地发挥了人民的创造力，加强了党同各阶层居民的联系，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为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同志看不到这一切，这简直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些成就的，因为他们不仅赞同个人迷信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反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面发扬民主的路线。

中共中央在今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公开表示不同意苏共纲领中的一系列原理，首先是不同意有关阶级斗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等问题的原则。但是，中国同志提出了怎样的论据呢？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任意挑来的引语。但是，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只知引经据典的典

型的教条主义态度。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后，在这一社会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就意味着在众所周知的事实前面闭上眼睛。在苏联，剥削阶级早就被消灭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取得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不是必不可少的了，它正在长入全民国家。在苏共纲领中首次作出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结论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同志不但不看到和认清这点，反而开始反对它。为此，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流氓、小偷和寄生分子。但是，第一，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成为阶级；第二，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能够对付、而且正在对付这些反社会的分子。应该指出的是，就是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国家完全消亡的时候，对破坏社会秩序个别分子的斗争，仍将由社会及其自治机构有效地进行。

除了这一论据，中国同志还拿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一时期的内容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正如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有着两个阶段的统一的社会结构的，而要过渡到这种社会结构，的确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这一点，又故意不愿意看到列宁的某些非常著名的说法。列宁在那些讲话中，极其明确地强调，为了制止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在此之后，它即消亡。当然，这一切怎样具体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作出规定。他们生活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条件同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条件相距甚远。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在我们的时代里怎样实现这个过程，指出在最近的将来这个过程将有怎样的前景。

苏共纲领清楚地表明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长入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在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逐渐改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中国同志不但看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这一客观必然性，而且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字面意义，故意歪曲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他们还以同样方式对待全民党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

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来解释中共领导对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的不正确看法呢？首先在于他们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万能的，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需要，并且以此来帮助劳动人民在现代的复杂事件中正确地辨别方向，找到达到自己目标的正确途径。同时，因为生活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也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为了使其本身仍然保持为革命的和富有改造力的科学，它应该不断发展，不仅应考虑到新的实践，而且应该从今天的立场上观察明天，号召各国人民争取历史性的新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给我们留下的这条路线，由列宁和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下来。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首先是苏共实现着这条路线。

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锻炼的队伍和先锋队，它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不可超越的经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并且根据新的条件，在解决现代问题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方面，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有着特殊巨大的意义。这些决议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创造性的发展的新阶段。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思想上的停滞和对不符合事物实际情况的公式的崇拜，是絲毫不能調和的。生活較之任何公式都丰富得多。这就要求根据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使理論原理更加准确。所有国家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現在中国領導不是这样做。中共領導建議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那个东西，在他們不顾时代和階級力量的实际对比的情况下，只是罗列一下工人階級的最为一般的任务，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在震耳欲聋的“世界革命”的喧囂声后面，非常清楚地显现出中国同志解决当代問題时的宗派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只一次地出現过类似的教条主义观点和宗派主义的实践。讓我們仅仅回忆一下苏維埃俄国的“左派分子”，假革命之名就布勒斯特和約問題說过多少“左的”話，回忆一下他們如何恶毒地攻击列宁，称他为革命的“叛徒”和“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吧。然而，历史证明了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并且完全摒弃了“左傾空話”的拥护者的錯誤观点和有害的实践。

或者讓我們看看共产国际爭取建立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人民統一战线的斗争吧。格奧尔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中，闡述了在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傾向的斗争中建立統一战线的論点。他特別注意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坚决根除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格·季米特洛夫說，“在我們时代，这个往往已经不是像列宁所說的‘幼稚病’，而是根深蒂固的恶习，如果不能摆脱它，就不可能解决建立无产階級統一战线和把群众从改良主义的立場引导到革命方面来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其后的历史事件表明，季米特洛夫是多么正确，当时，許多摆脱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党把人民中的絕大多数成功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引导他們走上社会主义革命

的道路。

重复那些相当于教条的一般公式，也曾经是保加利亚左倾宗派主义分子的特点。在1929至1935年期间，他们在党的领导中曾一度占过上风。他们到处鼓吹在我国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与此同时，他们几乎丝毫不捍卫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切身利益，丝毫不培养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

中国领导竭力把自己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唯一保卫者和最坚定的反帝战士，而其他兄弟党则是“害怕”帝国主义的，因而它们“放弃了”世界革命。由此也决定了它们的宗派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中以及在工会、妇女、青年等等群众性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得到明显的表现。他们不想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不是自行达到的，而是要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夺取。因此，共产党人所需要的不是宣扬“世界革命”和“武装”起义，而是以其日常的群众工作和正确的政策取得群众的信任。这只有当共产党人估计到群众的阶级觉悟的实际水平、群众的革命化程度和不基于自己的愿望，而基于实际情况、对具体形势作了清醒估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应该一步一步地、耐心地使广大群众易于转向共产主义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列宁的话。列宁最强烈地警告我们说，“事情正是在于不要把我們经历过的东西当成是阶级和群众也经历过的。”

列宁曾经号召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寻求过渡形式或者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上。他为什么赋予这个问题这样特别巨大的意义呢？因为列宁预见到，当涉及到真正地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到革命先锋队这方面来的时候，仅仅有宣传和鼓动是无法代替群众切身的政治经验的，否则，夺取政权的胜利斗争

也是不可能的。帮助千百万群众尽快地通过自身的体验懂得应该做些什么，从哪里找到决定性的出路，誰值得他們信任——这就是为什么必須附有过渡性口号，以及为什么必須有特殊的过渡形式，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的原因所在。在相反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为小资产阶级传统和幻想所俘虏，他們甚至可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动摇、忙乱和徘徊，找不到革命的道路。

根据列宁的这些原理的精神，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曾說过：“我們不应当把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只局限于空喊，而是应该根据群众的生活需要，并根据他們当时的发展阶段的战斗力的水平，找出并提出斗争的口号和形式。”

中国同志认为，争取和平、和平共处、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全面巩固社会主义体系的斗争是脱离世界革命的斗争，若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話，我們是不同意这种意見的。正如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正确指出的，“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許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們結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統治。”

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的这个时期，完全证明了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一直在前进。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陣线，帮助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革命。

各国共产党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对待这些党的代表在平等基础上制定的共同決議的态度，是衡量它們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的最重要的标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两次莫斯科會議(1957年、1960年)決議的作用和巨大意义可做如下的解释：对現时代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正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保加利亚共产党以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忠誠，积极地促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积极地促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并且在共同制定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貢獻。我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再次表明了莫斯科會議的綱領性文件对我們具有巨大的意义。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指出：“这些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在爭取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工作中已成为我們全党的战斗綱領和行动的指南。”

我們的党以忠于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同情一切正在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民的精來教育劳动人民。它在反对任何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爭取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进行了、并将继续进行原則的斗争。

(譯自1963年第8期保《新时代》杂志)

讓列宁主义的旗帜更高地飄揚起来！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来，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它仍然激动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封公开信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卓越文件，是世界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热烈的捍卫者。

当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即将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会談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那封众所周知的6月14日的信件，广泛宣揚了它对我們时代最重要問題的錯誤看法。这封信是用不友好的口气写出来的，充滿了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誣蔑和捏造，它是中国领导分裂主义活动的又一个无可爭辯的证据。

我們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看到了对以中共为一方和以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間的分歧实质的深刻评价。信中指出了一系列的事实，說明中国领导人在我們时代的基本問題方面的想法和行动都是錯誤的。苏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回顾了兄弟党，特别是苏共为了及时消除已经产生的分歧所作的努力，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不要在錯誤的评价中越陷越深，不要进一步脱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家庭。因此，这封信又一次使人信服苏共中央具有列宁式的洞察力，像列宁那样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巩固，矢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尊重作为兄弟党之間相互关系的基础的基本原则。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相继表示它們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同心一意，坚决譴責中国同志的錯誤立場。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員、劳动人民毫不动摇地拥护我党的中央委员会，拥护它的声明，声明写道：“我們代表保加利亚全体共产党員表示完全贊同苏共中央的信件，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其中所闡述的見解和观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的精神和实质。这封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各国兄弟党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則基础上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各国兄弟党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表现了巨大的兴趣，同心一意地支持它，这是由于分歧的实质而决定的，这些分歧是中共在涉及各国人民和全人类切身利益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上的立場所引起的。这些問題是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問題，是关于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战术問題。

所有这些問題早就被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闡明了。这些問題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1960年11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都加以詳尽地闡述了。苏共纲领这一現代的共产党宣言，对这些問題作了有广泛論据的回答，尼·謝·赫魯晓夫在有历史意义的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他的演讲中，也作了回答。这些评价还得到了近几年来兄弟党的其他代表大会，其中也包括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支持，这些代表大会同时还从这些评价中得出了关于自己实际行动的经验教訓。

为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現阶段的总路线。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确定这一路线时，遵循着列宁的如下指示：应根据哪一阶级位于时代的中心，哪一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来明确地区分各个不同的时代，遵循着列宁关于在任何时候都应寻求和找到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环节的原则。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没有这样作。他们粗暴地、毫无根据地修正着这一路线，否认这一路线。在他们所建议的“总路线”中看不到在现时代应该实现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把恣意列举的最一般性的任务，折衷主义地堆砌起来。而看不到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们的立场非常类似布哈林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列宁曾用玻璃杯的著名例子嘲笑了这一立场，说明了它的虚伪的科学性，称它为“折衷主义的蠢话”。

把中共6月14日的信件中所表示的观点同各国共产党所通过的文件比较一下，就足以发现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毫无根据的，同时足以表明中国领导背离了各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赞同的估价。

我们有权质问：能不能一方面考虑到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而同时又反对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理由是这将会“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将限制这种斗争的规模，并将使人们产生资本主义会“自动崩溃”的幻想。

这的确是惊人的自相矛盾！

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口号是能被群众所理解的。各国人民容易接受这一口号。但是，是否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这一口号才被

当作各国共产党当前政策的基础呢？它是否能为人类实现现代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以及全人类所面临的其他基本任务创造可能性呢？这一口号是否现实呢？

只要仔细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证实这样一个深刻的信念：采取这一路线并不是简单地寻求群众能理解的口号的结果。不，最重要的在于和平共处是成功地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切基本任务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是最主要的！同时，这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也不是什么臆想。恰恰相反，和平共处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客观规律，它得到以苏共为首的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正确理解和解释。

那么，所谓采取这一路线就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和放弃革命的說法是否有什么根据呢？

没有，这种說法是无凭借的，是肤浅的，它缺乏任何根据。和平共处就是新制度为了确立比较进步的事物而同旧制度进行不断的斗争。

共产党人也没有把争取和平的斗争本身看作是一首田园诗。这一点在公开信中是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封信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和平共处能大大减轻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困难。在它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冷战政策的同时，还使他们失去了那些借以为粗暴地践踏自己国家中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辩护的論据。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在什么样的国家开展自己的斗争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目前，和平共处是开展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前提。

正确地理解和平共处的实质是利用一切可能来增强进步力量的重要条件。断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把和平共处当作社会主义各国本身之間、社会主义各国同刚从殖民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之間相互关系的原則，甚至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間、殖民主义者和各国被压迫人民之間关系的原則，是再錯誤不过的了。一个人只有装作又瞎又聋，装作听不到任何关于确立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相互关系的最重要原則的提法，只有低估这一原則的重大历史意义，根本不了解它的越来越富有創造性的发展，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苏联給予新解放国家的全面援助，才会支持这种意見。

或者我們来看看和平共处以及两个世界之間的思想斗争的問題。在思想领域中不存在和平共处。这个問題は再清楚不过了。同时，这也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細节。这意味着，关于和平共处的共产主义观点同那些在战争面前发抖，并且由于害怕战争而准备牺牲一切，准备背弃和出卖人民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无任何共同之点。

共产党人不这样看待这一問題。对他们來說和平是可貴的。他們不需要用战争来保证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同时他們絲毫也不会背离这一伟大学說。

共产党人在思想斗争領域中的不妥协精神，意味着不断提高工人和所有劳动者以及各国人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意味着爭取他們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它意味着为了使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群众、被群众所掌握并成为他們的深刻信念，为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变成革命的物质力量，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广泛的战线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与关于阶级和平、关于资产阶级国家

中各階級“和平共處”的妄言无任何共同之點。

眾所周知，帝國主義沒有改變其本性，因此帝國主義發動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性也沒有消除。但是，如果說帝國主義沒有改變，那麼，別的東西卻變了。現在的國際形勢不一樣了，贊成和反對帝國主義、贊成和反對戰爭的力量對比不一樣了。考慮到力量的新的對比關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指出了制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任務具有現實性。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出了在我們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結論。整個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都把這一結論當成自己的結論。莫斯科聲明特別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區存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將會出現把世界戰爭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在莫斯科聲明上簽了字，而且現在仍然動輒責備別人，因為他們自認為是這一聲明的精神和字義的最熱心的捍衛者。他們責備別人，可是，大家看看，他們在6月14日的信中寫了些什么：“現在，有人竟然認為在帝國主義制度和剝削人的制度還存在的條件下，能夠通過‘全面徹底裁軍’，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這完全是切實際的幻想。”

僅僅從這一段話就足以看到中共領導離開各兄弟黨的一致立場有多麼遠。中國的這一看法導致宣稱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導致得出這樣一種論斷：“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並導致產生這樣一種看法：爭取裁軍的鬥爭僅僅是揭露帝國主義軍備競賽的手段等等。

蘇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又一次地明確指出：“我們不僅相信

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以便通过阶级斗争使这一点得以实现并尽可能使之早日实现。”誰不知道，苏联、苏共、苏共中央和尼·謝·赫魯晓夫本人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而尽了一切努力。同时，他們坚定不移地、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

他們信心百倍地实现着建設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帮助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新解放国家的人民向前发展——这是至今为止任何一个强国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事情；向英雄的古巴伸出了援助之手，表达了自己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以及捍卫它的革命成果的决心，虽然他們自己因此而担起了遭受毁灭性的核打击的駭人风险。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們是在这样做。

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在目前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相互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生活和斗争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影响，同时在它們的党内生活中也得到了反映。列宁遺留給我們的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設的不可缺少的原則之一，是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持、扩大和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如果共产党人放弃和平共处政策或者像中国人那样把这一政策仅仅看成是宣传的話，那么怎么能够想像会遵循和发展列宁的上述原則呢？不，这是不可想像的。

从中国领导人对待其他基本問題的态度中也可以发现他們的自相矛盾以及反科学、反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拿个人迷信的問題來說吧！苏联共产党、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尼·謝·赫魯晓夫本人在闡明党和国家历史中这一令人痛心的时期时，树立了列宁式的負責态度的榜样。他們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了个人迷信的害处以及它給各党和各国带来的禍害，与此同时，他們勇敢地、干淨彻底地消除了它所遺留下来的严重后果。各兄弟党对苏共及其领导所表现的列宁式的勇敢精神深感滿意，完全支持这种勇敢精神，并且自己也深入地研究了本身的实践，

清除了个人迷信时期的后果。每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我們祖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對我們党也起了极大的健康和鼓舞作用。中国同志們为了替个人迷信辯护，甚至伪造列宁关于党，关于党的領袖、党、階級和群众之間相互关系的学說，这种辯护难道能迷惑得了什么人，从而使他对个人迷信怀有好感嗎？誰喜欢鎮压、多疑和不信任的时期呢？只是那些实际上仍然在自己党内和国内奉行当时的方法的人，才会喜欢这一时期。我們想重新提一提老威廉·李卜克內西的話：“我們党的本质性的标志是原則性的斗争……和坚决反对任何个人领导制……。如果不摆脱任何迷信，特别是任何个人迷信，人們是不能够自由的……”

个人迷信是同党的本性格格不入的！为保持个人迷信而奋斗是共产主义事业所不能容許的。

中共对待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的态度也不能說明他們對我們的理論問題、对科学地分析生活現象的問題采取了严肃的态度。看不到苏联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对于剝削階級的消失估計不足，由于存在着流氓和其他犯罪分子就推理說存在着企图使資本主义复辟的人——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例证來說明对苏联现实所采取的反科学态度嗎？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于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設和国家建設問題的宝庫作出了新的貢獻。它們不仅恢复和坚持了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說，而且还向前迈进了，指出了丰富列宁主义关于在共产主义建設的条件下党的建設原則的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生活准則的創造性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巩固。拜倒在僵化了的定义之下以及否认根据社会中的变化来进行党和国家建設的必要性，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場。頑固地不願意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

国家，也是粗暴的主观主义的结果。

看！除去上面这一切，中共中央的信还会给你端出某些捏造或是公开的诽谤，如果问题不那么严重的话，那么这些捏造和诽谤只会像唐·吉珂德向风车冲锋那样使你发笑。例如，中国同志们指责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曾把和平道路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指责来否定这一可能性。为什么呢！这仅仅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似乎当列宁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論时曾经遵循着一个现成的模子，遵循着某一个“先例”？

然而，誰持有正确的理論，誰就会有正确的实践；誰在理論中犯錯誤，誰就会在实践中也犯錯誤！

生活向我们提供了数不尽的证据，这些证据不容爭辯地肯定了以苏共为自然中心和先鋒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路线和所作的估价的正确性、现实性和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比如說，去年秋天帝国主义者加勒比海地区挑起的危机得到解决一事說明了什么呢？又比如說，联大关于裁軍的決議以及已簽訂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展空間和水下进行核試驗的条約又說明了什么呢？

他們說，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不是空想，而是有客观依据的，有积极作用的和现实可行的。那么，我們是否須要提一提那些能表明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之間日益加强的合作的許多事实呢？我們是否應該忘掉社会主义各国的高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不容爭辯地证实，在1970年这些国家即将生产占全世界工农业产品半数以上的产品，而大約在1980年，将生产占世界产品总額70%的产品。

实践是一切理論确定不移的准绳。了解中国领导所采取的某些实际作法，就能再一次证实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态度。

讓我們看一看他們对去年秋天的危机所抱的观点。苏联、苏共和尼·謝·赫魯晓夫本人在解决这一尖銳冲突时所持的态度中有哪一点使他們不高兴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否由于找到了出路而輸了什么？沒有，沒有輸。不仅沒有輸，而且还贏了。苏联用自己的现实主义政策敗坏了帝国主义者侵犯古巴人民独立的胃口，迫使美国許下不进行武装干涉的諾言，从而为社会主义古巴的建設保证了和平环境。难道这不是革命的成就嗎？或者說只要枪不响，我們就不能談革命嗎？

中国领导人企图从这一冲突的解决中找出些什么东西呢？他們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們有力量并忠于馬克思主义学說嗎？难道馬克思主义学說要求我們的一切条件下都不加考虑地保持“始終如一的精神”和“坚定性”嗎？誰不清楚，在那一情况下，按照中国人所选择的道路走就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热核战争，意味着盲目地、轻率地向前走。他們对待不久以前簽訂的关于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态度也并不比上面所說的更富有远見。

讓我們回忆一下伟大列宁在1914年同波兰記者阿尔弗莱德·麦科森的談話中所說的一段話吧：

“您希望发生冲突嗎？”——麦科森問。

“不，我不希望发生冲突。”——列宁立即回答。

“我为什么需要冲突呢？我現在和将来都要做到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阻止动員和战争的爆发。我不希望千百万无产者自相残杀，为資本家的疯狂行为而牺牲。在这方面不能有誤解。

客观地預見战争，如果它一旦爆发就尽可能好地利用这一

灾难是一回事；希望战争爆发并且致力于战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或者拿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来说吧。这不是任意的要求，不是灵机一动。这是切身要求，是客观需要。人类将会感谢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发展的规律，感谢他们努力正确地解释这些规律并且为使这些规律在生活中取得胜利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互助合作不仅是其他国家人民如何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的榜样，而且是一种深刻的革命过程。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的全面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这种合作越充分、越紧密，它的形式就越丰富多样，共同的前进就越迅速。”

这方面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呢？最近三年中，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以上。就不用说其他形式的合作了——协调远景规划、生产的协作和专业化等，这些形式使得每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正以高速度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指出苏联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所给予的经常援助吗？单单是提供我国的贷款就达到十二亿卢布。由于苏联的积极援助，我们顺利地发展着动力、机器制造、化学等这样一些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部门。我国是专业分工生产电动机、电动小車、电动小吊車、动力变压器、食品工业机器等的国家。如果说我国的工业现在用二十至二十一天就能生产1939年全年的产品，那么这是同社会主义各国紧密友好的结果，首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式慷慨援助的结果！我国出口的机器和设备的65%是由苏联购买的。还需要说苏联对培养国民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方面的干部的巨大援助吗？谁不清楚，我们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对我国人民来说不是像真正的太阳

和空气嗎？而苏联不仅对我国人民表现了这种慷慨精神。同时由于苏联，中国也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門，已经建成了一百九十八个企业，另外八十八个正在建設中！像苏联人民这样的人民，像苏共这样的党和它的领导，怎么能被指責为“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呢？

而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他們却背道而馳：减少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貿易。单就同苏联而言，最近三年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貿易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成套設備的供应减少到四十分之一！中国领导的态度也大大損害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貿易关系。1963年两国間的換貨額已经降到1959年的16%左右。同我国也是一样——由于中国同志的过錯，我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貿易减少了約五分之四。中国既不保证供应，也不购买协定事先規定的商品。这种情况为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內，制造了額外的困难。

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甚至还发明和推行了“自力更生”的特殊理論，以此作为自己錯誤行为的根据。要求每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物力和人力是一回事。但是，以此为掩护执行破坏社会主义各国間的互助的政策却是有害的！

注意分析上面指出的立場和中国领导人为了实现这种立場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就不难发现这种立場同关于走向共产主义的“独立道路”的修正主义“理論”惊人地相似。其实，这就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叛——不論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的下場，归根結底不能不走到破坏新事物、进步事物的基础的地步。不能不走到理論上的机会主义和实践上的冒险主义的地步。

中国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們夸大这一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宣称它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把它放在

具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運動之上，企圖使它脫離無產階級運動。他們的努力絕不僅限於提出這些方面的理論。不，他們不止一次地在實際做法中也朝着這個方向前進——他們斷言什麼在非洲各國人民的會議上不應當有“白人”出席，而這一個族主義的理由是針對着社會主義各國的代表，他們迫不及待地宣稱蘇聯不是亞洲國家，因為……它的首都在歐洲。我國人民在這種場合就說：“你看看他的腦袋，再給他做帽子”。

中國領導人指責蘇共說什麼它反對各個國家中的革命，反對解放戰爭。讓我們回憶尼·謝·赫魯曉夫的話吧，他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只要殖民主義還存在，就會有解放戰爭。這是革命戰爭。這種戰爭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殖民主義者不會自願給各國人民以獨立。因此，各國人民只能用鬥爭，包括武裝鬥爭來爭取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為什麼不提蘇聯給予越南和埃及、老撾和阿尔及利亞的實際援助，不提為鞏固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而給予的援助呢？難道只援助了這些國家嗎？因此，這裡實踐也反駁了中國的立場，支持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

中國領導人對偉大的列寧黨、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全體進步人類的久經考驗的先鋒隊所採取的態度，也經不起任何批評。

中共中央的信還充滿了對蘇共、對它的中央委員會和現代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最卓越的活动家和和平戰士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對蘇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對宏偉的蘇共綱領的毫無根據的、在內容和口氣上都不能令人容忍的指責，充滿了對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侮辱性的暗示和攻擊。他們甚至落到了提出令人吃驚的指責的地步：說什麼蘇共起了“帝國主義的幫凶的作用”，出賣了國際無產階

級的利益。人們讀了這些就會感到莫名其妙，這些話是誰說的？這些指責同過去一切叛徒的所有最惡劣的指責有什麼區別呢？

蘇聯共產黨不是由於任意要求才贏得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尊敬和支持的，才成為共產主義和全人类的公认的先鋒隊的！它之所以有這種地位，是由於客觀的發展使蘇聯成為我們时代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是由於創造性地解釋了這一客觀的作用，這種作用體現在不可代替的列寧的學說中（這種學說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實現）。正因此各國兄弟黨才在莫斯科聲明中寫道：“蘇聯共產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經驗和久經考驗的隊伍，過去是、今後仍然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认的先鋒隊。”忠於我國人民的偉大兒子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他曾把對蘇聯的態度規定為檢驗每一個活動家、每一個政黨、甚至每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是否真誠和正直的試金石——的遺訓，保加利亞共產黨和每一個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堅決捍衛蘇共和蘇聯，使它不受敵人和任何派別分子的攻擊。

剝削階級和敵對階級的消滅，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獲得的自由、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和真正繁榮，達到了最高度發展的生產關係，在整個社會中日益廣泛地樹立起來的共產主義道德，等等，這一切是人類從未見過的社會存在，這種社會存在也不可能不使人深深地意識到自已對歷史和人類應履行的義務。蘇共、它的領導和全體蘇聯人民對這種義務的無比忠誠，對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正是這種社會存在使各國人民產生並且加強着對蘇共和蘇聯的力量的信任，正是這種社會存在把各國人民團結起來為鞏固它們的正義事業而鬥爭。

中國領導人在談論尊重兄弟黨的平等權利時，只把這點理解為別人對他們應盡的義務，而他們自己却不顧及這種平等權利，他們最粗暴地踐踏各國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中已經確定下

来的原則和做法，号召人們破坏它們的团結一致，污蔑和丑化兄弟党的著名活动家，支持一系列国家中的派別集团和反党集团的活动，企图站在其他党之上并管束它們的活动，甚至不考虑起碼的外交慣例。他們企图把他們自己的教条主义观点强加給国际民主組織，企图在它們的队伍中制造分裂。

此外，他們还发明了关于“暂时少数”（他們的处境）和“暂时多数”的特殊理論，以此高傲地“評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一理論除了使一切背弃共产主义正义事业的人过去和現在如此渴望的派別活动合法化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我們，保加利亚共产党員，毫不怀疑以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的支柱、苏联共产党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义事业。我們珍愛这一运动的团結一致。我們將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它。

我們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它自己的声明中強調指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真正团結一致，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真正团結一致，只能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則建立和巩固各兄弟党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是这一团結的基础。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結——这就意味着坚决遵循在这两次會議上确定的总路线，意味着为反对离开这一路线的傾向、反对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

我們党将继续促进克服分歧，巩固在苏共久经考验的領導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以便让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更高地飄揚起来，使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士的队伍更加团結！

（譯自1963年第11期保《党的生活》杂志）

在鐵路員工节庆祝会上的讲话(节译)

托·日夫科夫

不久前,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草签了关于停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草案。几天之后,条约将在莫斯科签署。

我们党和政府以及我国全体人民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起,欢迎这一决定。

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这是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成就,是它们为缓和国际局势而不倦地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这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执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的成就。

这是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以及尼·谢·赫鲁晓夫个人为防止世界战争、争取裁军和巩固世界和平,始终不渝地、坚韧不拔地、孜孜不倦地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的确,条约没有根本解决完全停止核试验的问题。我们要达成裁军协定和保障持久的和平,我们面前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进行持续的斗争。但是,每一个明智的人都明白,莫斯科所达成的协议,是良好的、积极的第一步,它符合和平的利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们非常满意地、充满希望地欢迎这一步骤。所以,他们欢迎苏联英明的、现实主义的、有远见的政策,欢迎它为保卫世界和平而顽强地作出的努力。

中共领导人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为什么中国同志反对这个条约呢？

因为这个条约没有根本解决禁止核试验和全面彻底裁军问题。

但是，我们能否只根据这一理由就发表声明反对这项有利于和平、为进一步缓和國際紧张局势扫清道路的部分协议呢？

显然，中国同志不同意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坐在一张桌边谈话，不同意作出甚至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妥协。

中国同志不对具体局势和条件进行清醒的分析，没有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国际问题所表现的灵活性，而实际上建议我们采用这样的公式：要么全部，要么全不！

在国际舞台上怎么能够采用这种尺度呢？怎么能够用这种拙劣的武器来伤害所取得的成就呢？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世界上的现象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无论和平还是共产主义，都不能以魔杖一挥顷刻到来。誰不知道，要登上山峰，就要耐心地、顽强地攀登山峰？

中国同志的公式只能使我们脱离群众，使我们同“狂人”，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恶毒的敌人站在一个立场上。这是事物的客观逻辑！

我国今后也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一起，为缓和國際局势，和平共处，加强社会主义陣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竭尽全力。我们绝不离开这条列宁主义的路线。

（譯自1963年8月3日保《工人事业报》）

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左倾” 学究主义和冒险主义

尼·伊里巴扎科夫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有生力量的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及其不可战胜和全部成就的前提，在于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不动摇的忠诚，以及它对革命斗争和当代的基本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并不象反共宣传企图说的那样，仅仅是或者主要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这是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通过的路线、同所有站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歧。中国领导人装出一副唯一始终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傲慢地说，站在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是否在什么时候真正研究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否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共产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向它们提出自己的所谓唯一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表现了要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它的导师和教导者的角色的毫无根据的奢望。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问题的 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着的不是某些次要问题上

的斗争，而是两条总路线之间的斗争，它们之间的分歧首先是由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而产生的。存在着站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所采取的创造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和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态度。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制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每个党的总路线时总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指示为指南，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忠实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中的变化、社会历史发展新要求的经常发展着的学说。列宁说，我们应当“善于把死板的公式适应于生活，而不是重复现成毫无意义的词句”。

但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经典作家的这些指示实际上都被忽视。当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虽然也不少，但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以教条主义和死啃书本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苏共二十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个人迷信的思想和作法，摆脱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走向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转变，并且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它恢复了各国共产党内生活、活动和相互关系的列宁原则和准则。重新激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思想的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思想卓越地表现在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上，表现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在堪称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共产党宣言”的卓越的苏共纲领中。借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智慧，对当代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如：我们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和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共产主义建设、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等问题都进行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创造性的研究。

构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創造性地发展的新阶段的新論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基础。

中国领导人否认这条总路线，因为他们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他們否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載入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的所有新論点，把它們全都說成是“机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

他們首先以自己在当代基本問題上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同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一味重复经典作家的著名論点而不考虑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变化。

中国领导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唯物主义辯证法的最伟大的大师。实际上，他們的教条主义概念是对当代的理論問題采取明显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态度的結果。

据說，有一次人們对黑格尔說，他的哲学违背事实，而他却高傲地回答說：“那該事实倒霉”。这种回答很像中国领导人的立場。他們对教条主义公式热恋不舍，而对现实的事实却极端蔑視。

中国领导人对当代极重要問題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态度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們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概念上。

和平与战争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創造性发展的新阶段的新的原理当中，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在今天已经不像在列宁时代那样不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现实可能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就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

生活中排除出去的結論，以及根据这些原理提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間和平共处的政策，有着特別重大的理論和实践意义。

中国领导人拒絕这些重要的理論原理，认为它們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而把基于这些理論原理的和平共处政策說成是危险的“幻想”。他們硬說：“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現沒有战争，沒有武器的世界。”（摘自刘长胜在1960年6月8日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會議上的发言）

中国分裂主义者援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原理来为自己的这种論点找根据。但是，列宁在大約五十年前对这些問題的論述，同教条主义者今天的論断，有着很大的差别。列宁說过，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他也这样說过，“在一个国家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

列宁是在1916年秋《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写到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时写的。

但是，我們現在生活的时代是新的时代，正当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日益决定性地超过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力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試問：把反映約五十年前的社会——历史实际情况的理論原理机械地搬到今天的实际情况的人，算是什么样的列宁主义者呢？大家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这种死啃书本、从紙面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論的不可調和的死对头。

教条主义者指責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主义，滑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場等等。說他

們好像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改变，并把全世界和平的命运不同群众斗争相联系，而是同帝国主义者们的善良意志相联系。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断言完全是虚构。今天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不是以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变了，帝国主义已经由掠夺战争的挑拨者成为诚实的和平战士这种概念为根据的。但是，问题在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不是决定现在爆发不爆发战争的唯一因素。尼·谢·赫鲁晓夫说，“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仍然有效，并且同过去一样作为和将作为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指路明星。但是不应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他在几十年前提出和发挥的，当时很多现在成为决定整个国际局势历史进程的发展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否定群众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世界和平的命运取决于帝国主义的上层人物和军事参谋部的意志和决定。

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4月16日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里以及在这个总标题下所发行的小册子里逐字逐句地说：“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

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认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会不会爆发，毕竟不由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群众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决定的，而由帝国主义参谋部决定的。显然，这种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概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

中国领导人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 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中国领导人自吹自擂地说，只有他们才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群众、党和领袖的作用的学说。他们在最近致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关的文章说，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是看来，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码常识也没有掌握好。

一方面，他们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贬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要创造者的作用。这既表现在他们关于帝国主义总参谋部的首脑的作用的概念中，也表现在公开维护在中国真正盛行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中。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口头上也强调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以极端浪漫主义的色彩来描写群众，极力夸大他们的觉悟和创造能力。

中国领导人断言，如果帝国主义把世界投入一次核战争中，那么，在核战争中灭亡的只是帝国主义者，而胜利的人民，“将迅速地恢复所遭到的损失，并且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这些断言中特别强烈地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喜欢浪漫主义地夸大群众的创造力量。

我们决不是要怀疑帝国主义、一切剥削阶级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和革命群众所具有的巨大创造精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乐观主义，其危险性和危害性甚至不亚于最糟糕的悲观主义。因为一次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数千年来所建立的主要文明中心，给整个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灭亡，给人类的子孙后代

带来无数的灾难。

正因为如此，认为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群众的有组织的斗争今天能够制服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并防止一次新的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世界大战，要比断言群众在短时期内将在被核弹的致命爆炸和辐射所包围的地球上创造起高千百倍的文明要现实得无可比拟。

防止帝国主义战争不是任何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奇迹的问题，而是被最新历史实践在全世界面前所证明了的现实事实。

中国领导人对现时代和平与战争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不善于在争取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看到辩证的统一。

中共领导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隔裂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两类斗争的截然不同的变种，仿佛有一道万里长城隔在其间似的，并且只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中共领导人认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问题。

对待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这种概念和这种态度，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客观现实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莫斯科宣言写道：“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他们切身利益的斗争中，越来越把锋芒指向军备竞赛的祸首、新的世界战争计划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侵略和反动的堡垒——大垄断资本集团。这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和政策，不但同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同所有其他阶层——农民、知识分子、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越来越发生矛盾。”

争取和平的斗争不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绝对等同起

来。但是它并不越出阶级斗争的范围。它是最广泛的群众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客观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使革命具有巨大的威力和规模。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本身不仅不意味着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革命，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的“理论”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拒绝共同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拿自己的总路线来与此相对抗，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的概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大家知道，共同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当代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命题——“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胜利。”

中国领导拒绝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认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是“议会迷”。

中国领导人的这个评价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们硬说，主张可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党，都排除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过这是他们的捏造。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认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可能性。在得到所有站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党所赞同和接受的苏共纲领中，十分清楚的写道：“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

中国领导人不承认有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因为“到现在为止，世界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先例”。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论据”，这种“论据”没有估计到，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同至今已经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很大本质差别的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

中国领导人试图摘引经典作家的话来维护自己的论点。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这一句话是从列宁1917年9月写成的《论妥协》一文中摘引出来的，但是这句话完全脱离了上下文，实际上就掩盖了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立场。

列宁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指出过，在俄国的那个历史时刻，俄国革命的发展出现了那样激剧和特殊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一个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政府有可能为革命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列宁写道：“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

我们看到，列宁强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小并不是为了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弃绝这种可能性，相反，而且特别强调出这种可能性“非常可贵”，坚持一定要利用这种可能性，并且正是为了这种可能性才建议布尔什维克党作出某种妥协。

列宁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的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任何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用任何绝对固定的、永恒和不变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和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和后来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们作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指出，在制订和选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和方法时，

适应具体的历史环境，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还当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很罕有的现象时，他们就及时地指出这种可能性。现在，当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中国领导人却劝告我们不值得去注意这种可能性。

十分明显，不是别人，而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有根据把这种立场称为空喊的左倾行动。

中国领导人对全民国家、全民党以及对“民族民主”国家等等问题，也是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对各种现象的“阶级”态度

中国领导人谴责苏共和其他共产党，说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说他们回避“具体的阶级分析”而作出“主观的推测”等等。但是，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首尾不一。这可以从他们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中，从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概念中，特别是从他们对现时代的特点的估计中看出来。

列宁指出，历史时代不能任意地、根据主观的愿望和估价来区分。科学的区分这个或那个时代唯一的可能是借助于马克思的方法，即“首先是考虑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了解“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

但是，列宁不仅指出区分历史时代的标准。他根据这个标准确定了当代的主要内容。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的演说中宣

称：“我們有权自豪，我們自豪的是，我們幸福地能够开始建設蘇維埃国家，从而揭開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階級的統治时代，这个階級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資產階級，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使人类摆脱資本主义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当代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定义。

按照創造性馬克思主义的意見，当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斗争中决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及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中国领导人抛开这个对时代所下的唯一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而提出自己的定义，按照这个定义：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的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对現时代所下的完全錯誤的定义，这个定义实质上是否认无产階級的历史作用。

中国领导人的宗派教条主义概念实质上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并且在理論和实践上导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极有害的結論。正因为如此，我們党对中共领导人的宗派教条主义观点和行动沒有、也不可能采取調和主义和寬容的态度。我們党忠于自己的革命传统、努力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純洁性、爭取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創造性发展，它无保留地支持苏共中央今年7月14日公开信中所表示的苏联共产党的立場。

苏共中央公开信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件，完全符合保共的綱領性文件和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決議，

完全符合以托·日夫科夫同志为首的保共代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各种会议上—貫维护的立場。这封公开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对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有着巨大的意义。

(譯自1963年8月3日保《工人事业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月1日声明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我们代表保加利亚全体共产党员表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信件，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其中所阐述的见解和观点。苏共中央的信件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精神和实质。这一封信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兄弟党在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上的团结具有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磐石般的基础，是它们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源泉。在自己多年来的历史上，保加利亚共产党一向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这也是每个兄弟党的最高国际义务。

保加利亚共产党一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义务，是遵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的有关在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于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两次莫斯科会议共同通过的路线而引起的、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同以中共领导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表示十分忧虑。这些分歧最初是由于中国同志在1960年4月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而表现出来的。这一本小册子包含了反对

1957年莫斯科會議宣言的一系列論點。

我們曾希望，這些分歧通過同志式的交換意見將能得到克服，但是中國同志的行動卻造成使這些分歧加深的嚴重危險。

由於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主動，最近幾年來，曾作了很多努力來克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所產生的分歧。蘇共中央委員會出於巨大的責任感，耐心地、有分寸地和多次地試圖幫助中國領導人採取正確的立場。其他黨在這方面也作了努力。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贊同蘇共中央委員會和兄弟黨為克服分歧而採取的措施。

保加利亞共產黨從自己方面曾積極促進同中國同志取得彼此了解。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以保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托多爾·日夫科夫同志為首的我們黨的代表們為取得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彼此了解作了不少工作。保共中央委員會也特別寫信給中共中央委員會，信中表示不同意中國同志的一系列不正確的观点和行為。

1960年莫斯科會議進一步加強了兄弟黨的團結，並且曾希望，中國領導（它的代表在聲明上簽了字）放棄自己的錯誤概念。但是，正如後來表明的那樣，中國領導人只不過是表面上同意聲明。他們實際上是耍了花招，以便不陷入同其餘共產黨完全孤立的境地。

莫斯科會議之後，中國領導人繼續攻擊宣言和聲明所確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他們對堅定地遵循這條路線的兄弟黨發動了公開的鬥爭，開始組織和支持一系列國家中的各種派別集團和反黨集團。中國代表們企圖把自己的教條主義觀點強加於國際民主組織，並且力圖使它們的隊伍分散。

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重新討論爭執問題的必要性。我們曾對蘇共和中共進行會談的協議表示滿意和歡迎，並曾期待

會談會導致現有分歧的消除。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和散發今年6月14日信件以及採取一系列其他分裂活動，給會談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對偉大列寧的黨、對它的中央委員會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傑出的活動家與和平戰士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對蘇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對蘇共綱領進行了就其內容和語調來說是毫無根據和不能容許的指責。這封信對各共產黨和工人黨、對它們的政策和爭取偉大共產主義事業勝利的鬥爭進行了侮辱性的影射和攻擊；誹謗性地指責它們背叛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害怕帝國主義者，從組織上和精神上解除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武裝，諸如此類等等。

保加利亞共產黨極為憤怒地拒絕對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駭人聽聞的誹謗和攻擊。我們堅決抗議似乎各共產黨從屬於蘇共和蘇聯這種卑鄙的指責，抗議把同蘇共的一致和戰鬥團結說成是重複“別人的話”的做法。

蘇共和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進步人類中享有普遍的愛戴和深刻的尊敬。任何一個企圖誹謗和誣蔑它們的人，只會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恥背叛者、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可恥叛徒。

中國領導人在誹謗誰呢？

他們誹謗一個完成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黨，在這個黨的影響下，所有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都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誕生和壯大了。他們誹謗一個給予所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無限寶貴的兄弟援助，並且是世界革命過程的最強大支柱的國家。對這樣一個黨和國家的誹

謗，是对国际工人阶级、对革命事业的罪行。

保加利亚共产党是用无限忠于伟大列宁的党、忠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精神教育起来的。它至今都遵循和履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遗训：“为了确定谁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和敌人，谁是民主和和平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除了对待苏联的态度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加正确的标准，对待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检验每一个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每一个工人的政党和劳动人民的组织、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民主人士的真诚和正直的试金石。”

中国领导人喜欢教训其他党在估价事态时要有阶级立场。但是，当他们实质上重复帝国主义编造的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诽谤时，他们表现出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呢？

在这方面，回忆一下中国同志离开了他们过去采取的立场，这并不是多余的。他们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应当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头，这自然只能是苏共和苏联。在中共代表也签了字的1960年的声明中说：“苏联共产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

什么东西现在迫使中国同志放弃这个论点，而对苏共进行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呢？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形式下赋予自己权利，唯有它能解释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企图吗？

保加利亚共产党坚决摒弃类似奢望。它现在和将来都坚定地捍卫这样的论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公认先锋队是光荣的苏共；每个共产党人的起码职责是保卫它不受敌人和各种派别分子的攻击，对它爱戴和尊敬。

苏联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先鋒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于历史的意志和自己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中的领导活动所决定的。不是在別的国家，而是在俄国首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实现了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現在又在那里首先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別的党，而是苏共向各国兄弟党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为各国人民开辟了由資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現在又为全人类指出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否认苏共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先鋒队的作用，就等于否认客观規律和擯弃公认的真理。而这意味着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这个問題只能是这样摆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給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公开企图抛弃莫斯科會議制定的总路线，而把自己非常錯誤的观点当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来代替它。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总路线载明于莫斯科會議宣言和声明中。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所不能辯駁的。他們在自己的信件中承认两次莫斯科會議制定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承认两次莫斯科會議的決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因此，中国领导人的建議归結起来不是要制定一条总路线（因为这一路线已经有了），而是要修正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目前的这条总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声称他們站在莫斯科會議的立場上，他們为实现这些決議的革命精神而斗争，有什么价值呢？

莫斯科會議后几年来世界的发展完全证明总路线的正确

性，并为世界上的革命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带来了新的巨大的成就，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新的胜利。

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完全支持苏共在公开信中所表示的立场，国际发展中任何新的事实都不需要修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我们断然拒绝对共产党和工人党、首先是对苏联共产党所进行的诽谤性和捏造的攻击：硬说它们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任何一个站在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政党永远都不会支持类似的论调。

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出发点是对时代的分析。从声明中可以看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决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但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信中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时代的这种性质。他们实际上怀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现时代是对世界发展有强大影响的国际力量。

只有在正确地揭示和估计我们时代的矛盾的作用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

我们坚定地站在两次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认为在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中间，主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主要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根本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指责其他党，说它们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斗争的国际意义，为帝国主义的统治辩解，说它们以轻蔑的、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来对待民族解放运动。

保加利亚共产党愤怒地拒绝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的类似捏造。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它从根基上动摇了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巨大的规模，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同盟军。民族解放革命的巨浪正在瓦解殖民主义体系。

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挣脱了殖民主义桎梏或正在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和保护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民族解放运动严重地削弱着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地位，援助劳动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合作，以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牢固联盟是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和将来胜利的主要条件。

苏联共产党、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都奉行全面援助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路线。

苏共的这条路线也体现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里。纲领中写道：“苏共认为，~~同~~已挣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羁绊的各国人民的兄弟~~联盟~~，~~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这一联盟是以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切身利益的一致性为基础的。苏共认为~~为~~争取~~取得~~和巩固民族独立道路前进

的各国人民，援助所有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进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的决定性作用和它所奉行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政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采取这种立场是否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硬要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保卫者角色归于自己？这不是试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它的主要支柱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吗？

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论断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即：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把和平共处原则也扩大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殖民主义者和各国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去，认为在和平竞赛过程中，帝国主义会自动垮台。按照中国同志的意见，争取和平、裁军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的斗争是同工人阶级与被奴役人民的斗争相抵触的。只有那些有意歪曲真理的人才说得这样的话。

生活完全证明，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为世界上所有政治和经济搏斗——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争取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和汇成一股洪流创造着最有利的条件。在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同志之间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有着深刻的分歧。

在声明中曾把争取和平、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作为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得出结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壮大将创造条件，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之前，我们的星

球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有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我們坚持帝国主义本性沒有改变的立場。帝国主义者把战争看成解决国际问题的自然方法，他們在准备战争，他們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对和平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沒有消除。

与此同时，世界上形成了能够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的强大力量，它在日益壮大。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不再起控制作用了。声明中写道，“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們的世界战争计划的时候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在世界上存在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倦地奉行这一路线，苏共和苏維埃国家无疑在这方面有最大的功績。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坚定地遵循在莫斯科会议上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所制定的路线。

中国领导人在这些問題上也离开了莫斯科会议的路线。他們現在断言：在消灭帝国主义之前不能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和平共处是幻想；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

中国领导人所以发展这些概念，因为他們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在和平的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不理解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們不懂得现代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尽管他們把帝国主义說成是軟弱的和沒有危险的“紙老虎”，但是他們不相信，人民能够迫

使帝国主义放弃战争。由于陷入无前途和无希望的境遇，不相信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他们提出口号：利用战争来永远消灭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的牺牲，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巨大破坏。中国同志毫不犹豫地建议付出这种牺牲。

我们并不否定必要的牺牲，只要这种牺牲有利于革命的话。苏共和苏联各族人民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抗击希特勒侵略者和解放被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中曾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其他兄弟党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付出了可贵的牺牲。如果帝国主义胆敢把各国人民抛入世界战争的惨祸，那末，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付出必要的牺牲，以便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永世消灭。但是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中国同志的这些概念，实际上是要以世界战争来代替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他们看来，应当通过世界战争来解决革命的问题）。中国同志是不是这样想呢？但是这种论断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事情。这里回顾一下列宁如何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这些非常相似的观点，并不是多余的。托洛茨基分子当时鼓吹人为地推动革命和输出革命。不朽的列宁指出，这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把事情归结为牺牲亿万劳动人民的这种建议，是什么样的阶级政策呢！

由于离开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路线，中国同志宣布反对苏联解决加勒比危机、保卫社会主义古巴的独立的行动。

沒有必要重新提起有关加勒比危机的事实。但是，我們不能不強調指出，如果說我們的星球沒有被热核战争的火焰所包围，我国人民还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新的成就，而人类生活在和平之中，那么，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苏联和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个人，他們不屈不挠地保卫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古巴，用最坚决的方式消除了它所面临的美国武装进攻的危險，从而拯救了世界和平。

当苏共以自己的爱好和平政策保卫了古巴时，中国领导人显然企图加剧加勒比海的紧张局势，火上加油，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对局势发展的不滿，并竭力散布对苏联政策的不信任。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能够得出結論：誰在加勒比危机中真正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行动。

我們过去和現在都完全贊同苏共为解决加勒比危机的活动，并譴責中共领导的冒险主义的評价和声明。

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說：

“解决加勒比危机的任何其他方法、甚至狹隘、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任何最小的表現都会对世界的命运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轻视甚至无视爭取裁軍的斗争。他們宣布說，普遍裁軍是不能實現的；它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才有可能。但是在中国代表也签了字的莫斯科會議的声明中說，“实现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軍的計劃对人类命运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实现这一計劃就意味着消除各国間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这是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个問題：究竟哪一种是中国同志的真正見解，是他們現在在自己的信件中所持的見解呢，还是他們在莫斯科會議上签了字的見解？

中国同志断言，爭取裁軍的斗争是制造幻想。然而事情正

好相反。放弃爭取裁軍的斗争在爭取世界和平的各国人民中間产生不信任和前途渺茫的情緒，結果会是，他們应当袖手等待原子战争。中国同志所建議的东西将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放弃执行它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使各国人民摆脱战争的破坏和灾难。

最反动的帝国主义人物反对裁軍，他們正竭尽他們的全部力量破坏就这个問題达成協議。但是我們相信，进步人类可以迫使帝国主义分子同意裁軍，相信在現代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因此我們不指望帝国主义者发善心，而要指靠社会主义陣营巨大的、不断增强的经济和防御能力，指靠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指靠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爭取和平的积极斗争。

为和平而斗争——就是要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視战争挑拨者的野心和阴谋詭計，唤起世界人民对执行战争方針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組織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性，加强同一切不願意有战争的国家合作，把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們团结起来为反对战争而斗争。

中国同志炫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論点。但是在这个問題上他們实质上也只是編造宗派主义的公式，并用左的詞句加以掩盖，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文件，随心所欲地指責苏共和其他兄弟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現代条件下，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的。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最关心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它們能最成功地組織和訓練人民群众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上，坚持列宁主义的立場。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說之上。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发展中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所作的分析确定，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和平的或非和平的途径完成。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却指責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說它們把和平的途径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这是对它們在这个問題上的立場的沒良心的歪曲。

中国同志自己尽管也談和平与非和平的途径，但是他們实际上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途径。

誰要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形式，誰就是站在改良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的立場。誰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形式，并鼓吹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誰就是站在左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立場。中共领导在这个問題上正是散播这种立場。

中国同志非常喜欢談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們指責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說它們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轉到了修正主义的立場。然而，事实表明，不是別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变成頑固的教条。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永远活着和发展着的学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1957年与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杰出的和进一步的发展。被全世界共产党人称作是我們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苏联共产党新綱領是我們时代的最卓越的創造性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而中国领导人却执意

誣蔑这个卓越的文献——苏联共产主义建設的宏伟計劃。

保加利亚共产党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进步輿論一道，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及共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所作的深刻的有原則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共及共中央委员会为所有兄弟党树立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原則性和大胆无畏的榜样。全世界共产党人懂得，这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具有深刻的涵义和意义。連根拔掉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个人迷信、解放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維護和恢复列宁的遺訓和使苏維埃国家加速向共产主义发展，这是历史所必須的。几年以前，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工作作过高度的評价。

但是，后来在許多文章和讲话里，同样在今年6月14日的信件里，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原則性問題上来了个极劇的轉变，并扮演了个人迷信思想和政策的保卫者和宣传者的角色，继承了个人迷信的工作与领导的制度和办法。但是，他們把被实际生活所抛弃的个人迷信理論和实践强加于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有那些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精神的人，只有不考虑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进步变化的人，才会给自己提出这种不令人羡慕的和不能实现的目标。

我們不能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即：由于斯大林有功，就应该避而不談斯大林的严重錯誤，甚至他的罪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是应该巩固的。但是，他們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忠实的活动对于巩固他們的威信具有最大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遵循其教条主义的概念，抛弃了体现在苏联共

产党纲领里的有关发展苏维埃国家为全民国家和有关把苏联共产党变成全民党的观点。但是他們的論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苏联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使得有必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剝削阶级和集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国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生命力，同时也揭穿了中國领导人方面的公开维护个人迷信是站不住脚的。

我們党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里吸取了教訓和希望，尖銳地譴責了对伏·契尔文科夫的个人迷信，并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結合我們的条件恢复并发展了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則和准則。

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基本問題上的錯誤观点在他們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团結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继续。他們在口头上声称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結，而实际上采取破坏这个团結的措施。

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是导致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方針。

在对我国的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縮小彼此互利的经济联系的措施。保加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貿易交換額迅速增加，而最近两三年来，我們同中国的貿易由于中国同志的过錯，縮減了大約五分之四，这使我們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損失。

中共领导为了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限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政策辯解，目前正在宣传“自力更生”的理論。

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动员人民力量和国家資源，这是正确的道路，它始終不渝

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但是，当中国同志提出“自力更生”的理论时，考虑的不是这点。他们以这种理论来对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协作和专业化，并且提出实际上是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主张。

中国领导人对下列事实甚至不敢提一个字：为了在社会主义互助、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原则上进一步团结社会主义阵营，苏共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进行了巨大的积极的活动。他们绝口不谈苏联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的兄弟般援助，而这种援助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相互关系的核心。而大家知道，这种援助是多么巨大。仅仅我们这个小国就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十二亿卢布的最优惠贷款。以这种援助在我国建成了七十三个企业和车间，另有三十二个项目正在建设中。迄今，苏联已经向保加利亚提供了三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多得多的援助。但是，现在，中共领导向苏共和苏联发动了令人愤怒的攻击，指责它们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靠损害别的国家来为自己谋利。这是多么荒谬。

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给予和继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的兄弟援助。这不能不引起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正直的人的愤怒。

中国领导人不断地重复，他们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确定兄弟党之间的正确关系。但这只不过是烟幕，其目的是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活动和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着派别活动。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暗讽说，苏共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

上，粗暴地干涉它們的內政。

实际情况怎样呢？

苏共在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好和与人平等的原則。从来没有哪个党像苏共那样，在过去和现在給予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以最无私的兄弟援助。

以前中国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毛澤东同志在1957年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會議上說：“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同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拒絕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損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但是，現在中国领导人背弃了自己的話。

中国领导人指責說，苏共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干涉它們的內政。这种指責不能不在它們的队伍中引起极大的憤怒。这种指責是对兄弟党的不公正的誣蔑。

事实表明，不是苏共，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自封为它們的监护人，总想教訓它們，对它們的活动进行最粗暴的干涉。这一点近来表现得特別明显。在这方面有許多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领导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有类似的表现。

中国同志对我们党和我国采取了不友好和傲慢的态度。应当如何评价下列事实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索非亚大使館不尊重我們党和我国的主权，不经我們有关机构的同意，非法地在保加利亚散发中国共产党今年6月14日的信件。

信件被大量地散发給各級党机关和国家机关、企业和合作社、文化科学机关、社团和某些人，其中包括被开除出党的人。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促請中国駐索非亚大使館注意这种我国认为不友好的行动是不能容許时，大使館声称，它不能接受我們的警告，将继续散发信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

中国代表在我国的这些举动和其他类似的举动，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旨在破坏我們党的团結的粗暴的派別活动，看作是对我們党内生活的粗暴干涉。

中共领导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下，公开号召共产党和工人党內部的分裂。只有那些不珍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只有那些走上了派別斗争道路的人，才会这样做。

中国同志在信中就阿尔巴尼亚問題对苏共进行了很多誹謗。他們不顾起碼的事实，企图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处境归咎于苏共和其他党。但是，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早在1960年就以自己的左傾机会主义的政纲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商定的路线，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敌对的行动，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組織了心怀叵測的宣传运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對我們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誣蔑。

保加利亚共产党同其他共产党一道，过去和現在都坚决譴責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的队伍中进行的公开的分裂活动。

我們怀着憤怒的心情駁斥中国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問題上对苏共的誣蔑。中国领导的立場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蓄意唆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去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继续利用他們作为中共领导的錯誤观点和行动的代言人。

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采取主觀的、預謀地否定的立場。我們认为，不能像中国领导人对待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肤浅地評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妨着重指出，七、八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并不否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在后几年里，那

里的社会主义陣地巩固了。

显然，他們現在采取这种立場是由于想要詆毀奉行同南斯拉夫接近的路线的苏共和其他党所执行的政策，阻挠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陣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我們并不掩飾，我們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之間在原則性的意识形态問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分歧而否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它孤立于社会主义陣营之外，并把它推向帝国主义陣营。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执行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对任何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我們应当声明，中国領導人的攻击和指責并不能迫使我們国家和我們党放弃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南斯拉夫寻求相互諒解。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是所有兄弟党的首要任务。面对着指望加深我們之間分歧的我們不共戴天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新战争挑拨者，这一任务具有更大的意义。

苏共正在对加强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斗争作出最大的贡献。

在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强调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負責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們曾经尽了我們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們的一切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真正团结，只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則上建立和加强。这方面的基础是兄弟党共同制定和

一致通过的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这意味着坚定地遵循在这两次會議上所确定的总路线，始終不渝地反对背离这条路线；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左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把另一条总路线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不是加强而是破坏它的团结，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和叛徒的磨盘中注水。

保加利亚共产党今后仍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一起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作出一切努力，将继续积极地促进克服同中共領導的分歧。但是，这不光是取决于我們，这主要取决于中国領導人的行为和行动。遺憾的是，他們至今大力一貫地、頑固地继续采取共有害的行动，继续执行其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路线。

保共中央委员会对中国领导人同苏共和各兄弟党的分歧表示很大忧虑。为了共同目标（它把中国人民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我們党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加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道路。

我們党从自己方面将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像至今所作的那样，为加强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无往不胜的旗帜下的团结，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更加团结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并将对正在反对殖民主义、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給予援助。

保共中央委员会給予苏共中央委员会7月14日的公开信以最高的评价，认为这封信也是保共中央委员会对我国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个公民的声明，并认为有必要在各地开展工作以便最广泛地闡明和学习这一信件。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全体保加利亚的劳动人民都会正确地理解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消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而进行的斗争，深信他们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了在实际中实现保共八大的决议、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指示和国民经济计划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8月1日

于索非亚

（译自1963年8月4日保《工人事业报》）

忠于列宁的党，反对教条主义 和分裂主义

《工人事业报》社論

7月31日和8月1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采取的旨在反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以及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的方针和行动，说出了自己的正当、真诚和令人信服的话。全会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名义，无保留地赞同苏共中央今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针，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远景，完全同意和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分歧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声明中援引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的卓越的话——这些话已成为对后代人的义不容辞的遗训——表示了全党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世界上一切共产党人和正直的社会党人的内心的思想和感情。的确，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话中使人感到多么有历史意义的真理和政治上的英明，对苏共的事业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有多么大的信心。他说：“为了确定谁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和敌人，谁是民主和和平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除了对待苏联的态度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加正确的标准。对待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检验每一个活动家、每一个工人的政党和劳动人民的组织、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民主人士的真诚和

正直的試金石。”以对苏共和苏联无限忠誠的精神教育起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我国的劳动者現在履行，今后永远要履行領袖和导师的这一坚定不移的遺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踐踏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原則立場和決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觀念，在近年来开辟了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全世界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线。正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中正确指出的，他們誹謗一个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在这个党的影响下，所有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誕生和壮大了。他們誹謗一个給予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无限宝贵的兄弟援助，并且是世界革命过程的最强大支柱的国家。由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支持苏共和苏联的正确立場和普遍有利的行动，中国领导人便对这些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我們党和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进行无端的指責和卑鄙的誹謗。誹謗与指責苏共和苏联、咒罵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反对社会主义陣营一致和团結的战线，这是对国际工人階級和革命事业的犯罪行为。

最近以来，中国领导人愈来愈大规模地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間关系上、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的声明便是中国这一做法的鮮明可恨的表现。中国政府声明违背理智、邏輯和一貫性，宣布反对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中国政府的这一个充滿謊話和支吾搪塞、充滿对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誹謗和誣蔑的声明，堪称为美国、西德或法国的某个“狂人”的手笔，而不可能是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发誓信奉馬克思列宁主义、大讲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人所写！正如苏联政府的答复声明所強調指出的，中国政府不能“不明白，当然，它走上这条道路，会給社会

主义陣营的团結造成直接的損失，削弱反帝的統一战线。这种行动只会使和平的敌人感到高兴，因为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拆散和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伟大团結，从内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保加利亚全体人民痛心而憤慨地譴責中国政府誣蔑性的声明，并摺弃其中有关禁止核武器試驗問題的不正确的、有害的立場。我国政府已经闡述了自己对待莫斯科协定的积极态度，并代表全国人民表示准备在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上签字。

无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还是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件，都指出并譴責了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竭力想把自己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1957年和1960年公认的立場毫无共同之处的、违背社会主义陣营利益和危害世界整个革命发展的“总路线”强加在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身上。中国领导人这种显然是出于片面的利己目的和欲望所驅使的企图正受到并将受到包括保共和社会主义保加利亚在内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坚决回击。同时，我們党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一道将尽一切力量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无往不胜的旗帜下的团結。与此同时，我們党再次呼吁中国同志沿着消除分歧、加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結的道路前进。

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它正确而始終一貫地表达了同苏共和苏联、同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定不移团結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国的党员和預备党员以及劳动人民将以此为基础献出全部力量，促使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胜利，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更加紧密地团結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譯自1963年8月5日保《工人事业报》)

保加利亚通讯社的声明

保加利亚通讯社受权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3年7月31日的声明发表声明如下：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热烈欢迎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条约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的新的证明，它有助于防止放射性物质对人的周围环境的污染并唤起这样的希望：可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采取新的步骤。下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苏、美、英三国政府在条约中宣布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宗旨尽速达成在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协定。

世界舆论对这个条约的自动支持、绝大多数国家表示准备参加这个条约，这都表明各国人民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世界热核战争危险、保障和平的不可遏止的愿望。

各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全面彻底裁军才能永远消除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通向这个目的的每一步都使得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欢欣鼓舞，有助于动员新力量为和平而斗争。

正因为这样，保加利亚政府和我国人民才断然拒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今年7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中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表现的不正确的立场和对苏联及其政府的诽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过去支持，现在也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始终一贯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及其在1963年8月3日发表的声明中所表现的正确的立场，因为这完全符合于保加利亚人民的主张、愿望

和切身利益，完全符合于保加利亚政府始終一貫的爱好和平的政策，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

大家知道，宣布反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試驗核武器条約的是那些热衷于保持和加紧国际紧张局势和軍备竞赛的最反动的势力。这是美国的所謂“狂人”、西德复仇主义分子和法国統治集团的极反动分子，这些人为什么反对这项条約，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怪的和使人疑惑不解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宣布反对这项条約。

它在今年7月31日的声明中說，簽訂条約是为了三个核国家“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縛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看法，在莫斯科締結的条約是“一个大騙局”，是“愚弄‘全世界’人民”。中国领导人誹謗苏联同战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勾結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誹謗苏联政府“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保加利亚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怀着极其憤怒的心情摺弃这种駭人听闻的誹謗，这种誹謗的目的是反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結；并給爭取和平、爭取全面彻底裁軍和爭取国际合作的斗争造成更多的困难。这种矛头指向反对苏联——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并且是各国人民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支柱的主要力量——的路线，只是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苏联拥有火箭、核武器对维护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保证着最有利的条件。

人們自然要問：为什么中国領導在它今年6月14日的信中宣布全面彻底裁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它虽然承认就裁軍达成某些協議是可能的，可是現在当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試驗的条約的时候，它又指責苏联說它背叛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每个了解世界上当前情况的人都知道，全面彻底裁軍不会立即达到，必須做不懈的和耐心的努力，来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問題。那么怎么能够硬把作为解决裁軍問題的第一步的条約說成是“欺騙”人民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呢？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會議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几天之前說：“中国領導人不是对具体情况和条件进行冷靜的分析，不是灵活和創造性地对待国际問題，而实际上是向我們提出这样一个公式：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怎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采用这种尺度？用这种拙劣的武器怎么能指望取得成就？……

“中国領導人的公式只能使我們脫离群众，使我們同‘狂人’——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疯狂的反对者——处在同一个陣地。事物的客观邏輯就是这样！”

中国領導人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試驗条約抱否定态度，是由于他們离开了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同通过的在和平和战争問題上的立場。

显然，中国政府懂得它对条約的否定立場是极不受欢迎的，并且害怕这种立場使它陷于孤立，于是竭力造成一种印象：它有“自己的”裁軍方案。其实中国的建議並沒有任何新东西，所有这些建議过去都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过。但是，仅仅提出建議是不够的，应当进行爭取裁軍的实际斗争。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平心靜气地和冷靜地估价国际局势，如果它对和平共处的問題采取正确的态度，并使自己的力

量汇合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的洪流中，如果它将帮助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团结的话，保加利亚政府将对它表示欢迎。如果中国政府将走这条道路，那么，这将符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利益，符合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

1963年8月7日于索非亚

(译自1963年8月8日保《工人事业报》)

在亚姆保尔市一家新建的 “童佳”紡織厂开幕式上的讲话(节譯)

迪·迪莫夫

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亲身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結、合作和兄弟援助，首先是苏联的援助，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巩固、我們祖国民族独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对保加利亚人民來說，除了继续巩固和发展同社会主义陣营的兄弟国家，首先是同伟大苏联的团結和合作之外，别无其他发展的道路。我們將永志不忘我們的苏联兄弟在消除经济落后状态和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向我們提供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我們的所有較大的建筑都是保苏牢不可破的的友誼的成果，所有这些建筑都受到这种友誼的朝气蓬勃的光芒的照耀。正如托多尔·日夫科夫所說的那樣，“對我們來說，最最首要的要求是保护、巩固和发展保苏两国的友誼。我們要让我們的子孙后代把这个要求奉为最神圣的遺訓”。

因此，我們將永远不傾听这样的人的声音，他們号召首先考虑“自己的力量”来建設社会主义，宣布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共产党之間的团結。

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員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坚决駁斥中共領導人的分裂活动，一致贊同和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保共中央声明，表示无条件地拥护苏共的路线以及反映在莫斯科會議文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譯自1963年8月20日保《人民同志报》)

沒有邏輯！

托·巴甫洛夫

—

當我們在談話或論戰中說自己的對手沒有邏輯的時候，實質是想說他所維護的思想，在該情況下不代表真理。在這個意義上，合乎邏輯和符合真理是作為同一概念被應用的。我們有意無意地以作為真理的科學的邏輯的經典定義為指導。

還是列寧曾經說過的，包括在邏輯學中的基本範疇、法則、形狀、推理的規律等等，實質上都是人類重復億萬次實踐經驗的總和及結論，因而它們具有公理的意义。這就是說，當我們思維合乎這些範疇、法則和邏輯規律等的時候，不管是傳統的（形式的）邏輯、數學的（符號的）邏輯，或者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合乎邏輯實質上意味着反映了千百年的人類的實踐，即意味着這種當着過程和結果的思維符合千百年人類實踐的總的經驗。

在這裡不光是涉及人類科學思維的技巧的方面，而且正是涉及它的認識的或邏輯的方面。單純思維的技巧規律實質上可以用數學計算的和各種類型的控制機表達出來。正如經驗已證明的，它們機器甚至比活的人腦完成這些任務的時間短得無法比較，其進行的那種規模和那樣的準確是人腦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但是人腦保留着自己特有的功能，不是提出和解決技術性的任務，而是提出和解決邏輯上的、認識上的、創造性的任務。

我們再一次聯想到，實踐不僅是人類真理的基礎、目的和鑑定者，而且是人類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按照邏輯規律進行的認識的過程和結果的最高標準。讓我們簡單地舉幾個例子來證實剛才講過的關於邏輯的要求或者按其本質是同樣的東西；證實當在這種或那種情況和程度上缺少邏輯的時候——傳統的（形式的）、數學的（符號的）或辯證的——對於人類科學思想的危險性。

二

所有國家和各個時代的人民都懂得，例如小麥和其他有益的植物是人類栽培的，莠草則不是人類種植的，而當莠草自生在麥苗中時，就必須鋤掉、扔掉或燒掉。莠草這個詞的本義就表示是一種不需要栽培而需要鋤掉的植物，也就是使作物擺脫莠草的影響。

如果我們向任何一個有健康理智的普通勞動者建議他把麥子與莠草以同等或不等的數量一起播種，他會對我們感到遺憾和可笑，並且將會與我們向他建議的正好相反的去做法，僅僅播種上小麥或玉米，而將鋤掉、拔掉和消滅掉不受欢迎的莠草。

保加利亞讀者還記得，大約六、七年以前，在我們的一家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領導人所制訂的喧嚷一時的文化“總路線”的文章，“總路線”的口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條路線同蘇共、保共和所有新型的列寧主義政黨的路線相對抗，這些政黨從未建議栽培和愛惜莠草，尤其沒有建議把莠草同小麥和其他作物一道播種，然後再鋤掉、拔掉和燒掉這些莠草。

無論從那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很清楚，中國同志的“路線”，即使假定它里面有部分獨特的看法，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也都不可能推薦，實際上也沒有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接受為

对待文学、艺术和总的对待文化的态度。

最近中国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这个某个时候的“路线”，我不清楚。但是缺少逻辑（这种缺乏逻辑的现象已如此明显地美化了刚刚提到的文化“路线”），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现今的文件和行动里，特别是最近的两个文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中国政府就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声明》里也可以看出。

只要读者阅读和比较一下苏共中央公开信、保共中央声明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上述两个文件的有关章节，就会确信中国的文件明显地缺乏逻辑，不仅是缺乏辩证逻辑，而且是起码的形式逻辑，同样地，这些文件明显地不符合客观真理、客观世界形势和不符合各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国人民的现实革命任务，也不符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和平运动等的现实革命任务。

至今发表的全部回答和批判涉及的两个中国文件，看出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和程度上都说明这些文件缺少逻辑，即不合乎现代世界现实和前景的客观真理。

这里，我将仅仅说明两个例子。

三

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是列宁和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都已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过，多数工人的协作和有目的的行动所具有的力量，是一质量上新的力量，它超越他们每个个体力量的简单数学的总和。每一个资本家工厂主利用这一事实，只对使用工人的个体力量给予报酬，实质上对使用工人的集体力量不给任何报酬。这种集体力量所能做的工作是个体力量的简单总和所不能做的。

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早就強調指出，在帝国主义经济和商业的条件下，資本、生产、交通、資金、新聞等的聚积和集中使資本托拉斯和卡特尔取得优越地位，保证使用更高技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資本主义厂主和資本主义国家有可能更多地剝削和压迫工人、劳动农民、小私有者、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

在我們时代，我們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企业千方百计地联合其经济、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对工人、农民、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剝削，主要是要取胜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辯证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者知道，并且任何时候也不忽視，資本主义的整体化不能认为会改善劳动群众和各国人民的状况，而是恰恰相反。

列宁曾經說过，对于帝国主义資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會計和新聞机构，共产党人可以保留并加以有目的的利用，根据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商业的需要加以改造，实质上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前提之一。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这里有着深刻的邏輯，这不仅是形式邏輯，而是真正的辯证邏輯，总之这是列宁及其創立和領導的新型共产党的科学思想和革命实践的特点。

正是这个新型的列宁主义政党还在以前，特别是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成了一系列措施和組織形式的倡导者和鼓舞者，这些措施和組織形式也包括经互会的系統，来实行协调和专业化，一句話，联合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经济、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的质量和品种，并加强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团结、力量、坚定的目的性，不

仅提高防卫能力，而且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方面的军事的和其他的挑衅时，进行决定性的进攻。

参加经互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无私帮助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成就，不说苏联本身的伟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就足以证明日益增进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路线的正确性；证明日益加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一切运动团结的正确性。这里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对于谈到的那些文件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其他作品和声明就不能这样说了。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是事实，中共中央“关于总路线的建议”中提議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可能的方针，因为不然相应的国家就有丧失民族独立的危险！

我们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以及全部报刊都说，实际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并且应当寻找和正确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可能，但这完全不否定，而是要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相互援助。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按其地理和自然条件、按其工业和技术经验、按其交通和商业机构等往往差别很大，以致于它们特别是那些比较小的国家，如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仅仅靠自己的工业、农业和其他的资源、干部、经验，要满足自己全部建设需要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实是，每个国家的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有色金属都不一样，而所有国家的需要是巨大的，这些如不能得到满足，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正常地和加速地发展。

对我们的读者，不需要再重复每天发表的关于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从解放以来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巨大的、无

先例的、无私和兄弟般的援助的数字。如果没有这个援助，我们就会停留在农业国的地位，正如希特勒所认为那样。当时，希特勒有意识地阻碍保加利亚的工业化。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实行协调、专业化、一体化情况下，不仅会加强每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实力，而且还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整体的实力。这个整体实力反过来又推动并保证以苏联为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加速的发展。

当几年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甘情愿地、高声感谢地接受苏联的经济、军事和技术的无私援助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援助同分裂、削弱和破坏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团结的“新的总路线”没有和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更具体的看出，中国党政领导人提出自己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总路线”的内部原因、理由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偏偏在现在，并且使用这种使许多人感到突然的形式和语调把它首先强加给亚洲的共产党和人民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党和人民，并且恬不知耻地利用帝国主义的各种通讯社、无线电广播、电视等来为他们效劳。

在目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总路线的建议的确是毫无逻辑，也就是说，这个建议同人类、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革命实践背道而驰。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采纳这一建议，并付诸实现，那么将意味着：让四分五裂和日益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阵营去对付团结一致的并进行努力使在各个方面更加一致的资本主义阵营，从而使帝国主义经济学家、政客、军事政客和文化政客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把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击破，实现他们反共的最终任务。

当然，这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仅没有削

弱，而且其規模范围和增长越来越大，超过帝国主义陣营力量的增长。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实行全面的一体化、协调、专业化、共同計劃等才有可能。这不仅加速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同时也加速每个加入这个陣营和同这个陣营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上面已经指出，缺乏任何邏輯，播种上莠草然后再把它割掉。同样，使社会主义国家失去相互的支持和相互的援助，失去政治上和各个方面的一致，然后让每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不仅要抵抗团結一致的帝国主义陣营，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彻底地战胜它，也是沒有任何邏輯的。这里可以有其他东西，可是偏偏缺乏邏輯，传统的一形式的邏輯、数学的一符号的或者是辯证唯物主义的邏輯都沒有。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和有什么打算，这样明显缺乏邏輯地来論证和維護自己“新的总路线”，这可以成为一系列专门文章的題目。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只要說一下以下这点就够了，即：正是在这条“路线”里缺乏任何邏輯，因而这条路线是完全不符合当代世界现实和科学真理以及我們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和前景的。

四

只要讀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的这样一段話就足以說明不管爭論的有关方面的願望好坏，缺乏任何邏輯可以导致何种地步。这段声明写道：“应当毫不含糊地肯定，必須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必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黑体是我标的。——作者)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維護世界和平。”

保加利亚讀者知道，在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以及保共七大和八大的报告和決議中所坚持的正是这种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在最后这样提出来，似乎这些主张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現在初次发明和提出来的。

我們大家都贊成彻底裁軍，銷毀全部核貯备，禁止一切核試驗，撤銷一切在外国的軍事基地，建立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等无核武器区，不以任何形式輸出和輸入核武器和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資料等等。

这是所有各国人民的要求。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这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要求。但是所有这一切能够一下就都达到嗎？当然不可能。在我們的星球里找不到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所有这一切通过一次行动、一个条約、一次努力，尽管是全体进步人类的努力，就能够一气呵成。但是，最有趣的是中国文件本身，在上面列举的那一段里提到**逐步实现完全禁止和彻底消灭核武器**。

但是，如果按照邏輯的規律——传统的一形式的、数学的一符号的或者是辯证唯物主义的邏輯規律来审議这一点，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結論呢？为什么在中国的文件中建議**逐步禁止和消灭核武器**以至达到其完全禁止和消灭？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又如此疯狂地，以这样的調子和誹謗性的指責来攻击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呢？

苏联方面根据逐步的原則、根据通过談判而不通过核战争解决爭端的原則，提出继续这个条約的精神簽訂北大西洋条約国和华沙条約国之間的互不侵犯条約、和平解决德国和柏林問題条約、逐步的而又彻底的裁軍条約等等。

这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总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的末尾虽然口头重复这条总路线所包含的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以前声明本身却完全否定这些原则，并指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签订第一个条约时就没有全部达到、没有全部解决、没有实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任务和目标。

难道这里有一点起码的逻辑吗？

很清楚，没有逻辑。因而中国领导人所讲的就和声明最后所讲的完全背道而驰，中国领导人在声明开头就信口开河地认为这个条约将会“阻止无核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试验和生产核武器。”“声明”中正是这样说的！

总之，中国政府想得到允许和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核武器和试验核武器。然而，把这种思想同后来所引证纲领性条款比较一下，即使你不是优秀的逻辑学家，你自己就会发现，这里缺乏任何逻辑，甚至是最起码的逻辑，也就是说，在这里，中国领导人完全违背了客观真理。

每一个阅读过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保共中央声明的人都会确信，通过谈判逐步地和平地解决完全禁止和彻底消灭核武器问题的道路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和我们时代世界现实的可能性和前景的，也会确信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分裂，而是越来越紧密的团结；不是分歧，而是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致；不是集团分裂活动，而是铁的革命纪律——永远不变地建立在战无不胜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在马恩、恩格斯和列宁的光荣旗帜的指引下。

（译自1963年8月20日保《工人事业报》）

充当着“狂人”右翼的角色

《工人事业报》社論

的确，只能这样来判断中国领导人在禁止試驗核武器条約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从这个立場出发，他們現在对苏联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大肆进行下流的誣蔑和卑鄙的謾罵。正如今天刊登的苏联政府声明所正确指出的，看来，中国語言中的全部剧烈字眼都搬进了进行肆无忌惮反苏运动的中国报纸、搬进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

但是，让我们撇开中国政府声明所充滿的卑鄙言詞和不能容忍的誣蔑，虽然这些已经十分清楚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对待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已堕落到下流的地步。而重要的是，北京政府的官方文件继续充滿着新的捏造、誹謗、奇談怪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表明中国领导人完全脫离生活，忽視现实，企图把世界的发展引上他們任意臆想的并且危及各国人民的道路。例如，他們硬說，由于簽訂莫斯科条約似乎“战争的危險增加了”，苏联在这个条約上签字似乎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了損害”，以及其他类似的誹謗。特別令人憤慨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其官方文件中泄露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国防有直接关系的情报，以此为帝国主义效劳。

苏联政府声明說得完全正确：“如果說，中国新近发表的声明使人相信什么的話，那么，唯一使人相信的是，中国政府在对待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的态度方面，現在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接近，而且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

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

我国的輿論完全贊同苏联政府声明，并把它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團結的誹謗者和破坏者的应有的公道的回答。苏联声明的内容充分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有害立場和分裂活動的真情。這項声明表达了所有保加利亚共產黨員和我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观点和願望，因为苏联的一整套政策完全彻底地符合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的立場和目标。保共中央声明說，“我們代表保加利亚全体共產黨員表示完全贊同苏共中央的信件，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其所闡述的見解和立場。”而托·日夫科夫同志表达了我們党和人民的意志，就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中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表示“我們党和政府以及我国全体人民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起欢迎这一决定……。这是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以及尼·謝·赫魯晓夫个人为防止世界战争、爭取裁軍和巩固世界和平，始終不渝地、坚忍不拔地、孜孜不倦地活动所取得的成就。”

这是一种明确而又坚决的立場，这是对苏联政策的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苏联的政策也就是我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憤慨地摒弃中国領導人那种冒充各国人民的最高发言人和代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人民講話的厚顏无耻的企图。

我們党和我們国家在再次摒弃中国极端有害的立場和行动并贊同苏联政府声明的同时，正在勇敢和不屈不挠地沿着既定道路前进，而且将一如既往，同其他兄弟党一道竭尽全力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下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團結而努力，并将帮助正在反对殖民主义、爭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

（譯自1963年8月22日保《工人事业报》）

为伟大的目标服务的政策(节译)

《工人事业报》社论

据报道，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的有七十五个国家。这是一个有力的数字，它很能说明问题。大家知道，反对条约的有美国“狂人”，法国极端主义者和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发言人本月15日的声明表明，中国领导人以自己对待条约的态度充当了好战分子右翼的角色，自己暴露出是顽固地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此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利用自己对待条约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又咒骂起苏联的对外政策，诽谤苏共和苏联政府所遵循的路线。在上述的北京声明中，不择词句地攻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立场的苏联立场。中国报纸和电台的肆无忌惮的咒骂在这个官方的文件中占了很大的地位。但是很明显，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和大唱高调的方法是掩盖不了中国领导的执迷不悟、甘作死教条的奴隶和居心叵测的企图。北京热心地乘机大谈“国际主义义务”，但是用这种办法是迷惑不了各国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各大洲和各国的人们坚决地摈弃建立在未来的热核战争中亿万人死亡的基础上的政策。中国领导人顽固鼓吹的这种路线和政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人类的。

(译自1963年8月25日保《工人事业报》)

我們的时代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針

托·甘切夫

中国领导人許多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行动是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立場出发的，因此，对我們的时代作出了严重錯誤的評价。

大家知道，列宁认为对发生各个政治事件的历史时期作出正确的評价是十分重要的。按照列宁的意見，只有在对历史时期作出了真实評价的基础上才能制訂出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按照列宁的看法，为了正确地确定历史时代的特点，必須确定“即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

只有对现实采取創造性态度，只有一貫应用辯证唯物方法才能对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方向作出正确的分析。每一个离开了这一主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企图把活生生的生活置于八股和死板公式的框框里的人，就会陷入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立場，破坏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本身的基础。中国领导人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們离开了共同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而把自己不正确的观点硬要作为新的总路线。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和实际之間豎起了教条主义的长城。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閉目无視嗎？

在过去的半世紀，世界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是无能为方来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已越过一国的范围并成为世界体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結束了資本主义的绝对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的变化也終止了当时苏联所处的包围状态。

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最重要的方面显示了对資本主义的优越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是以資本主义无法达到的如此高速度发展着的。实现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空前的繁荣。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各国建立了第一流的国防威力——保证社会主义各国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后盾。团结在强大的世界体系內的社会社会主义各国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时候来到了。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們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它在爭取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爭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团结着約九十个党，拥有四千三百万党员。

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兄弟般的支持和援助下，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着，已经在五十多个国家內取得了胜利。殖民主义的深刻危机已经轉变成为可耻的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

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帝国主义，深深地动摇了它的地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人类命运全能的支配者的地位已经进入沒落和死亡的时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基础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当前时代給予了完整的評價；1960年声明說，“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接着又说，“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社会主义体系。”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得出结论，现时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帝国主义已不再能决定人类的命运。现在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是决定于社会主义的力量。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两个社会体系的矛盾。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声明上签了字，现在他们却公开攻击对我们现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歧，对决定社会发展方向主要力量的估价。

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文件中对兄弟党进行了荒谬的指责，似乎除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外否认有其他矛盾的存在。同时他们硬说，虽然这个矛盾是“特别尖锐”，但这只是矛盾中的一个。在《人民日报》反对陶里亚蒂同志的文章中，他们写道：“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起来，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是比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更深刻，更强烈。

在中国领导人很多材料中，有的是公开地，有的是半公开地强迫推行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主要因素；最多只可以成为真正革命运动的“后方”。他们毫无迟疑地还指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似乎这工人运动已

经蜕化了，并已墮落为修正主义的俘虏，因此已不能再解决革命任务。

中国领导人把什么当成是当前矛盾的中心，他们把哪个阶级置于时代的中心？

在今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按照中国领导人说法，社会主义阵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而只有民族解放运动才给予这样的打击，只有它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领导人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更露骨地发展这一路线：“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由此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很难确定在这种以极端革命词句掩盖起来的理论里什么成分更多：是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呢，还是目的在于损害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从中取得可疑的利益的政治上的权术霸道呢？中国领导充当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唯一的维护者的角色就是想从中取利。

中国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时代的中心，是完全违反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許多已经燃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的国家里，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而在許多这样的国家里，如在中非的許多国家里，也还没有成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族解放运动使帝国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和处于动摇它的地位，即使是在新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实现了或多或少的激烈的措施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也还不能解决消灭资本主义的問題。这个問題只能在工人阶级及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起决定性作用，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援和合作的情况下得以解决。那末，什么阶级立場能把民族解放运动当或是反帝斗争的主要力量和领导的角色，把这运动宣称是决定性的因素，并表示支援这一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呢？

民族解放运动在我们时代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和强大并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不仅是因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积极地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他们在其余的时代里所进行的类似的斗争也并不弱），而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自己的斗争削弱了帝国主义，因为目前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以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威力和对各国人民解放斗争坚决的支持大大地限制着帝国主义者用过去惯用的殖民战争、干涉等手段来维护它的殖民统治的可能性。这一点对每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非常清楚的。

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是为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诚挚、忠实的朋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完全胜利，如同消灭资本主义体系斗争的胜利一样，首先有赖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有赖于工人阶级及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

中国领导人所加劲宣传的“理論”使每个不抱成见的人得出这样的結論：他们追求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人相信世界革命的中

心已轉移到東方，不發達的、受剝削的和遭到非法待遇的各大陸的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真正的革命力量，這些大陸的國家為了自己共同的利益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富足”和“溫飽”的西方。在這種“理論”里，連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子也沒有了。這些理論強烈地散發着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臭味。

從這樣的錯誤立場出發是不可能支持和執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兩次莫斯科會議上共同制定和一致批准的路線，這是完全自然的。多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就脫離這條路線，在行動上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方針背道而馳，現在已經又公開提出制定新的總路線，而把他們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立場作為這條總路線的基礎。但是正如蘇共中央公開信所指出的，“中國領導人以‘總路線’為名所建議的東西，無非是不考慮時間和現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不考慮現代歷史階段的特点而羅列工人階級的最一般的任務。”

在宣言和聲明中規定，在現階段反帝鬥爭面前占一切任務中心位置的是制止熱核戰爭。

中國領導人從這個立場倒退了。宣揚輕視世界戰爭和以必須犧牲的革命口號來作幌子，他們向人類提出為了革命的勝利，在世界熱核戰爭中要提供億萬具死屍的建議。

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各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要利用一切方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任務。但是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也后退了。他們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責一系列共產黨是修正主義，因為放棄革命發展的非和平道路，而他們自己卻把革命的暴力形式絕對化，並在實際上宣告在這個問題上反對聲明。

在莫斯科會議上一致批准了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之間建立相互關係所必須的基本原則。在聲明中寫道，團結一致增強我們運動的力量，並為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勝利前進和為

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建立可靠的保证。

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方针。他们掀起疯狂的分裂世界民主组织的活动，组织和支持某些国家里的反对本国党的各种分裂分子中的反党集团。他们不止于此，还竟然不尊重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是自己公认的先鋒队的伟大苏联共产党的无可争辩的崇高威望。中共领导人对苏共进行如此的诽谤和攻击，如此恶毒地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共同方针，以致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领导人难道不明白，他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的分裂和派别活动能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制造严重障碍，为我们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制造困难，甚至使他们陷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站在同一立场上去。

中国领导人极其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还表现在拒绝参加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他们提出了诽谤性的宣言和声明来反对苏联和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宣称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苏联政府声明所指出的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府在对待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方面，现在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打成一片，而且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的正确性在莫斯科会议后几年内世界的发展中得到证实。坚持不懈地贯彻这一方针给革命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带来了新的巨大成就，给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新的胜利。

因此，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把维护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共同

路线作为自己的职责。他們的这一观点反映在同中国领导人的爭論中坚决支持苏共的立場。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中表明，“不管中国同志的意见如何，现时代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确立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现在帝国主义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

印度共产党坚决譴責中国领导人的立場，在声明中写道：“中共在民族解放斗争問題上对苏联的謊言和誹謗，任何时候都不能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記憶中抹煞他們对苏联、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爭取解放的世界运动最强大和忠誠的保护者的自身经验。”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称，“担心和平共处会削弱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至于說到阿根廷，我們的党在哪里进行反对战争的广泛斗争，哪里就有爭取和平的强大运动。只要提这一点就足够了，在1962年，虽然在国内有着独裁政权，約有一千二百万人参加了经常带有政治性口号的部分罢工和总罢工。”

中国领导人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針的分裂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线也受到我国的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坚决的譴責。在今年8月1日保共中央的声明中指出，保加利亚共产党坚定地始終不渝地今后将遵循莫斯科會議上确定的总路线，并将始終不渝地反对背离这条路线；反对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声明說，“把另一条总路线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不是加强而是破坏它的团结，往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叛徒的磨盘中注水。”

（譯自1963年8月29日保《工人事业报》）

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 是我們胜利的源泉(节譯)

密·格里戈洛夫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兄弟般互助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这是合乎規律的过程。这种互助是以同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度为基础的，是由共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要求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間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联系，要求它們的经济互相接近。这就会使它們的威力得到增强。我們甚至不能想像，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給自足、彼此孤立的一些民族经济的某种共居。社会的发展不是引向各个民族经济的隔絕，而是使它們日益密切地接近，建立一致的，按照共同計劃进行調整的世界经济。还在1918年弗·伊·列宁就曾写道：“应该……使整个社会变成劳动人民的統一的合作社……現在需要的是誠心誠意地参加这个統一的、和好的合作社的一致願望。”

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自力更生”理論与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趋势相对抗。他們硬說，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借口下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損害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榨取单方面利益、損害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是用这种誹謗和捏造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离間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阻挠这些国家

的经济日益彻底地接近和协作。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他們的民族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中国领导所执行的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的路线，对于中国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能够并且已经带来重大的損失。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要求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的創造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发掘并最充分地利用每个国家的內在潜力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我們的党也正是这样做的。最近四、五年来它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来爭取发掘和利用经济上的內在潜力，爭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爭取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党和政府还千方百计地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友誼和密切的经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出社会主义体系的优越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的发展速度，才能为使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創造前提。

中国领导人不断地写到并談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但是，事实表明，他們同时对許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对苏共和苏联——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和突击力量——进行着破坏活动和誹謗运动。

季米特洛夫在二十五年前就曾說过：“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上是考驗每一个工人运动活动家和每个工人組織是否忠于工人階級利益、忠于社会主义的試金石。”

中国领导的錯誤方針同这种对苏联友好的作用所下的充滿热情的定义是有着尖銳矛盾的。中国领导人在他們的信件里枉費心机地試圖证明，由于有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一論点已经失效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永远认为，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心，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最高表現。但

是，既然对于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做了和正在做着最多事情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党进行了最肆无忌惮的誹謗，又怎么能說是忠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是公认的和久经考验的先鋒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結中心。我們深信，正因为如此，現在和以前一样，同苏联及其伟大共产党的兄弟团結是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主要标准。

中国領導人的有害观点和行动同最恶毒的反共分子的勾当完全吻合。各国反动分子把自己的主要打击鋒芒恰恰指向苏共和苏联，力求使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离开苏共和苏联，并不是偶然的。他們清楚地懂得，苏共和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堡垒，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堡垒。任何一个其他的党和国家，無論如何强大，都不能在世界发展中起如此先进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作用是由历史本身的进程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許多历史原因才使苏共和苏联人民成了給人类鋪平通向光明的未来、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先鋒队。

我党中央第一書記托多尔·日夫科夫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說，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們离开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由伟大的列宁的党培养起来的，因为这些党都是在列宁的党那里学到了列宁主义，因为这些党都是在列宁的党的良好影响下才作为一个新的、列宁式的党成长并壮大起来，因为这些党都是从列宁的党那里大量地汲取为爭取我們共产主义共同事业的胜利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鼓舞和力量。”

中国領導人貶低苏共和苏維埃国家对发展革命理論和实践的伟大貢獻的企图，暴露出他們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

使劳动者深感兴奋的社会主义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普遍和平已经得到维护 and 巩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一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政策。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和平力量的强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它们坚持斗争就能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然而，和平共处政策还有其另外一面。正如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现在由于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由于战争的新的性质，和平共处政策正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创造着最有利的条件。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这些原则性的论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以新的结论武装了各国共产党和劳动者。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以旧的托洛茨基的关于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论点，关于利用战争作为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手段的论点同这种新的论点相对抗。他们否认并且不想懂得和平共处政策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联系。这一点最能说明他们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的无能和不愿意按新的方式来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在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国领导关于不惜用世界热核战争的代价来加速世界革命过程的“理论”，完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不认为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凡是认为我们通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应当穿过热核战争火焰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是对人类最坏、最痛苦的道路。

难道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应当在原子战争中烧毁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创造的一切以便随后建立共产主义的制度吗？每一

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不奋起反对这种从各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人道主义的理論。

当然,和平共处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它是有重重困难的,所以要求很大的耐心和努力来解决一切尖銳的国际問題。必須进行困难的、复杂的斗争,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警惕性、灵活性和勇敢,展开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还必须从战争势力和帝国主义那里夺回一个又一个的陣地,以保证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并早日把人們从一切民族奴役和阶级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但是,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应走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旨在反对和平共处的方針以后,竟又宣布反对緩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步骤的部分禁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这样,中国领导就显示出了他們离开各国人民、其中也包括他們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有多么远。

把帝国主义和原子战争叫作“紙老虎”的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向帝国主义者投降,是不相信迫使侵略者考虑各国人民意志的可能性,从而滑到“冷战”和冒险主义的立場上去。

不难看出,接受中国领导人所建議的“总路线”会导致什么样的結果。这会导致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削弱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陣地,使共产党人脱离群众,推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这会損害反垄断陣线的力量、打击民族解放运动,并使共产主义事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坚决地拒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錯誤方針的原因。

爭取和平共处、爭取防止战争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人、一切正直的人崇高的民族和国际的义务。如果我們沒有尽我們力所能及做到一切事情来巩固世界和平并制止热核灾难,各国人民是不会原諒我們的。

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一致地、热烈地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他们认为一贯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团結，是全世界和平的胜利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的主要保证。

(譯自1963年8月30日保《工人事业报》)

广島會議(节譯)

格·皮林斯基

中国代表团的团員們第二天在其他国家的會議参加者的小組会上继续更恶毒地攻击条約和苏联政府。中国代表們參加會議的目的是要把會議变成反对莫斯科条約的論壇并把自己的如此无远見和如此令人憤恨的立場强加于會議。为了这个目的，他們从北京运来一批多年来并不住在自己的非洲国家、除了自己誰也不能代表的人。

这次爭論和表現在評價条約方面的分歧使會議開幕推迟了整整三天。有些日本共产党人不顾日本輿論对莫斯科条約的普遍支持，硬說由于这个条約，在日本人民当中听到了“某种兴奋同不安情緒交织在一起”的声音。

由于在評價条約方面的分歧和爭論导致了这样的結果：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評議会的代表沒有參加會議。他們召开了自己的有四千多人參加的會議，会上表示一致支持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試驗的条約。

中国代表对伟大的苏維埃国家的这种攻击听起来是令人痛心和厌恶的，中国代表的左傾宗派主义神经病超过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最不共戴天的敌人。

(譯自1963年9月5日保《工人事业报》)

保共中央就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 十九周年給全国人民的賀詞(节譯)

季米特洛夫不朽的名言：保苏友誼对于我們，就像太阳和空气对一切生物那样是生活的必要。这句话現在具有更大的力量和意义。

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坚决譴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活动，一致贊同和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无保留地拥护保共中央就中国领导人的分歧一事发表的声明。

他們非常憤慨地反击这些领导人对于苏联和列宁的伟大的党、对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的肮脏的誹謗运动。中国领导人由于进行有害的活动和持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观点，他們已走上了不仅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而且走上了发动“冷战”的道路，从而同世界上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

中国领导人分裂的有害的路线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全世界的进步力量相对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队伍团結在創造性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更加高高地飄揚在我們的地球上。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这一旗帜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些想通过假革命詞句和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原则的做法来拆散各国共产党大軍队伍的人的企图是見不得天日的。

(譯自1963年9月6日保《工人事业报》)

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 而团結起来(节譯)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遺憾的是,中华全国新聞工作者协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就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不外是进行瓦解和分裂,人們不可能对它进行其他的評价。中国新聞工作者不是为巩固国际記协組織和加强其新聞工作者的队伍作出貢獻,而是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們召开“地区性”的新聞工作者代表會議,大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聞活动家的“特殊利益”,拼凑一个国际新聞組織,其主要目的是与国际記协關对立。不仅如此,事实表明中国报刊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疯狂地誹謗和誣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他們领导人的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观点。这些行为只能使来自帝国主义陣营新聞界的团結的敌人感到滿意。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新聞工作者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为国际記协組織的一致,为它的队伍的团結而工作和战斗。他們譴責中国新聞工作者想分裂国际記协組織,削弱这个民主的、进步的国际組織的企图。他們坚信新聞界团結的思想,和平、民主和諒解的思想一定胜利!

(譯自1963年9月7日保《工人事业报》)

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

《工人事业报》国际评论

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了。来自亚洲和非洲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团聚在一堂，以表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消灭殖民主义和争取实现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在亚非人民这样一个重要讲坛上顽固地企图分裂亚非人民的力量。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人不择词句和不择手段地企图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堡垒——伟大的苏联进行诽谤。

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绝望的努力，不仅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他们在广岛还曾企图分裂世界和平战士的运动。在上星期刚结束的红十字会日内瓦会议上，他们也极力想分裂这个已经存在了一百年的世界性组织。几个月以来，中国活动家们一直企图破坏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的团结。现在，他们又在尼科西亚肆无忌惮地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瓦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拍着自己的胸膛说，难道他们不是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奴役唯一的和真正的保卫者和支持者。但是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的是实际和真正的物质支援，而不是响亮的革命宣言。战后年代的事实表明，是被中国活动家无耻诽谤过的苏联给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最重大的支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自己了解最清楚，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有赖这种帮助。

苏軍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后，为亚洲千百万人摧毁殖民主义奴役的枷鎖提供了可能性。1956年苏联迫使侵略者撤出苏伊士运河地区，从而把年青的埃及国家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拯救了出来。苏联制止了1957年和1958年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侵略。苏維埃国家的强大威力是各国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可靠堡垒，甚至当他們处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鼻子下面也是如此。拆穿地說，中国本土还没有清除香港、澳門这块殖民地疮疤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宣誓自己是反帝者”却装做没有看見这块疮疤，而粗魯地指責苏联向帝国主义者妥协。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誹謗显然騙不了任何人。在尼科西亞會議上各代表对中国誹謗者的激烈反应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安哥拉代表、亚非团结組織常任書記安东尼突·米古埃尔·拜耶說，“苏联一向給予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有效的援助。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个走在全世界革命运动前列的国家來說，不会有別的表现。莫斯科条約是解决裁軍的良好开端。”在反击中国的破坏中，代表們強調指出，必須把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起来。中国领导人在尼科西亞、广島和日內瓦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訓。但是他們是否会傾听理智的声音呢？

（譯自1963年9月14日保《工人事业报》）

世界革命的进程与和平共处(节译)

尼·伊里巴扎科夫

中国领导人所谓和平共处是否定阶级斗争的翻言，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辩证的统一。他们使争取和平的斗争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把它们设想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被万里长城所隔开的斗争，只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统一和相互依赖。

这种主张和这种对待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态度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客观现实相违背的。

可是，中国领导人把各共产党关于革命的和平道路的主张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中国领导人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革命的和平道路的论点是“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是“议会迷”。

第二，中国领导人硬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和平实现可能性的党就是排除向社会主义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仅仅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这种观点。

第三，中国领导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先例”。

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论点”，这种论点既不考虑历史事实，也不在世界上建立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

第四，中国领导人试图引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论证自己不同意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道路。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革命的和平发展是“革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这句话是引自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论妥协》一文中，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上下文，实际上是藏匿了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的立场。

在反对“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议会迷”、“和平主义”等等的响亮词句后面，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实行自己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所谓“革命”战争来“推动”革命。

中国领导人在形式上、口头上否认这一点。可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口头宣言，而是中国领导人主张的实质，从中必然得出借助战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火箭核战争来“推动”革命的论点。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正是这样的。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美帝国主义反动派使世界面临世界火箭核战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仅不做任何事情来帮助克服已经发生的冲突和消除世界火箭核战争的危险，而且尽一切力量使局势更加尖锐化。他们与其说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美帝国主义，不如说是对准作了最大努力而终于消除了危险的苏联和苏共。这是苏联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是古巴人民及其英勇领导的胜利，是整个爱好和平和进步人类的胜利。不管多么奇怪，这种胜利只有美国“狂人”和中国领导人感到不满意。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路线不是新的。过去托洛茨基曾想用“革命空谈”把革命推向这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必然使革命走向失败。

在现时代基本矛盾的新“理论”中有着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这个新“理論”使中国領導人对其他共产党充滿了骄傲和优越感。他們公开示威。中国領導人装作唯一掌握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現时代、关于时代的矛盾和动力的理論的真理，傲慢地說，其他共产党“根本不了解时代变化的实质和环境变化的实质。他們根本不理解現代世界中存在的矛盾，不明白这些矛盾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譯自1963年第10期保《新时代》杂志)

当代世界矛盾的辩证法和 中国教条主义(节译)

鮑·鮑日科夫

中国教条主义者断言,当前世界存在着“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①

制定正确的总路线不仅要分析每个社会经济矛盾中的特殊矛盾和它同其余矛盾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揭示社会发展中作为其主要推动力的对抗性矛盾。这永远是这样一种社会对抗性矛盾,它的特殊而最终地说明时代的最基本的内容,赋予所有其余矛盾、社会运动等以严格规定的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符合现阶段历史进程的主要方向(基本内容)。但是,中国教条主义者完全无视辩证法的这一要求。

教条主义高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无视其具体性),导致了对“矛盾的普遍性”的偏爱(无视其特殊性)、并从而导致无视时代的基本的对抗性矛盾,而这一切的结果就得出总路线本身的“普遍性”,也就是机械地列举国际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

①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第3—4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

“对教条主义者說来，两个体系之間的对抗性矛盾——当前世界主要矛盾之一，是同垄断資本之間的矛盾或垄断資產階級同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并列的！中国教条主义者无視作为时代的主要对抗性矛盾的两个体系之間的斗争，他們建議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时，要“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資產階級同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①

在現时代，在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方面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中国领导人既忽視現时代的这些矛盾的特点，也忽視这些矛盾同主要的对抗性矛盾——两个体系間的斗争的相互作用。

同过去比較起来，現阶段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在战后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在軍事、政治上的联合的趋向。

第二，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已经丧失了以前的意义。

第三，这些矛盾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时代主要的对抗性矛盾的影响，即受到两个体系間斗争的影响。

第四，决定着各个帝国主义走向軍事、政治联合的新因素是許多資產階級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国际化。

現代世界中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不仅仅具有上述的各种特点，而且还表現在这些矛盾对历史进程的发展已丧失了以前的意义。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已不再在同样的程度上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主要原

^① 1963年3—4期《紅旗》杂志。

因有三：第一，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意义大大地增大了；第二，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与被奴役人民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无比地增大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产生了时代新的主要的对抗性矛盾——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它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北京的预言家们看来，一切矛盾都是“主要的”，“一切矛盾都在加剧”。中国教条主义者把自己对这两个“结论”的“分析”看作是自己的“大智”，其实这两个结论中，第一个简直是荒谬的，第二个是完全抽象和肤浅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根本没有对主要问题切实地进行“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只是说当前世界上的这些“主要”矛盾中哪个是时代的主要对抗性矛盾，其他矛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怎样发生变化，而不管这些矛盾的尖锐化。但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既然他们认为包括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内的所有当代世界的矛盾都是主要的矛盾，也就是说对历史进程是同样重要的，那么中国教条主义者怎能证明（甚至相信！），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呢？！……

中国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时代主要的对抗性矛盾和当代世界的其他矛盾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他们完全无能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要特点，即确定当代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环节。

（译自1963年第10期保《新时代》杂志）

在米哈伊洛夫格勒举行的庆祝 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四十周年大会上的 报告(节译)

伊·米哈伊洛夫

社会主义各国是团结一致的。共同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在国际社会团体和工会组织中，在国际和平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中的分裂活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对和平事业起了有害的作用。保加利亚人民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用最坚决的方式给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以回击，并将为反对这种活动、坚定地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为扩大经济合作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范围而斗争。

同志们，

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在途中现在和将来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人物不会自动在历史面前屈服，因为他们吃人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感到不安。令人高兴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强大已经足够来对付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向前发展的任何企图，并在开始时就消灭掉一场世界核战争。苏联拥有足够数量的强大的现代化防御手段来制止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建设中的巨大成就，在科学、

技术方面,宇宙空间中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苏联宇宙飞行员,特别是最近的瓦·捷列什科娃和瓦·比科夫斯基英勇的飞行是这个成就的又一证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开展着,资本主义各国的民主力量和全世界和平拥护者正在成长。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蓬勃开展的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这就是制止一场核战争的保证。中国领导人没有看到,或者不愿了解这一点。但是,不应低估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不是“纸老虎”。它还拥有足够的力量:现代化武器、人力、辽阔的领土和基地。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劳动者当中还没有被充分揭露,它还要干坏事,给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和损失,它可能使数以亿计的人们付出生命代价,使整个整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财富永远从地面上消失掉。

目前的国际形势,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行为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更坚决地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来烧毁破坏我们的团结、分裂我们的队伍、制造不信任和企图破坏同伟大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的支柱和保证,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的支柱,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证的团结一致和友谊的每一个企图。

同志们,

保加利亚是社会主义共同阵营的一部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一样执行着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苏联关于巩固世界和平和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爱好和平的倡议一直得到我们政府的支持。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以及各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同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热核战争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让那些想要在本国人民的骨头堆上创造出“千百倍美好生活”的人们,公开和清楚地

向本国人民說出这点吧，看人民怎样回答他們。这不是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箴言。

各国人民和世界上絕大多数国家善意和高興地欢迎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中进行核試驗的条約。这是各国人民要生活在和平中，要使人們免受热核战争恐怖の普遍願望的光輝证明。各国人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拒絕在禁止核試驗莫斯科条約上签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以自己的爱好和平政策对巩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但是我們懂得，仅仅这个是不够的。只有用武力才能制服狂人。因此，保共中央和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我国的国防威力，提高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我国的经济愈巩固和愈强大，提高我国国防能力的可能性就愈大。

(譯自1963年9月22日保《工人事业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离开 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

《工人事业报》编辑部文章

苏联政府就中国政府发言人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声明昨天发表的声明，揭露了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和他们对世界和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危险挑衅。

生活已经证实了苏联政府对外政策的正确性。苏联共产党及其以卓越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为首的政府，是各国人民对和平和对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争执问题都不通过流血的武装冲突途径，而用和平谈判办法解决的最真诚愿望的忠实体现者。在各国人民对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展开的公民投票中，也证实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在我们星球上的这次公民投票中表明，进行分裂活动的中国领导人是孤立的。

在苏联政府声明中用很大篇幅揭露中国领导人对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所采取的两面派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最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领导人放弃和背离了这两次会议的决议，尽管他们喜欢经常引用这些决议。

中国领导人恶毒地攻击莫斯科会议文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苏联政府声明十分有根据地指出，近几年的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着的，看待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解放斗争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能离开争取和平与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和平是为巩

固社会主义的世界地位創造最有利的气氛。在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爭取迫切的要求、爭取社会主义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正在加强。和平共处也是爭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良好气氛。

近几年的全部事件证明,中国领导人日益背离爭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的斗争的利益。他們在一切領域里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立場相对抗。

在苏联政府声明中指出,“最近时期以来的一些事实,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极力反对的停止核試驗条約和对苏联的激烈攻击,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一次声明里表现得特別明显,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切忧虑。中国领导人就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中苏关系問題所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实际步驟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愈来愈背离社会主义共同体各国所一致通过的共同路线,愈来愈背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方針和原則。”

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說他們援助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自称为被压迫人民利益的直接保卫者,而事实上,尤其近年来的事实却說明,他們放在首位的完全不是爭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追求自己的大国主义目的。他們竭力以冠冕堂皇的革命詞句、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无瑕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这种目的。

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几乎向所有邻国提出了領土要求,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中印边境冲突也就是这种要求的結果。中国当局对苏中边界的多次侵犯是众所周知的(仅1962年就有五千次)。他們甚至不仅企图把苏联領土的个别地区“据为己有”,而且中国的宣传机构还暗示过去形成的苏中边界的某些地段是不

合理的。

一向忠誠地关心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結的苏共和苏联政府，为了消除同中国领导人的分歧，曾作了多次的、耐心的和不懈的努力。苏联政府現在又在声明中表示，它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来消除已产生的分歧，不惜力量和时间同中国加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結。但是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十分公正地警告：它絲毫也不会放弃这些原則，不屈服于对它所实行的政策进行任何冒险主义的攻击。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保加利亚人民热烈支持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和以当代卓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尼·謝·赫魯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执行的公正路线。我們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它也是我們党和我国人民政府的路线。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世界革命进程中新的、未来的成就的取得，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命运，都取决于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會議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訂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实现。因此，全体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保加利亚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同苏联共产党人、苏联共产主义的建設者、全世界反对任何企图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可靠的共产主义道路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忠实保卫者一道肩并肩地进行斗争。沒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离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

(譯自1963年9月23日保《工人事业报》)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发展和 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节譯)

瓦·伊万諾夫

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一方同以中共领导人一方之間的分歧，首先表現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論和实践的最重要問題采取根本不同的态度。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这些問題采取創造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考虑到世界上已经起的深刻变化，而中国领导人却采取另外的态度。他們的态度的性质是教条主义的，它沒有看到人类現代的发展或歪曲这个发展。

讓我們把苏共中央公开信、苏联政府的其他文件、苏联政府最近第三个声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作一个比較。苏共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忠于馬列主义原則，努力维护兄弟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各国人民在現代伟大斗争中的利益，勇敢回答生活所提出来的問題；而中共领导却断章取义地玩弄和摘引詞句，运用教条和死的公式，竭力以革命的詞句来掩盖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原則的严重背离。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装扮成是世界最正经的馬克思主义者，彻头彻尾地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創造性发展的新阶段。他們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成就或多或少都是……修正主义。他們由于自己的这个路线、由于自己的宗派和教条主义观点和分裂主义活动，而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通过的文件——有他們签字的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所包含的原則。中国领导人在忽視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的和起碼的原理，否定这个学說創造性发展的新成就的同时，企图創造自己的、符合他們的大中国民族主义的願望和当領袖野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种按地理、种族、民族和其他特征来划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統一的国际学說，它不可能分成任何另外的类型。

最近，中国假理論家越来越頑固地企图反对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反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不久前在《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公布的一篇文章中他們公然強調，不能“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說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同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一致。但是，不能不被看出，这种表面的伪装是用白线縫制的。它不是被別的东西，而是被莫斯科會議声明完全駁倒。

中国領導人的教条主义最明显的表現在对現代历史时代的估計和分析上。由于他們对时代作了不正确的估計，由此而作出了許多根本錯誤的結論。

中国領導人尽管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并贊同声明中关于現时代的特征，但却創造了根本不同于声明中所制訂的关于时代的另外的理論。他們沒有看到社会发展已经起的深刻变化，因而在自己的理論中硬說，不是新的特征，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老特征对現在的历史时代完全有效。他們直接宣布，“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

但是，我們同意我們时代的这样的特征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們认为帝国主义将继续是世界的主宰者。这意味着在我們的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領導人的观点正归結于此。他們的这些观点也确定了他們对当代最重要問題的总路线。他

們竭力迴避談及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轉变,实质上是否认防止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拒絕和平共处政策,并且认为,战争是解决世界革命进程問題的道路,而不能是別的。忠于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领导宣称,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同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决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出路。他們实际上是否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和平方式。

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观点不仅远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同现实沒有任何共同点。这些观点說明它的創始人早已同事实相冲突,对世界沒有实际的概念和生活在旧的精神中。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不仅是錯誤和过时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同世界上最凶恶的反动派組成統一战线,促使国际局势尖銳化,把人类推向热核灾难的深渊。这一点从他們在加勒比危机时的行动中和对待部分禁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的态度上看得特別明显。

中国领导人的路线按其性质是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同进步人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尖銳矛盾的。这不仅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且是无人性的路线。因此,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国家的进步人士都反对这条路线。

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更强烈地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問題上。因此,他們用特殊的欺騙手法反对苏共綱領——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綱領。按照北京“理論家們”的看法苏共綱領是“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不是因为別的,而是因为它宣布和平共处原則为我們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因为它提出新的理論原理,如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等原理。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創造性发展也不可能安置到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普罗克鲁斯特的床上。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根本不可能談到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而且另一方面，这种东西現在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在苏联还存在着剝削阶级。中国“理論家們”为了使共教条主义公式完整起来，宣称投机倒把者、无业者、流氓、盜窃分子等是剝削阶级。他們的这种說法粗暴地破坏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論。

現代教条主义者陷入越来越可笑的境地。他們說党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是小市民的願望，他們說苏共綱領提出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愛和幸福”的伟大口号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资产阶级口号”。但是，試問，那种不需要实现这些口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不难懂得，中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有另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可归結为原始主义和人們之間的平均主义。他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在当前的情况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不比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危害性小。由于中国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因此必須对它們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根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大問題，在本文內不可能加以詳細的討論。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根源不能像目前某些资产阶级的策略家和思想家所尝试的那样，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中找寻。

中国领导人現行的方針是同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有关系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宗派主义路线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現在力图轉移群众对产生这些困难的真实原因的注意。

不久前中国还是一个有着严重的封建残余和发达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落后农业国的情况，对教条主义也有着重要的

影响。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无疑，在这种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不能一下子就消灭的，它现在仍继续在國內起着影响。

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也有它认识論上的根源。这就是理論脱离实践、脱离生活、过高估計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不相信世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中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占居統治地位，以及有爭夺世界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野心。历史经验告訴我們，理論上的教条主义和政策上的宗派主义是个人迷信統治所提倡和支持的，而現在个人迷信是中国领导人要无保留維護的。

(譯自1963年9月26日保《工人事业报》)

世界革命之反面(节譯)

留·斯托揚諾夫

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无疑是千百万和平战士的成就，是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

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可怜地企图否认这些成就，意味着否认站在斗争前线的力量，否定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意味着阻挡世界和平、各国人民走向和平共处的进步和发展的列车。

中国领导人妄想发明一种新的世界革命的“药方”，“粉碎”帝国主义的“药方”。他们像生活在远离历史现实的人们一样轻易地认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知道和不能够区别“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和谁是朋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因此他们甘冒经受“痛苦的幻觉”的危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里摆着两种致命的谎言(甚至不是自欺)——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和谁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于“同帝国主义合作”；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等等在新的“中国的”原则上的“联合”，乃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可靠保证。

哪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会认为这些真正是极端危险的缺乏逻辑和意义的论点是对待各国人民和世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严肃态度呢？谁能把这种说法，即认为对反帝斗争有重大贡献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苏联和社

会主义陣营的援助，沒有欧美无产階級的援助就可能实现和平与裁軍当作有普遍意义的呢？

中国领导人硬說，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能够在全面彻底裁軍的道路上实现“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争的世界”，是一种“实现不了的幻想”，他們站在反对苏联、美国和英国于今年8月5日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最前列。这个条約被认为是“騙局”，是对各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叛变行为”，是“假和平”“真备战”的条約，它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請看，这是多么大的騙局和阴谋！”甚至像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委員郭沫若这样的人机械地、（按照熟悉的个人迷信的方法）重复地說，这个条約“就其实质而論是准备世界大战的大阴谋”。

爭取和平与裁軍的政策：通过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同资产階級国家劳动群众一起进行不断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使可能避免世界核大战的灾难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在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爭取自由的全面斗争——这一切按照中国假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就是“修正主义”和“出卖无产階級的利益”。我們用他們的話來說：“請看，这是多么大的騙局和阴谋！”

我們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敌人，但是我們决不能同意中国的概念：原子弹是紙老虎。假如帝国主义不拥有技术、强大的軍队和物质文化，沒有对世界上冥頑不灵的反动集团的影响，而且沒有儲存大量的原子弹和热核炸弹的話，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它的力量有可能还不如蛋壳硬。

反对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的中国政治家們实际上站到了好战和侵略势力的行列。他們建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拥有原子弹，如果不是执行閃电式的毀

灭世界核战争的方针还意味着什么呢？

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事态这种演变。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亚洲式的专横，它是人道主义的形式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在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在建立具有具体目的——共产主义——的有组织的国家的斗争，别无其他意义。

中国政治家们的主张是：“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而我们后面有洪水。我们尊重千百年的中国文化，并认为这个文化未来的命运应该比遭到同原子库和人类文明一起毁灭的好。

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用形象的话表示中国的观点：“东风压倒西风”。言过其实是中國思想方法的特点。但是，富有诗意的形象不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词汇中风的概念有两种用法。“在白马上被风吹着”，指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无疑，东风压倒西风，即指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努力下，在殖民地各国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的斗争下，帝国主义越来越缩回自己的血腥毒爪，不得不作出让步，西方国家领导人会采取明智的步骤，例如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中国人民，因为他们的领导无视过去，无视历史，无视兄弟情谊。

（譯自1963年9月27日保《工人事业报》）

爭取裁軍与和平的战士的坚强堡垒

彼·庫宁

摆在我們面前的是苏联政府最近的一次声明。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极端錯誤的立場和他們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危險行动提出了无可辯駁的证据。

苏共和苏联政府为爭取全面彻底裁軍、巩固和平及防止热核战争的积极和一貫的政策，日益贏得新的支持者——世界各个角落的个别人士、組織和整个整个民族。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这个斗争的一个步驟和斗争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胜利也不是偶然的。

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所作的分析都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巩固，根本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今天，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单独决定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特别是不能单独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向前发展，这种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最蓬勃发展的年代里也未有过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秘密，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政論家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这些国家过去在经济上落后。它的秘密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在于新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经济的计划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間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经济计划和兄弟般的合作来实现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使每个国家可能以高速度建設自己的民族经济和为巩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苏联、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

产主义运动,是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强堡垒。这也是世界革命进程最坚固的支柱(道义的、物质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支柱),是力量和革命毅力的真正源泉。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制止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和平共处和两个世界体系之间进行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坚决制止了法国、英国对埃及的侵略和消除了在加勒比海的危机对世界所产生的危险等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社会主义国家的吸引力和光辉榜样,特别是它们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苏联的军事威力和它的正确的、战无不胜的和平外交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最大支持。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各国人民为争取从热核战争恐怖中拯救世界的斗争的世界和平运动有着伟大的意义。这个运动也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同盟军。反对战争、争取裁军与和平的斗争并不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和平主义运动。这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反帝斗争。这个斗争削弱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及其政权,并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容易一些。

中共领导人竭力歪曲和平共处政策,把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看成是对帝国主义者投降。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仅与实际不符,而且也是与他们几年前自己所持的立场相违背的。他们背离有他们自己签署的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决议所表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总路线的极端错误和危险的行为,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在经济建设的方法和方式上,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几年来,中国人民

共和国经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同志不愿意运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违背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不遵循和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他们限制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给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表示不相信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能够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因此，他们提出强行革命的冒险主义口号。他们以讥笑态度谈论体现在苏共纲领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二十年的规划中的苏共总路线。他们采用分裂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定的方针，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的每次倡议。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和旨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民主组织的实际行动受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坚决谴责。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同意中国领导的这种说法：在一次热核战争中就是牺牲掉三亿中国人，他们仍然将在历代所建立的文化（城市、农村和工业企业等）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繁荣的社会。这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方针。这样的理解和号召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反对热核战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的政策相对抗的。

因为苏共和苏联是世界争取裁军与和平的战士的主要支柱，所以中国领导人把所有锋芒和最卑劣的诽谤指向苏共和苏联。

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以及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不顾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和各个兄弟共产党进行诬蔑的企图，仍然把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看作是自己斗争与争取胜利的强大堡垒，

并日益团结在它们的爱好和平、反帝的正确政策的周围。这个政策正在取得胜利，它在将来会取得明显的胜利，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

（译自1963年9月29日保《工人事业报》）

和平共处和阶级斗争(节译)

薩·加諾夫斯基

最近以来，展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挑起的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尖锐争论。

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不同地看待和解决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诸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和平共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等问题。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制定和通过的总路线提出了争论。众所周知，他们以自己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正确的斗争道路的“总路线”来对抗这条路线。

中国领导人认为，和平共处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尽管口头上说要和平共处，然而他们却把这个政策叫做“幻想”、“欺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劳动和资本、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调和”。他们认为和平共处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和在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退却，是背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实质上如果一个人最诚恳地希望了解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实质，他就不能不明白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不仅不排除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而且恰恰相反，它有助于这种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工人阶级运动取得新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便于我们时代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的一切主要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

因而和平共处路线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相反地，它是旨在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一切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以及利用一切手段防止世界大战。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势力的斗争路线，这种势力企图保留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顽固地准备其目的在于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和扭转社会发展的车轮、恢复资本主义的战争。这是孤立这种势力、揭露他们和制止他们残酷的侵略计划的斗争。和平共处的政策是一些国家和民族不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停止“冷战”、消灭军事集团和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路线。表现这种政策的还有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取消殖民主义和一些国家和民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统治的斗争。

如果我们揭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政策不理解的基本原因，那末就会发现中国人不理解和平共处政策首先是由于不理解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的矛盾；是由于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而这个战争不仅将对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胜利是个可怕的打击，而且也将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本身带来困难并使这个胜利迟缓起来。

他们不去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对抗性矛盾发展的实质和趋势，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今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终究要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观点，从科学角度来看，是不正确的，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不仅对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对社会主义和巩固世界和平是有害和危险的。以地理和种族为出发点来揭露我

們时代的基本矛盾，这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同当代法則不相容的。人类社会的矛盾不能依照情緒、偶然的猜測或者个人的任性来選擇，它們首先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只能从这个观点来探討、分析和总结它們。这样就可以揭示基本的、原則性的矛盾。而中国领导人却不是这样做的。因此，他們未能正确地理解現时代和它的趨勢，不能够制定出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陣营斗争策略和战略的正确方針，因而犯了粗暴的和危险的錯誤。

从实际观点看来，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理論为什么是有害和危险的呢？这种理論之所以有害和危险，因为它导致不尊重作为今天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作用；导致有色人种与白人的对立，它在国际范围内不是在階級基础上，而是在种族基础上寻求进步力量的团结。誰在探討民族解放运动时否认階級观点，实际上他就是在解放了的国家中鼓励和加紧宣揚民族主义，就是破坏国际工人階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统一战线。很清楚，中国领导人这种理論和实践，导致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們的时代、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背离工人階級的階級斗争和导致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的分裂及其力量的削弱，并且在客观上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向它們的磨盘中注水；这种理論是对工人階級事业、对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新的“总路线”不能不抛弃任何真诚的和平爱好者、民主主义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緣故。

当前首要的不是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而是更加巩固他們的联盟，以便使爭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斗争、工人階級、劳动

人民的階級鬥爭、民族解放運動、保衛和平、爭取全面徹底裁軍具有更大的規模。而這也正是和平共處政策的任務。

今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中說：“現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隊伍中，有人竟然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採取消極、鄙視和否定的態度，那在實際上就是保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使自己墮落成為社會民主黨人。”

實際上，令人很難設想這樣粗暴的歪曲事實，並且容許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而主要是針對偉大的蘇聯的這種咒罵。我們將不去列舉反駁這種歪曲和咒罵的事實，我們僅僅指出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以全力支持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的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解放鬥爭是自己的國際義務。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是一切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指導原則；它不違背和平共處原則即總路線，而是包括這個原則。

* * *

對當代和平和戰爭的問題沒有正確的了解，是不可能理解當代和平共處作為制止戰爭的手段的進步的和階級的實質和作用的。

中國領導人不理解現代帝國主義情況中質的變化；一方面他們把它當作“紙老虎”，另一方面，又過高地估計它作為新戰爭販子的可能性，而對能夠抑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與可能性、民主與和平的力量估計不足。中國批評和平共處政策的人看不到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對比，不願承認帝國主義已經失掉了它過去所有的影響，不是帝國主義，而社會主義成了社會發展中占統治地位的因素，也就是說，中國領導人不明白國際舞台上階級鬥爭的新東西，而是繼續重複五十年前對帝國主義和國際局勢的評價的老公式。

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知道它的残暴本性是没有改变的，知道帝国主义没有成为爱好和平的，它对所有进步的东西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极端的仇恨。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能力却大大地减弱了。国际政治已不在取决于它们，它们的侵略和好战的计划能够被揭破，而战争是能够被制止的。但是，帝国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拥有原子武器和顽强地准备世界性的原子战争。这是一个现实的危险，尽管这个危险今天是可以被制止的，然而对于它不能不给以严重的注意。

中国领导人把帝国主义和原子战争叫做“纸老虎”，不去对它们进行斗争，而实际上就是进行投降，不相信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不相信和平与民主力量能制止新战争。中国领导人相信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在今天的力量对比之下，具有制止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他们不仅低估而且不理解或者不希望理解不能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的当代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他们不能理解和平共处在两个世界体系相互关系当中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和平共处政策目的防止战争和和平胜利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全面彻底裁军。中国领导人口头上承认裁军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上认为裁军是“幻想”，因为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同意过裁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它要求严重的、有组织的和持续的反帝斗争。但是，在今天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实现它已成为可能。

中国领导人不了解争取裁军的斗争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期待帝国主义现在同意裁军是不可能的事，尽管他们本身在莫斯科会议声明上签了字，声明中说：“……实现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对人类命运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共

共产党人有着使人类避免一場热核战争的历史使命。他們現在拥有现实的可能性来实现这个使命并且有必要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便完成自己的这一使命。如果不进行頑强和一貫的反对扩张軍备和爭取全面彻底裁軍的斗争，那末和平战胜战争，理智战胜荒謬的斗争是不可思議的。中国领导人可能追隨着其他的目的，不了解而且不願意去了解这一点。裁軍政策符合全人类的内心願望和利益，而首先裁軍政策的成就是对劳动人民、社会主义陣营有利。除了它有助于减少和消除国家之間的战争危险之外，它将給各国人民摆脱至今仍然为了破坏而进行的劳动和巨額財富的毁灭性的消耗。

不久以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庆祝了第一个胜利、裁軍道路上的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三大国苏联、美国、英国簽訂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条約，这个条約的簽訂是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当然，这个文件本身并不排除战争的危險，但它是裁軍正确道路上的一步。中国政府拒絕这个条約，这可以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等等表现的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中說：“这个条約所搞的却是假和平”和“增加了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危險”，因为这个条約并不能达到全面彻底裁軍。要想一下子做到全面彻底裁軍，在今天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中国领导人“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主张，是对和平和人类有害的主张；这种主张由于本身是站不住脚的，从而经不住任何批評。应该寻找解决裁軍问题的办法，尽管要根据可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但是应该頑强地走这条路。帝国主义在世界輿論的压力下不得不迈出这第一步。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宣稱还得同苏联一道解决其他必須解决的问题。著名的美国代表不得不把这些裁軍必要的措施，解释为防止一場新战争的必要措施。

在莫斯科簽訂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試驗条約沒有制止軍备竞赛，更不意味着战争危险的消除。然而，这一条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限制核軍备的竞赛。西方那些首先指望继续“冷战”的阶层的抗議和憤慨，也是出于这个緣故。

要实现全面彻底裁軍，就需要社会主义陣营的巩固团結和奋不顾身的斗争，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所干的分离和分裂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整个声明都充滿着一个恶意而隱蔽的企图：即分裂社会主义陣营，破坏它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坚定政策。

在国际关系領域中，和平共处原則要求在政治和经济領域中作明智的让步或妥协，沒有这种让步，在保卫和平上取得各国之間的協議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原則問題、世界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問題让步。总之，在意识形态領域中从来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对抗性階級的和平共处。

这里，中国领导人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們硬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意味着“資產階級思想吞食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意味着資產階級意识形态和无产階級意识形态之間的“休战”。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論調不仅歪曲了和平共处政策，而且簡直是捏造和詭辯。

(譯自1963年第14期保《党的生活》杂志)

在“自力更生”幌子下的 民族主义(节译)

托·伏洛夫

中国领导人反对和平和和平共处政策，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立场遭到了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反对。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清楚，中国领导人违背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和实践，背离了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集体制订的方针。

中国领导人在宣布反对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互助的同时，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自力更生”的理论。他们无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因此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并正在带来极大的损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必须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在建立人民公社中忽视了这些客观规律的要求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不良影响。他们不主张物质利益原则，而搞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社会主义发展毫无刺激作用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中国领导人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走上了用臆造的一条新的经济规律，即“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来掩盖他们的错误的道路，这无非是主观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一种表现。

中国领导人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实质表现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表现在一系列的文件、文章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中。今年9月

21日苏联政府的声明再次揭露了中国领导人想分离社会主义共同体，削弱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卑鄙手段。每一个真正为共产主义胜利而奋斗的战士都完全赞同苏共、苏联政府的观点，都谴责北京假革命家的胡说八道，这叫人怎么不谴责这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观点呢？中国领导人阐述了关于经济上相互交流的理論，把社会主义国家間的经济联系仅归结为它們之間的貿易。他們在自己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中根本不提及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国家之間建立生产联系的事，不仅如此，他們还走上了取消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貿易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反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彼此接近的客观必要性。这个規律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內已经在起作用，并将日益开辟更廣闊的道路。目前，生产联系的程序早已出現在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以及经互会成員国经济协作和专业化之中。北京假理論家們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說什么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範圍內的国民经济专业化，这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損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損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的一个借口。

任意地和誣蔑性地把社会主义国家間的经济互助和平等的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場相提并論，无非是对世界革命进程中的这个极其重要事业的别有用心地丑化和污辱。同时，中国领导人虽說不反对经济合作中的这种或那种具体形式，而却統統反对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协作及其专业化。所謂依靠“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是公开反对国际劳动分工、使各社会主义国家局限在自己的民族範圍內的理論。

（譯自1963年10月3日保《工人事业报》）

严重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路线和利益

卢·彼特罗夫

中国领导人按照他们进行派别斗争的逻辑规律，沿着分裂的道路愈走愈远。他们已经超越意识形态争论的范围，对所有不同意他们的极端错误和危险观点的兄弟党的辱骂、诽谤和敌对攻击来代替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论证。中国领导人向苏联、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正面开火，对它们的谴责达到了最可恶和荒唐的程度。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粗暴地践踏了1957年和1960年兄弟党会议共同制订和一致通过的文件。

各大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安和忧虑。同时，各兄弟党毫不犹豫地対这种与共产党人不相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行为，进行了最坚决的谴责。几乎所有的党都发表了公开声明，在这些声明中都着重指出，中共领导对现时代的估计和他们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他们的民族主义是他们进行分裂活动的根源。各国兄弟党表示完全同意苏共及其列宁主义的方针。它们摒弃中国领导人所建议的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与各国共产党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主义义务不相容的。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这种活动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本身带来危害。中国领导人的破坏性的和民族主义性质的活动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尖锐矛盾的。我们必须

坚决反对这种活动，因为它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和大的国际民主组织的瓦解。”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在今年9月14日的决议中声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党，居然能进行这种经不起严肃批评的指责，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惊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最恶毒的诽谤者所惯用的语言。”

大多数兄弟党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所持的坚定立场和他们对中共领导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的深刻分析，表现了它们的成熟和高度的思想原则性。

中共领导的这种立场和他们的行动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其他很多政党、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中也没有得到赞同和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十分关心所有民主和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因为他们把这种团结一致看成是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的基本前提。这些国家的民主人士回击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的进步组织与进步运动对立起来的北京分裂者。不久前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二十四个国家的社会团体代表坚决谴责了中国代表团的分裂活动，表示赞同关于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并声明：亚非团结运动证明他们相信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同反帝的其他战士——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更紧密合作的必要性。这就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

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采取两面、不真诚和分裂主义的态度。他们口头上呼吁要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关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总路线的建議，即提出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包含了对当代最重要問題已经受到各兄弟党和两次莫斯科會議所摒弃的綱領性提法和估計。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分裂主义活动的最粗暴表現。

只要从下面的論点就可以对新提出的总路线的实质作出判断，作为总路线的出发点就是要同1957年和1960年會議的決議、要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相对立的。中国领导人写道：“1957年會議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相对立的。”一面宣誓要忠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另一方面又宣称这些文件是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相抵触的，这是有意歪曲这些文件，利用这些文件不容爭辯的威信来掩盖自己的派別活动，这难道还不清楚嗎？

中国领导人摒弃在現代条件下創造性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同时还摒弃所有在条件发生了变化下占有地位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不可估价的意义的一切新东西。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說，“如果我們不按照变化了的形势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应改造我們的政策和策略，我們就不是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优秀学生。”

中国领导人宣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結論是“修正主义”的，苏共领导把这些結論强加于各个兄弟国家，說这些結論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損失。

就这些攻击，我們最少应当提醒中国领导人两件事情：

第一，还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分析了战后的形势后认为，在他們的国家里存在着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有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

能性。1946年多列士同志向《泰晤士报》发表谈话时说，法国的具体条件不排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英共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51年)中指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大不列颠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结论在其他国家(瑞士、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也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对我們时代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的经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结论，并确定了关于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原理。后来在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文件中也肯定了这些结论。可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不仅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是许多共产党进行创造性理论和政治活动的结果。

第二，如果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真正是给苏联、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损失的话，那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两次莫斯科会议之间，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的坚决进攻，应作何解释呢？

在这个时期，国际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方针经受了胜利的考验，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又有二十七个国家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古巴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化出来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和巴西的总罢工，西班牙和法国矿工的罢工，西德和美国钢铁工人的罢工，阿根廷铁路工人的罢工等，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光辉证明。1957年

會議后产生了十三个新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大軍的行列里又增加了一千万新的成員。現在世界上有九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拥有約四千二百五十万黨員。

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这种高涨，是在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的。中国的理論家們硬說，和平共处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麻痹各国人民的階級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这离现实生活是多么遥远啊！

这仅仅是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內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这些成就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列宁主义方針的正确性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二

两次莫斯科兄弟党會議所制定的总路线的实质是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現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的策略要求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即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階級的力量，被压迫人民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以及一切民主运动的力量。对各个兄弟党的要求同样是：要善于在国内和国际范围提出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口号和任务。两次莫斯科會議把防止热核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斗争規定为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中心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巨大意义。

中国领导人当时口头上同意爭取和平的斗争在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坚持自己对时代特征的錯誤理解，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从而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爭取和平的斗争是沒有希望的。裁軍的口号是不能实现的和錯誤有害的。

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原理，是以现实的和经过科学論

证的前景来武装一切反对战争的力量，并使它们的斗争更具有群众性和更有成效。中共领导人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原理使这些力量陷于消极状态，因而使各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失去一个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

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经验表明，争取和平与裁军的斗争吸引着在思想上同我们差别很大，甚至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阶层和个别人士。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是能够制止热核灾难的力量，因而寻求同社会主义阵营达成协议。芬兰共产党总书记维利·培西同志写道：“社会力量的新对比和新式武器，甚至使得垄断资产阶级中间也出现一种考虑现实状况，并与‘强硬派’对立的趋势，他们表示愿意达成某种协议，赞同两种社会体系的和平共处。当前在资产阶级中间迅速发展着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是列宁在很早就预言的，即分裂为战争派与和平派的过程，而这些人自然是完全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

莫斯科会议以灵活的列宁的战略战术武装了各个兄弟党。如果这些党遵循了中国的路线，那么它们就会促使资产阶级的力量重新组合到“狂人”的周围去。这条路线不仅无助于吸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而且会把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赶走。这就是那些在思想上还未成熟到直接冲击帝国主义，但愿意为反对战争危险、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斗争的人。

中国领导人反对裁军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谈判的政策，他们谴责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由于他们宣布反对这个条约，就使自己在热烈欢迎作为走向全面彻底裁军这样一个困难道路的第一步的各国人民中孤立起来。中共领导人带着蛊惑人心的目的建议召开世界会议，讨论全面、彻底、干净和坚决禁止核武器试验和销毁核武器。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中十分恰当地指出：“只有承认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

和平共处和世界裁軍事实上是可能的这一原則，中国领导人的建議才有意义。可是，中国领导人在几个月內发表的各种声明中却正好否认这点。”

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兄弟党为团結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保卫他們的生活、社会和经济利益(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延长有报酬的假期、罢工权利等)，为爭取更加深刻和彻底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的矛头針对着垄断資本家。这有助于使最广泛的群众团結在共产党的周围。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說过：“我們不應該一味地空喊爭取无产階級专政的斗争，而必須指出并提出一些斗争的口号和形式，这些口号和形式是从群众的切身需要和他們在发展的現阶段的斗争能力水平而产生出来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兄弟党正是力图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战线。近几年来，他們在这方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法国、意大利、西德和比利时的持续的经济、政治罢工中，社会党党員工人和天主教徒同共产党員工人一起参加了这些罢工，就說明了这点。

中共领导人在自己的綱領中把为爭取滿足群众日常需要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立起来。如果資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按照这条道路，那它們不仅不能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而相反会阻塞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說，如果共产党不去指导和领导劳动群众为爭取有限和局部要求的斗争，“那实际上我們不仅把活动的地盘让給了社会党人，同时也让給了保守和反动势力，让他們向前迈进。”

中共领导特別起劲地反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結論，同时他們把非和平方式絕对化起来。在1960年声明中也指出了两种可能性，并不排除武装斗争。而只是強調指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增长了。任何地方，只要有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的可能性，就必須充分加以利用。中共中央毫无根据地硬說：“由于这点（即由于承认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变得更強有力一些”。各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的和平过渡有助于加强自己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助于建立工人階級、劳动农民和所有关心反对垄断資本和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一切社会阶层的团結。因此，一系列兄弟党（意大利的、法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的許多党）都表示过，和平的道路符合他們国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利益，将为爭取利用在这方面，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而斗争。

中国领导人自称是民族解放斗争問題的最权威的专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最忠实和一貫的朋友。但是，他們的路线的分裂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性质正是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

众所周知，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被奴役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問題，是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同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团結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这一原則出发的。1960年莫斯科會議根据当代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战略原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所有进步与爱好和平的力量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新获得解放国家的反帝斗争結成同盟并进行合作。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取决于所有这些力量的牢固联合和工人階級对它的领导作用。

中共领导人提出另外一条战略原則。在认为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錯誤的原理的基础上，他們宣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这些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轉移。”这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无产阶级都从他們的公式里消失了。小

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就成了領導者，而工人階級只是落得一個配角作用。

這樣一種戰略，顯然使民族解放運動脫離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陷於孤立，並且使這個運動失去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而中國領導人卻把這一點奉為“唯一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中共領導的這條路線只會受到帝國主義者的歡迎。現在儘管帝國主義者之間有矛盾，但他們為了保持在殖民地和 newly 獲得解放的國家中的地位，正在聯合起來。中共領導的這條路線留給他們以機動的廣闊天地。而這條路線也有利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達到使共產黨人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孤立起來，以便更容易對付他們的目的。

中國領導人誣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說，它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鬥爭未給予足夠的估價和援助。他們借口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參加亞非各種組織的會議，說他們不屬於這些洲，同時因為他們是白種人……。他們竭力限制世界和平理事會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理由是這個組織中包括有“和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些會削弱民族獨立運動的鬥爭精神。

很清楚，中國領導人力圖壟斷同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繫，使它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起來，利用它來為自己的民族主義的利益和目的服務。

三

中共領導人的錯誤方針日益擴大到組織方面來，他們的分裂活動涉及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某些黨，國際民主組織及各國的分組織。

中國領導人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問題上已墮落到資

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自力更生”的理论来代替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以便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的物力和人力的资源。但是与此同时，过去和现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首先是苏联的合作和援助，对于我们更快地向前迈进仍然有巨大意义。因此，保加利亚人民、保加利亚共产党摒弃中国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导致社会主义各国力量的分裂和它们之间团结的破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同样摒弃这些极其错误和有害的观点。

中共领导人以最粗暴的方式任意干涉兄弟党的事务，直接号召更换他们的领导。他们在今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写道：“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同时，中共领导人在兄弟党的党内外积极地寻找这样的“革命者”，以便组织派别小组和公开进行反对这些党的斗争。他们挑选这种人的标准就是愿意谩骂和诽谤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和自己的党。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何塞·卡多纳·奥约斯写道：“中国分裂主义者仅仅在与共产党人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同伙，首先是各种各样的分裂主义者、‘极左’的极端主义者、政治冒险家和开除出党的人，一句话，都是一些声名狼藉的分裂主义者。”

中共领导的这种活动使那些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的兄弟党，如西德、伊朗共产党等处境更加困难。这些国家的警察帮助中国领导人散发宣传材料。这些宣传材料都是通过邮局寄给“亲爱的读者”的，并附有要他们把这些材料转寄给“其他有兴趣的人”

的請求。同时，警察不仅沒收从社会主义国家寄去的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书籍，甚至也沒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材料。

中共領導力图把自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路线强加給国际民主組織，分裂这些組織的队伍。中国領導人称赞“亚非新聞工作者协会”的建立，并背着反对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中国領導人以建立像工联、学联和妇联等类似的組織进行分裂活动。

中国領導人的这些不光彩的行为，錯誤的和冒险主义的观点遭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世界进步輿論的坚决回击。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針，莫斯科會議制訂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給每一个革命者——爭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指出正确的道路。革命斗争的伟大目标要求共产党人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結起来，要求保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光輝旗帜的純洁。这是从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有組織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結論。在今天，当千百万人沿着社会主义与和平的道路前进和正在建立起最人道、最合理的人类社会的时候，这是最正确的方針。

(譯自1963年10月11日保《工人事业报》)

現时代的性质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总路綫

瓦·伊万諾夫

在以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为一方和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分歧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問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总路线”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現在的总路线进行对抗，他們企图把它强加給各兄弟党。

在革命的詞句掩盖下，中国领导人說他們在保卫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然而却同时又談論着与这些原則十分矛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总路线”。甚至他們把今年6月14日給苏共中央的信都題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但是，当着这条总路线已经有了的时候，还有什么必要提出关于总路线的建議呢？很明显，这里的問題所牵涉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目前的总路线，修正它的基本观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推向与其发展的現在的道路根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上。

現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在創造性的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新阶段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这个阶段。这条总路线在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里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科学地制定这条总路线的基础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新的苏共綱領。中国领导人現在想把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与苏共第二

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以及苏共綱領对立起来。可是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最重要的文件和这些決議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正义感要求我們来強調的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这条总路线作出了最大的貢獻，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它的基本原理。这一点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声明中也強調指出过。

声明中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①

說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国领导人却不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他們在凶狠地反对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大叫不能“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說什么宣言和声明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不相符合。中国领导人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对于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意义，从而他們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他們的莫斯科會議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背离者的面目。

* * *

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它发展中每一阶段的正确的总路线和科学的战略与策略的最重要条件是对时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而此这个分析对于国际工人阶级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論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們从他們自己的反动阶级目的出发，千方百计地企图歪曲現时代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頁。

的性质，把它說成是資本主义的复兴和繁荣的时代。現代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的代表們將我們时代的性质作了歪曲的和有利于資本主义的解释。中国領導人也給我們时代作了根本錯誤的評价。

列宁教导說，对时代的科学分析首先在于考虑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历史进程的客观內容，其目的首先是了解社会上階級力量的对比情况，哪个階級的活动是在这一具体条件下社会进程的主要原动力。

列宁写道：“我們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順利。但是我們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階級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內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這種基础上，即首先估計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們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計这国或那国的更詳細的特点。”^①

在資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結構中出現三个历史时代。正如列宁指出的，第一个时代包括从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到法普战争的时期，第二个时代是从法普战争到二十世紀初期，第三个时代是从二十世紀初期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在划分不同的时代时不可能指出准确和截然的界线。这里的界线都是有条件的、非固定的、相对的。它們取决于各个时代的客观內容。第一个时代是資產階級上升及其取得全胜的时代。資產階級民主运动和革命是这一时代里历史过程的客观內容。資產階級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个时代是資產階級的彻底統治和衰落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124頁。

的时代，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工人阶级在积蓄着力量和成长壮大。第二个时代的特点是比較和平的发展。第三个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按照列宁的說法，它是“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它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道，继续存在着，正如其他时代一样，它在一个长时期內继续同下一个时代互相交错在一起。

列宁第一次指出了我們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还在四十多年前他就写道：

“我們有权自豪，我們自豪的是，我們有幸福能够开始建設苏維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阶级的統治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①

在強調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时，列宁指出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它的若干特点。可惜列宁所处的时代使他来不及給这一时代的特点以詳細的論述。我們目前时代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列宁死后很久才出現和发展起来的。

按其性质，新的历史时代根本不同于所有以前的历史时代。它是世界历史中本质上和原則上新型的时代。这一根本的差别还在它剛出現时就突現出来了。差别首先表现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个不仅消灭了资本主义剝削，而且消灭了人对人的一切剝削的新社会的建立，开辟了这个时代。在占世界陆地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死亡已经开始了。整个帝国主义的鎖鏈已被打断，資本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頁。

主义已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它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已失去了效力。资本主义进入了自己的总危机时期。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开始对世界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对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斗争,发生强大的良好的影响。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指出,现在的历史时代有两个发展阶段。这一时代的开始——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它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第二个阶段是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相联系的。虽然两个阶段有着共同的基础,然而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在现时代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帝国主义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的进程和性质。”我们时代的最能说明其本质的主要特征,出现在这一时代发展的第二阶段中。

关于当代的性质的问题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经过全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之后,声明给现在的历史时代下了如下的定义:

“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①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这对于时代发展的两个阶段都完全有效。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这个过渡就越来越扩大,席卷新的国家和人民。今天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所有国家迟早都不可避免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

在莫斯科會議聲明里所作的关于現時代的評述中強調指出，我們時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目前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階級目前正处于時代的中心；它們是世界进步的主要原動力。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不决定于某人的願望和意图，而决定于世界客观的发展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这首先是由于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包括了占具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地球上的一大部分面积这一情况。已有十四个国家加入了这一体系，这些国家的数字还将不断增加。然而，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最重要的情况还在于最近十至十五年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它們之中的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胜利。由于这些国家的蓬勃发展，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們的力量都增长了許多倍。

但是，这对說明現在历史时代的性质，对說明它的主要特征，还是不够的。必須強調的是，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主要支柱。这一共同体的力量和强大，它之所以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由于苏联在自己的全面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在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苏联的科学和技术蓬勃的高涨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苏联給予其他各兄弟国家的援助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加强大和不可战胜。

在对我們时代进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and 說明中指出了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合乎規律和不可避免的結

果。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成果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腐朽决定的。

现在历史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成就，由于被奴役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崩溃。帝国主义已无力阻止这个历史进程。在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强大作用的压力下，它被迫退却了。殖民主义体系的急速没落已成了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现象之一。近十五亿人从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世界上出现了将近五十个新国家。

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这样多新解放国家的建立，是对加强世界进步力量和破坏帝国主义力量的强有力的因素。

目前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急剧全面削弱和它的已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总危机的进一步尖锐化。垄断资本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不但不能阻止这个过程，而且更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世界资本主义正经受着更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不稳定的考验。一些国家和另外一些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正在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对立正在异常地尖锐化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正日益发展起来。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对现时代性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说明，帝国主义已不是世界的统治者，它不是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今天已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在现在的历史时代中，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战争已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还有战争的危险，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今天在社会上存在着能够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

世界革命進程的性質和內容也決定於現時代的性質和現時代的基本內容。在這個革命的進程中，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力量，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和全世界一般民主運動的力量正匯合成共同的激流。在這個強大的戰線上，國際工人階級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起着決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需在國際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不斷地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和威力，團結一切反帝的革命力量。

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具有特別巨大的意義。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現在正以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生產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通過示範的力量，給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以最大的影響。所以，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和平經濟競賽中，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和後備，以便在今後的年代里保證我們在物質生產方面取得優勢。

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巨大高漲的主要條件，是加強它們的團結一致，是擴大它們之間的兄弟般的互助合作。

在鞏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統一的鬥爭中，對蘇聯和偉大的列寧黨的態度是特別重要的問題，中國領導人卻以主要的打擊力量來反對它們。如同過去一樣，這一態度現在也是對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共產主義運動的每一個活動家、每個黨員成熟和堅強的試金石。蘇聯共產黨，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先鋒隊，在應當怎樣加強各兄弟國家和各兄弟黨之間的一致，在應當怎樣進行反對現代教條主義者的分裂主義路線的鬥爭方面，都作出最好的榜樣。

在現在的历史時代中，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沒有比制止熱核戰爭、保衛和鞏固世界和平更為重要的任務了。它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現階段總路線的主要目的。

為什麼現在制止世界熱核戰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

目的呢？

自从制造了热核武器以后，战争已具有可怕的毁灭力量。热核战争的爆发将是人类的真正不幸。在这场战争中，资本主义将永远被埋葬，但是与此同时在战争中也必将牺牲数以亿计的人。人类将在自己的发展中后退几千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将推迟几百年。制止世界热核战争将为人类和它顺利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证一条唯一可以得救的道路。

从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现实对比出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世界完全可能从热核灾难中得救。但是为此必须不断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的主要支柱，加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提高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新战争的煽动者的警惕性。制止热核战争的斗争要求执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的一贯政策。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完全符合世界真实变化的关于现时代的科学分析。他们给时代以另一种评价和定义，从而也作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根本相反的结论。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领导人关于当代性质的“理论”从头到尾都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典型。

中国领导人看不到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断言说什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所作的评述对现在的历史时代完全有效。他们在《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写道，“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最近一篇文章就这个问题说了如下的话：“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的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作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

者)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問題,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修正列宁的学說。”

列宁教导說,“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活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准确事实,而不是去继续坚持昨天的理論”,而中国領導却像盲人离不开棍子一样继续坚持着旧的理論。正如所知,还在十月革命之前,由于考虑到資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而与此同时无产階級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改变了,列宁毫不犹豫地用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胜利的新理論代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同时在所有或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論点。列宁以此为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理論基础,并且告訴人們,在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中应当怎样做。然而目前,当着历史給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类似的任务时,当着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的列宁的继承者和学生,像他們的导师那样对我們时代的生活問題大胆提出了并且作了正确回答的时候,中国領導人却譴責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变节和修正主义!只有那些看不到或者不願意看到活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們才善于干这种事情,这还不是很清楚的嗎?

然而中国領導人自己也不是始終如一的。一方面他們断言时代的性质沒发生变化,而另方面又在談論世界的根本变化。当更进一步深究他們自己的矛盾时,就清楚地看到,他們只把自己所追求的东西看作是变化。“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同列宁在世的时候根本不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形势,也根本不同。”^①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頁。

在这个缺乏任何階級內容的口号掩護下，中國領導人實質上在推行自己的關於東方各國人民的地理政治和種族的共同性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而是亞洲各國。然而這與現實是尖銳矛盾的。

中國領導人在他們關於現時代的評述中盡力迴避關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爭取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力量決定着當前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點的問題。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他們對現在的历史形勢和世界力量對比具有系統的錯誤認識。

中國領導人反對蘇聯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加強而是破壞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中國領導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論，實際上是反對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之間的互助合作。這就首先給中國人民自己帶來了最嚴重的危害。

堅持着關於時代性質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立場的中國領導人，在當代世界矛盾的問題上也必然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對他們說來，我們時代的主要矛盾不是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不是國際工人階級，而是民族解放鬥爭。他們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也是這樣寫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

在這方面，很明顯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甚至是修正主義的理解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甚至每個中學生都清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的和最起碼的原理都被踐踏了。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一些著作中就寫着，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的領導者只能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的理论家们的断言正好相反——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将埋葬资本主义。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作者）。”

这把事情本末倒置了。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壮大与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而是相反，——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取决于民族解放斗争。

在现在的历史时代里，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斗争中的强大因素。但是它不能在世界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不能是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因为它的性质和动力不允许它这样做。从成分上说，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运动中首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等。许多地方参加运动的还有国王、亲王和部族的首领等。在具有这种成分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怎么可能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革命斗争中的前列呢？除此之外，民族解放斗争也没给自己提出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直接的任务。那么怎么能够接受中国领导人的什么“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民族解放运动为转移的说法呢？

中国领导人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立场不仅有害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而且也给民族解放运动本身带来了危害。中国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对立起来，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我们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使它失去同这一力量的紧密联盟，失去这一力量的兄弟援助——它今后取得成就和胜利的主要保证。

透过中国领导人的错误的和混乱的理论，透过他们的革命词句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蒙骗，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放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这些意图中是大错特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力量懂得谁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他们将不会屈从中国大国主义的意图和恣意。

由于忽视当代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北京的理论家们陷入了最荒诞甚至可笑的地步。这在他们的所谓中间地带的公式中尤其看得出来。在今年二月《红旗》杂志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描绘了下面一幅图画：“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叫嚣，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

从这一段摘录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帝国主义不把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直接的目的，而把准备侵略包括像英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中间地带作为直接的目的。这进一步意味着，现在不存在美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力量的军事摩擦。中国领导人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一系列的国际会晤中断言并继续断言说什么西德的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以及西欧其他侵略集团并不危险。很难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杜撰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寓言来！接受这个荒唐的和人为的公式，意味着把人民引入迷途，麻痹社

会主义各国的警惕性和給国际帝国主义帮大忙。

在我們时代的基本問題——战争与和平問題上，中国领导人也是站在根本錯誤的立場上的。这同样出自他們把現时代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的論述。根据这一論述必然得出結論說現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人不考虑現代热核武器的性质，这种武器也改变了現代战争的性质。他們甚至宣布說“原子彈是紙老虎”，战争不可能被埋葬，“只能用战争来消灭战争”，“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造世界”等等等等。

断言全面彻底裁軍是幻想，和平共处是欺騙，战争問題不决定于我們，而决定于帝国主义軍事參謀部的长官，各国人民将在帝国主义的廢墟和半数人类的白骨上建成美好的未来。这一切如果不意味着維護在我們时代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理論，如果不意味着为一場未来的战争进行辯护，那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领导人关于爭取和平的斗争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間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尤其沒有根据。按照他們的說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們实际上甚至提出为了世界革命应当停止爭取和平的斗争的論点。正如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爭取和平的斗争和和平共处不仅不妨碍革命斗争，而且为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創造着最有利的条件。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階級斗争的特殊形式，是階級斗争最集中的表現。在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革命斗争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中国领导人在断言当代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們把世界大战看成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手段。借此宣揚自己的“勇敢和革命性”。实质上，事情正好相反。如果帝国主义得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必定是热核战争，战争中帝国主义将会永远被消灭，而与此同时也将毀灭世界的文明中心，消灭社

会的主要生产力和数以亿計的人民。人类将退回到自己发展的几千年之前。因此，世界热核战争不是使社会更加接近，而是更加远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通向这一胜利的最可靠和最直接的道路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創造最有利的条件的、爭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道路。

在爭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的斗争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遵循着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即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每一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来实现，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具体条件。正如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所强调的，共同的規律是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取胜創造了许多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和其他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一切可能性，同时准备非和平过渡，准备用武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要目的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保证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形式，但是又馬上宣布說，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实际上是否定这种形式。在中共中央給苏共中央的信中說：“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則呢？絕對不能这样。”^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都认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比国内战争好，但是他們当时的条件和可能对此是有局限性

① 1963年7月15日《工人事业报》。中文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頁。

的。目前，当着已经为这种过渡创造了許多更为有利的条件的时候，在一系列国家中这种过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和平过渡是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战术原则的问题，这不决定于中国领导人，而决定于生活本身。

正如所說过的，资本主义各国中大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目前正越来越尖锐起来。这为在反对垄断的上层分子、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争取扩大民主和满足劳动人民的一系列经济要求的斗争中，团结最广大的阶层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争取民主的斗争正在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个重要的情况，因此对那些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兄弟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缺乏对时代的具体分析的中国领导人的“总路线”，实质上变成了不考虑时代要求而喊些最一般的口号和列举这一运动的最一般的任务的东西。

* * *

两条总路线的对比结果表明，各兄弟党和工人党所执行的总路线是为生活所证实了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它完全符合现代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工人阶级、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条路线不仅导致保卫和巩固和平和制止热核战争，而且也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因此，它是革命的路线，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高涨的路线，是世界上深刻的革命改造的路线。

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总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相矛盾。这条路线不符合新的历史形势，不符合国际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切身利益和愿望。按其性质说来，这是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和

分裂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是讲革命词句的能手，他们几乎把自己当作世界上唯一的革命者，然而他们的总路线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路线，因为它不促进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因为它没有使人类接近，而更加远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中国领导人的“总路线”能够把世界带到哪里去，这可以从他们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立场上最清楚地看出来，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协助发动一场热核战争。今天，这还可以从他们疯狂恶毒地反对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看出来。

中国领导人的“总路线”使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活动受到束缚，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它将给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沉重的损失。中国领导人的“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他们不相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不相信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

正如所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这条总路线是在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参加下制定的，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活生生的和全面的实践表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不需要改变。但是，如果其中必须做一些改变的话，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确定的准则和相互关系，这种改变只能按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志，而不能以任何其他人的意志来进行。个别共产党之间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其中包括重要的、甚至是原则性问题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可以，也应当通过在大家所接受的总路线的基础上互相协商的途径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大家庭中的这些共同通过的准则。它背叛了自己的一切国际主义义务，并开始执行最有害的分裂主义路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和观点根本矛盾的中国领导人，现在抛弃了共同制定的总路线，擅自为所有兄弟党宣布另一条总路线。可是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呢？他们没有得到过这种权利，

并且从任何人那里也不会得到这种权利。

中国领导人目前走得更加远了。他们公开宣布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活动和派别活动，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组织破坏活动，联合所有反党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从而他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作为共同的总路线、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的面目，越来越暴露了出来。

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坚决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主义活动，并拒绝他们的“总路线”。保加利亚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且为它的彻底实现而积极斗争。

(译自1963年第11期保《新时代》杂志)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代的主要矛盾

恩·雅赫叶尔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所向无敌的力量证实了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对现时代及其矛盾所作的估计的正确性，证实了集体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领导人愈来愈背离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将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从左面”作了修正。受到中国教条主义者“攻击”的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与战略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

一

关于我们当代的主要矛盾问题，不论从分析和理论上总结新的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来，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当代的重要国际事件的角度看来，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它也是革命实践的首要问题。矛盾是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也是当代革命运动的源泉。因此，正确确定当代矛盾与揭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矛盾对制订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订的文献——宣言与声明中、在全面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苏共纲领中，都得出这样的結論：**当代——在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日益发展与巩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过时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国家工人阶级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統治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則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对抗。現在，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体系之間的对抗，决定着世界发展的总趋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間的斗争是当代历史的軸心。它給当代所有其他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的体系打上深深的烙印。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像中国领导人誹謗的那样简单地看待世界的矛盾。他們在自己的理論与实际活动中也能正确地理解和充分地估計其他矛盾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这些矛盾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然而，与此同时，必須強調指出，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更快发展及其有利于进步与革命力量的順利解决，起着主要的作用。莫斯科會議的声明強調指出，“**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苏共纲领也指出，“**当前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黑体是我标的。——作者）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是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結果而产生。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俄国工人和农民打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个缺口。还在1920年，当苏維埃国家采取最初的行动时，列宁便以其素有的天才的洞察力預言

道，由此往后，世界上的一切政治事件，将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上，苏维埃共和国把各国进步的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集聚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的这一预言在现代条件下更加发生了作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当代的主要矛盾则日益发展和尖锐化，并成为世界进步的主要源泉。这种矛盾的主导作用首先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矛盾的主要的进步方面——当前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确定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不赞同关于当代主要矛盾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估计和结论相反，他们认为当代世界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四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事物与现象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永远在联系与关系的复杂体系中，在矛盾的复杂结构中，寻找那种基本的、决定现象的、反映其主要发展趋势的联系、关系与矛盾。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析现时代及其矛盾的方法。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是这样做。尽管他们在今年7月14日信中說，矛盾不仅按其阶级内容和发展趋向，而且按其地位和意义来说都是不同的，但他们仍然大笔一挥，把它们都宣布为“基本的”。实际上这是把它们等量齐观。这种态度在理论上表现为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法；在政治上则是把革命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创造了前提。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何在呢？其根源在于他

們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不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必然得出的邏輯結論。因为，如果贊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贊同首先体现为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主要革命力量的观点，那就必然承认社会主义反对与之相对立的力量——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总的革命进程中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从而承认这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世界的主要矛盾。

只有政治盲人才看不到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設中的卓越成就，特别是苏联经济上与国防上不断增长的实力也为当代其他革命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殖民主义所奴役的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一般民主运动——斗争的胜利結局創造了日益良好的条件。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的天然引力中心和强大的堡垒。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鼓舞着各国人民，在他們心中燃起斗争的火焰，增强他們对最終胜利的信心，給予他們道义和物质的支持。

二

中国领导人认为，我們时代的最深刻与最尖銳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們不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而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在他們看来，这些地区集中了当代世界的矛盾，是矛盾的“焦点”，是“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他們甚至认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身归根到底也取决于(黑体是我标的。——作者)这些地区人民斗争的結局！这就是中国“理論家”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終結論提

供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瑰宝”。

任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也不否认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意义。民族解放运动是我們当代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它給帝国主义体系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世界革命运动两大潮流——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革命——汇合的结果。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場是与列宁这些指示的精神与思想相对立的。要是站在他們的立場，那就意味着：第一，不是联合而是分裂两个革命潮流；就是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它天然的同盟者与强大的支柱——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体系割裂和对立起来；就是要以此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显然，中国领导人制造这些論点并不是从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出发的。

第二，中国领导人用否定国际工人阶级并首先否定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把民族解放运动宣布为革命进程中的主要革命力量的观点，来践踏任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所熟悉的原理：在我們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爭取反帝斗争的真正而恒久胜利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在摆脱了殖民主义或正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多数国家中，由于发展的具体条件，斗争的领导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其中某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共产党。

如果按照中国“理論家”的立場行事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斗争的领导不应该是工人阶级——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它是唯一能够领导世界的革命改造的最先进、革命最彻底的阶级，而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中国同志经常是企图用列宁的名字来掩飾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的。

我們党忠实于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坚决拒絕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这些荒谬论点。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八月一日的宣言中声明：“我们坚定地站在两次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认为在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中间，主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主要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根本错误的。”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最大的说服力断然驳斥了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历史经验表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是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各族人民斗争的转折点。它震撼了帝国主义的根基，给予了民族解放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揭示了被奴役民族对殖民主义者胜利的前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产生起就成为被压迫民族斗争的道义上与政治上支持的无穷尽的源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大大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进程。帝国主义地位的急剧削弱，世界舞台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殖民地人民的支援，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规模，殖民主义体系完全和最终崩溃的日子临近了。如果说十月革命时期全世界有77%的领土和69%的人口处于殖民主义的羁轡之下，那么现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地球上只占7.6%的领土和1.5%的人口。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形成了五十个独立国家。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首先是苏联的全面帮助，对摆脱了殖民羁轡的民族为巩固其所争得的胜利，捍卫他们所获得的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的民族经济，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利益在客观上是一致的、共同的。这种利益的实现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不是互相对立而

是紧密地互相帮助和一致行动。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是摧毁帝国主义的伟大因素。然而，只有依赖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首先是苏联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并与之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因素才能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现在，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速度、方向与斗争的最终结局，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帝国主义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取决于领导世界革命进程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成就。

中国领导人关于矛盾和当代主要矛盾的观点和言论是很不一贯的。与此相反，他们却一贯追求自己的目的：贬低他们日益感到孤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特别是贬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久经考验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主要力量——苏联的作用。他们最近几年的观点和实际行动，肯定说是力图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使之服务于自己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目的。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矛盾不会“自动地”消失，不能调和，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斗争来克服。但是这种斗争，以矛盾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具体的环境与力量对比为转移，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所形成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时代的主要对抗性矛盾或者通过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通过和平共处的道路来克服，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共产党人坚决拒绝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因为它将给劳动人民和全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在本性上它也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光辉的理想根本矛盾的。所以，共产党人是争

取和平与反对新世界战争的最忘我、最彻底的战士。当然，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认为两种相矛盾的世界体系会永远并列地存在下去。但他们坚信，为了解决国际舞台上“谁战胜谁”的问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胜利，不需要也不容许世界战争。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可以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得到最好解决，世界革命进程会最有成效地、广泛而深入地展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不在带来横祸的热核战争的情况下实现，而在两个不同制度的和平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实现。

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提出了什么样的路线呢？他们实质上采取托洛茨基的立场，提出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此，他们顽固地力图向人民说教，原子战争是“纸老虎”，人类的一半将为了消灭帝国主义而牺牲。他们冷酷无情地歪曲与力图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威信，悍然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说它们好像成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并且“阻碍”了革命的进程。

显然，中国领导人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进程“设施”的起码常识。一些国家的革命进程是其国内革命力量自己的事情。共产党人不仅是反革命输出而且是革命输出的坚决反对者。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不通过革命输出，不通过外部军事干涉，而是按照社会客观规律作用的力量，由于一些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才能达到。美帝国主义鼻尖下的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事情正是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的存在加速了古巴人民的胜利，并且是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的可靠盾牌。正如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给予资本主义以永世长存的免罪符。为了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

确立，他們总是战斗并将永远战斗。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

由教条主义和自己的假革命性弄瞎了眼的中国领导人不懂得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主要矛盾的独特形式；由于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这种形式已成为可能和客观上的需要。和平共处政策不是和不能抹杀世界的主要对抗性矛盾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调和，也不是对帝国主义者让步。这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和平共处把世界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加以排除，这就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为世界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改变并压倒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只有僵硬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才看不到和平共处不是排除而是推动世界的革命转变，不是阻碍而是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平共处的最终政治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在两个对立体经济竞赛的进程中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列宁指出：“现在，我们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给以主要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真正最终地取得了胜利。”

在经济竞赛中，全部优势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热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体系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保证。

* *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摒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方针，谴责他们的派别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并毫不动摇地遵循体现在莫斯科会议宣言与声明中的总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战争力量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将取得一个接着一个新的胜利，必将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保证使当代的主要矛盾得到合乎社会主义利益的解决。

（译自1963年10月21日保《工人事业报》）

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和中国领导人 对个人迷信的辩护(节译)

《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

中国领导人宣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有害的,它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他们把个人迷信问题仅仅归结为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上。他们缩小了斯大林的错误,认为“他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无产阶级专政在沒有先例的情况下为自己开辟道路时,这些错误是难免的”。中国领导人力图以时间、条件作为借口毫无根据地为斯大林的错误辩解。宣传员应当明白,在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的原因方面,中国领导人企图强调客观条件,这意味着为斯大林的错误和滥用职权辩解,承认个人迷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把过错转嫁到资本主义包围和国家的落后状态上,因而就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条件下,个人迷信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领导人硬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就是谴责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国家”。这是粗暴歪曲的,不真实的和诽谤性的论调。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斯大林同社会主义制度和党之间划等号,把苏联人民的所有成果都归功于斯大林……中国教条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仅同斯大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对群众和党的创造性的活动估计过低,使党的活动家的活动神秘化。这是对个人作用唯心的和主观主义的理解。

宣传员应当进一步揭露中国领导人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方面的两面手法和无原则性。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狂怒地维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呢？

中国领导人盲目地和教条主义地恪守斯大林提出过的理论提法，否认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莫斯科会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新东西。他们维护个人迷信，是要捍卫自己的政策。错误路线、政策中的主观主义、由于粗浅地理解共产主义和不考虑客观规律而试图在经济发展中越过阶段，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遭到严重的失败，使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又提出关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力图转移群众对国内的尖锐问题的注意，以革命的词句把自己说成是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运动革命传统的保卫者。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用的是个人迷信时期的典型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很盛行。在中国共产党内，某些领导人被捧到不仅是迷信的地位，而且是神化的地步。

北京领导人也打算把个人迷信的方法用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宣传员应该以每天报刊上的事实来说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维护个人迷信，他们的错误方针给他们本国造成很大的困难。他们越来越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政策并且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经济生活中“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困难，使发展速度减慢，不能解决技术进步的重要任务和改善人民物质状况。这种情况就造成他们党内和国内的紧张情况。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现在在国际关系中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路线和政策，用来揭露帝国主义，而是同苏联作斗争，进行反苏运动，这种行径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反帝阵线的团结，鼓励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译自1963年第15期保《党的生活》杂志）

党的发展問題与現代教条主义

彼·魯謝夫

現代教条主义的理論家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他們的“批評”涉及許多重要的根本問題。

党与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領導人在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問道：“一般說来(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党呢？”他們接着写道，建立全民党是“在根本上同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說”相抵触的。

教条主义者对嗎？不，不对。他們的理論是严重地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相背离的，是与社会历史进程背道而馳的。

党作为一种阶级的、社会政治的現象，是活的有机体。它是阶级最珍贵的产物，同时也是劳动人民的政治領袖。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造就无产阶级。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道：“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党组织和領導工人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活动过程中发展和改变自己，推动自己前进。这种斗争牵涉到党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的一切范围——既牵涉到目的、纲领，又牵涉到内部生活的结构和形式，团结群众

的形式、手段、方法以及同工人階級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关系。

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时期(当时正如恩格斯所写的,“要說联盟的成員有多少是工人的話,那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到有着大工业、强大的工人階級和明显的階級分化的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时期,经历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并为劳动人民所掌握。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对提高无产階級的階級觉悟与組織程度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本世紀初,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布尔什維克党。这个党給工人階級新型政党的发展与巩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继承了馬克思与恩格斯的事业,創立了关于新型政党的完备而严整的学說,制訂了作为无产階級先鋒队的党的思想的、組織的和策略的原理以及它的活动原則。布尔什維克党的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中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

工人階級政党是发展的。布尔什維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它历史中一个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然而撇开这种发展,在資本主义社会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条件下,从新型政党建立的开始,党就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階級的先鋒队,是它的先进的、有觉悟和有組織的部队。

这很自然。这是由社会的剝削和对抗的性质以及无产階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只有它才有能力組織革命变革,才能担負資本主义掘墓人的作用。列宁写道:“只有无产階級,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領袖,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受資产階級的剝削、压迫和蹂躪往往比无产階級更厉害,可是他們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斜体

〔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的斗争。”^①

然而，领导一切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只是在有了自己独立于资产阶级并和它不妥协的政党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它的组织。

历史经验是这样的。

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生活中出现了转折点。苏共成为执政党，第一次在实践上着手社会的改造。这种改造在党的活动性质中得到了反映。党领导了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政策表达了工人和劳动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利益。列宁的历史功绩是在新的条件下确立了社会、经济与文化战线上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的实质；研究了党的生活的基本问题。他科学地论证了集体领导制的完全遵守与党的民主发展的必要性，科学地规定了正确挑选和分配干部，检查党和国家统一监督的执行情况，党的政治工作与经济任务的正确结合，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统一，党和国家活动中的创造性等的意义。关于党的学说被提到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世界上组织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榜样。

有人可能反驳说，这些原则中有许多在党执政以前就存在了。例如关于创造性，关于干部，关于检查和集体领导制等等。完全正确。然而在新的条件下，党的整个组织活动和它的原则有了新的内容，新的性质、方向和目的。列宁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在于，他透彻而完满地阐明了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详细研究了由党执掌政权并领导了新生活的诞生和确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页。

立这一客观事实所引伸出来的新原则。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列宁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三共产国际对全世界各共产党的形成以及他们用列宁主义的重新武装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兄弟党的发展中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时，列宁才提出了改变党的名称的问题。这个提議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包括彻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包括同资产阶级进行勾搭的机会主义者。必須与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1918年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議，把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不是普通的更名，而是党的活动中的新内容。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年代中，尽管社会和阶级结构有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党的工作内容、形式与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这同样不是偶然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年代中，整个社会还没有因利益的共同性而统一起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与尚未消灭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还是有力量。工人阶级与小农、中农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因为小农和中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的。在经济领域中必須为社会主义成份的扩展与胜利开辟道路。这个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性。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为党的发展，为更大地扩展和加深党的民主传统以及党和社会的批评，为充分吸引群众管理社会事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社会主义胜利与剥削阶级被消灭的结果，使社会道德与政治的一致性增长和巩固起来。党消除了入党条件的差别；为一切劳动人民确立了统一的条件。然而，

就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还是够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党还不具备向新的性质过渡的经济条件和思想条件。

党的整个发展由于个人迷信而暂时延缓下来。个人迷信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在党内外建立起来的不正常状态，践踏了生活与活动中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然而，尽管创伤是沉重的，条件也困难一些，但党仍然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呼吸、生存与发展着，仍然找到了强大的力量摆脱这一场灾祸，医治自己的创伤，并更顺利地向着共产主义道路迈进。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党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总结建成社会主义的经验与结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变。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之后，将为党的逐渐消亡创造社会条件。苏联共产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的功绩在于，他们揭露并科学地论证了党的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条新的规律。他们论证了在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党又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获得了新的性质——全民党。

把阶级党改变为全民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它第一次发生在苏联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开始大力建设共产主义。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民主。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克服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与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毫无疑

問，我們今后向无階級社会前进的运动首先是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消除劳动階級之間的界限的过程。”^① 整个社会由于利益的共同性而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全民在道德和政治上牢不可破的团结。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中，在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程度上，使党过渡到更高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全民党的经济和思想条件成熟了。阶级界限的逐渐消失与共产主义建设的开始，在党的活动中得到了反映。党成为全民党后，同全体劳动人民的联系会更加巩固，它的领导作用会更加增长。尼·謝·赫魯晓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出现的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变成了全民党。（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这表明了由共同利益和世界观团结起来的苏联社会坚如磐石的统一。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乌云满天的时刻，无论是胜利还是严峻考验的日子，党都同人民在一起，人民也同党在一起。”^②

苏联共产党进入共产主义时期及其向全民党的过渡，同它内部生活中新的深刻变化，同它的准则的实质性改变，同它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断丰富与发展是相伴随的。这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彻底而完满地执行领导的更新和继承的原则，更完满和更广泛地扩大党内民主、批评和作为社会基础的共产主义自治等新形式的范围，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和领导人在共产党员面前的领导责任等。党的生活的新的准则完全显示出党的发展中性质的新阶级，活动的新内容以及现在为之斗争的新目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7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6页。

的。

全民党生活中的其他变化也开始了。1962年所进行的按生产原则对党的机构的根本改造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新的结构使党的领导更多地接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反映了党在经济中、在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中的首要作用。苏联共产党关于进一步改进党的结构的决议是对党的学说的新贡献。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党的理论结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些结论给予全世界各共产党的活动以巨大的影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党摆脱了个人迷信时期滋长起来的宗派主义错误，在执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路线的同时，拟定了更正确的反资本的战略与策略，在人民反垄断的广阔阵线上，更加巩固了同群众的联系。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强大的影响；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正确的纲领、战略与策略。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硕果。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理论结论，照亮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这里我们想强调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建成前的时期。它们的党仍然是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公认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中党的性质转变的经济和思想条件还没有成熟。然而，表明向全民党发展的趋势的过程在这些党内出现了。这一阶段，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光辉照耀下，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经历过的道路作了审查，对自己的活动作了以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的完全胜利为特征的巨大改变。党内生活的准则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只要提到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章程

就够了。新章程载入了关于集体领导制的发展，关于党的机构的更新与继承，关于党的民主和批评的扩大，关于作为社会基础的共产主义自治形式的发展，关于用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规范的精神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等新准则。党内生活的这些准则与党和社会发展中的现阶段是相适应的，但同时也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的良好影响，这种影响帮助党向更高级的性质——全民党过渡的进程的确立与加速。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整个社会发展的结果，使保加利亚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斗的先锋队和保加利亚人民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斗争中的公认领袖。我们党还没有成为全民的先锋队。然而毫无疑问，不久之后它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必将由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党转变为全民党……而这就会缩小我们社会中思想发展的差别以及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觉悟水平与积极性的差别。”^①

所有这些事实和这段历史证实了什么呢？

党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性质，必须用历史的态度，作具体的分析。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中，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建设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党仍然是阶级的先锋队，当然，与此同时，反映着党向更高的性质发展的趋势的变化在党内也成熟和来临了；而在开始大力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党是全民党，是共产主义运动有一天终究要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不是辩证地考察与探讨问题，要理解党的这些不同的发展水平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这就是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悲剧！他们不是辩证地考

^① 托·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62年保文版第138—159页。

察党，不是把党与阶级和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因而对全民党的诞生于世感到大惊小怪。他们的出发点是形而上学的，是脱离社会进程、脱离历史发展的。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甲）只是历史地；（乙）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丙）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列宁在批评米哈伊洛夫斯基时明确地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①中国教条主义者正是抛弃了列宁的这些观点，因而无法解释与说明党的进程。他们抓住了一个公式——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和阶级的先锋队，便不看生活的进程而把它应用于一切场合。大家知道，正如列宁所写的：“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②现在，中国教条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抓住一条真理，把它说得“过火”，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这就把党的学说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竟至于“一概”否认全民党的出现与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阶级变化。他们想迫使历史仅仅在人们迄今所熟悉的社会形式与阶段中，在由他们所确定的刻板公式中运动。这种不值得羡慕的作法不禁使我们想起古希腊传说中的强盗普罗克勒斯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特。他在自己的床上杀死受害者，把較长的腿截短，把較短的腿拉长到折断的程度，以便把它們弄成与床一般长。現在現代教条主义者正像这样肢解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以便把它塞到自己的刻板公式与形而上学的“床”上。然而，如果古希腊的传说容忍了这样的强盗，那么，現代共产主义运动将不会贊同和容忍現代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党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并按自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观点肢解党的“强暴行为”。历史是一种进程，党内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进程和变化沒有也不会容忍陈旧的刻板公式的束縛。

全民党是“超阶级”的党嗎？

中国领导人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认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沒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建立全民党意味着“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为資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在他們看来，全民党的建立是修正主义的胜利。他們把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理論結論同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加以比較并径直地相提并論。对他們而言，全民党的理論同无产阶级叛徒关于党的小资产阶级和超阶级性质的机会主义理論之間沒有任何区别。

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剝削社会的任何时期和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共产党人过去和現在都为反对关于党和国家的超阶级性质的理論而斗争。他們永远把这种理論当作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渗透来看待。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党，它与其他一切党

相区别,并且,正如恩格斯所写的,它成为“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党”。须知列宁曾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①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纪念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逝世十周年的演说《为了党的转变》中也说道:“我们已故的领袖布拉戈耶夫的特点是:1.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广泛派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工具的阶级的不可调和性。阶级反对阶级——这是口号,是座右铭,是布拉戈耶夫和保加利亚紧密派的路线。2.一切为了无产阶级政党……3.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未来抱有毫不动摇的、无限的信心。”^②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剥削社会中党的阶级性是怎样的立场,知道了为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为使党抵御机会主义的泛滥而进行过多少工作。可见,为了党的阶级纯洁性而斗争,过去和现在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职责,并且,他们毫无愧色地履行了和履行着这种职责。苏联共产党从来就最彻底地捍卫着党的阶级的立场和性质。这里,没有任何调和可言。

全民党是阶级党发展中质量上的新阶段。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目的是共产主义。它建立并生活在列宁主义的思想、策略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它同各个时期与各辈修正主义者的超阶级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苏联共产党现在是高度共产主义原则性与革命彻底性的最好典范。世界上任何共产党也没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对粉碎机会主义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而现在,它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举得最高并保持得最纯洁。把将会作为最光辉的革命性的范例而载入史册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6页。

② 《季米特洛夫全集》保文版第9卷第455—456页。

苏联共产党同机会主义加以比較和等量齐观，宣称它是巴枯宁、考茨基与托洛茨基的继承人……这只能是伪造历史，只能是誣蔑。对现代教条主义者的作为和行动的其他断語是不可能作出的。对于事实的歪曲者也是不可能授予别的諡称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明显地践踏列宁关于階級的学說。这里，他們提供了一个如何由形而上学喂养起来的实例。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所謂階級，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們在一定社会经济結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由于列宁分析了剝削社会中的階級关系，他对階級所下的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而中国教条主义者正是援引了关于階級的这个理論，作出了对任何时代都有效的結論——党只能是階級党，其他类型的无产階級政党是不可能有的。

他們的这个結論，又离开了对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階級分析。不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在大力建設共产主义的时期，同样存在着階級。然而，这些階級現在已不侵占別人的劳动，他們是不剝削其他集团的一种集团。現在，他們是友好的階級。在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工人階級不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在共产主义建設中仍然是領導階級。它的这种地位是由它的经济状况，由它同所有制最高形式的联系，由它的高度思想性与組織性，由它深厚的革命传统所决定的。現在，它在共产主义建設中站在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前列。如果我們断定，克服它和农民之間的階級差別并不意味着否认自己的領導作用，并不縮小自己思想与組織的发展和影响，并不在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面前放弃自己的使命，并不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場，那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恰好相反的是，正由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3頁。

义生产組織中和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的大規模工作,創造了使一切劳动人民的觉悟性、組織性和积极性提到工人階級那种高度的前提条件。这样,全民党就属于工人階級領導着共产主义建設的社会。它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組織者。按其成員而言,它是真正的全民党。52%的共产党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71.8%的党员在物质生产部門工作,几乎三分之一的党员是经济、科学和文化各部門的专家。看不到党的这种实质,就不能理解階級的实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

全民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工人階級、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的党。

我們有权質問,究竟誰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誰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誰“瓦解”无产階級?是在階級斗争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設进程中发展和丰富了革命的理論和实践的人呢,还是伪造事实、埋葬真理与迷惑群众的人呢?

政党、領袖与个人迷信

在关系到党的命运的极端重要的問題中,中国教条主义者維護着两个基本論点。

第一,他們公然竭力維護个人迷信。他們的論点是,批判个人迷信除了是修正主义以外不是任何別的东西,而其起点则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这里,我們最好讓他們用自己的話暴露自己的立場。1963年9月1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上的《关于斯大林問題》一文中逐字地写道,批判斯大林乃是为了各共产党“否定斯大林曾經捍卫和发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

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他們把批判个人迷信評作为“早已被人說破的卑鄙伎俩”，把由苏共領導进行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說成是从“反对无产阶级領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巴枯宁、考茨基与托洛茨基一脉相传下来的。他們还說，“苏共領導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囂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

这就是現代教条主义的秦斗的立場。这种立場被說成是不能有任何怀疑与动摇，并以自負的叫囂“对，我們保卫斯大林”来作結束。

在同教条主义者的論点展开論战之前，我們想談及一个由中国領導人自己提出的問題，那就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僵尸”复活的問題。許多事实真实地表明，历史上早已被最終埋葬了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有所活动了。或者說由于那篇文章的作者們，托洛茨基分子又到了“重新走上舞台”的时候了。正像通常所見到的那样，当他走上舞台时，乃是要他們起某种作用。應該說，托洛茨基分子开始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这个“政治僵尸”的复活向世界宣告了什么，从“舞台”上声言了什么呢？这是記載于1963年2月17日第四国际的国际書記处声明的對話中的一段評語：“它（第四国际。——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方針，比之于赫魯晓夫的方針是更进步的，因为这同我們运动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針有显而易見的联系。”这种評价写得如此斬釘截铁，以至沒有任何可以規避之处。为了使全世界确信教条主义者同他們是一伙并支持他們，托洛茨基分子从政治坟墓中，从教条主义者的“譴責”与“憎恨”中抬头了。

正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提供了看清誰站在什么立場以及理解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为什么极力維護中国教条主义的可能

性。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了这些事实，一切注解都是多余的。现代托洛茨基分子按照“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方针，向现代教条主义者大送秋波，并公开表明自己同他们的一致。

让我们再看看中国领导人所维护的立场的实质。不论在今天或任何时候，公然维护个人迷信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不仅涉及个人，涉及我们对他的态度以及就我们的情感来说多少是可亲或不可亲的东西。不，所涉及的是某种大得多的东西——党、党的政策、党内外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党的方法、它同群众的联系以及它的政治方针等。

维护个人迷信，意味着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接受那种认为不是群众而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是如特瓦尔多夫斯基所写的：

“……透过烟雾
他看到了一切，
如同上帝
他从不犯错误。”

维护个人迷信，意味着给作为群众集体组织者的党的领导作用投上阴影。而如果党的领导作用不增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一般说来是能够设想的吗？

维护个人迷信，意味着提倡党和国家以及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状态。因为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与准则，践踏了集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法制。这个时期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沉重的创伤。

维护个人迷信，意味着盲目维护领导工作中不以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要求为基础和根据的主观主义，意味着维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纵容个人迷信的理论错误。

这就是维护个人迷信所意味着的东西。

那么，誰是修正主义者？誰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是清除了共产主义运动阴暗时期錯誤的人呢，还是維護这种錯誤、把它們化为实践并使它們固定下來的人呢？

教条主义者維護个人迷信是艰难的。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們沒有为消除个人迷信做任何事情。我們完全理解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前委員阿塞爾·瓦西多夫的話。他写道：在中国，对苏联表示任何爱戴的人都“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者”，等待着他們的“只有一条道路——通向那种所謂‘劳动教养营’而实际是集中营的道路，那里至今还有我們数百同胞在受折磨。”再請看他們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年青一代的！他們現在大捧特捧由于不幸的偶然事件而死亡的战士雷鋒的榜样。在他的日記中写道，他想成为毛澤东的“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他們不是教育青年男女热爱与忠实于党和人民，而是……領袖。中国教条主义者作为个人迷信一貫的維護者与传播者，不仅在理論上而且在实践上現出了原形。他們可說是不仅在思想論战中而且在生活中都建立了个人迷信的秩序。

以尼·謝·赫魯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現領導所进行的工作，正如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把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斗争进行到底，对我們党、一切兄弟共产党与工人党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有巨大的原則意义。”^①在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共产党都作了这样的評價。那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澤东同志也是这样声明的。他說：“苏联的同志們，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們在不长的時間內，取得了极其輝煌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

^① 托·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62年保文版第150頁。

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确的方針，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

对，苏联的同志們正确地做了——“按照列宁的指示”。而現在，为什么教条主义者却把修正主义的全部“罪过”加給他們呢？也是因为遵循“列宁的指示”嗎？这样提出問題岂不是很自然的嗎？

个人迷信是反馬克思主义的現象，是在党的生活与活动中暫時滋长出来的与党相背离的贅瘤。一如既往，現在各共产党已经找到力量摆脱这种异己物，清除了它，并更坚强地、更富战斗力地站立起来。現在还为已被否定和譴責的过去叹息，那只能意味着阻止党的进步。

現代教条主义者的論点的第二方面牵涉到党、領袖和群众的关系問題。他們鼓吹的是什么呢？他們在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領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这里，中国理論家完全陷入了泥坑。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如何能在党、群众与領袖之間建立正确的关系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群众創造历史。階級和群众建立作为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政党。在党内成长着、工作着政治活动家，他們的能力、知识与经验有着重大的意义。

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也有自己的党——共产党。在共产党内也成长着和战斗着政治活动家——共产党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为了胜利，共产党必須经常巩固自己同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党的力量的源泉。沒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就像无本之木一样。

只有在活动中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只有严格遵守并服从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个人才能起积极的作用。把自己放在党和党的原则之上——就成为有害的人，就开始妨碍党的事业。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下，党、群众和领袖之间才能有正确的关系。而当维护个人迷信时，这种条件和要求就被否定了。例如，在那种由北京公开维护的个人迷信的环境中，当只有一个人受颂扬，当他把自己放在党和人民之上，当他深深地蹂躏集体制和民主，破坏法制并为迫害开辟道路时，能够说有党和领袖之间的正确关系吗？不，不能有，也不能设想将来会有。

消除个人迷信任何时候也不会与群众领袖的作用对立起来。相反，为群众的创造性和个人的活动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因为，在党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得到繁荣的地方，也仅仅在那个地方，党和人民之间，党和个人之间才能建立最正确的关系，仅仅在那时，政治活动家也才能由劳动人民加以监督。要知道，再说一遍，正是个人迷信深深破坏了这些要求：简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怎么能够在维护个人迷信的同时，又把自己说成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理解的捍卫者呢？

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卡·马克思公开谴责了一切形式的个人迷信。正是他写道，在共产党人的章程中必须“抛弃一切助长对权威无条件崇拜的东西。”作为反对个人迷信的战斗，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的热烈的信徒，我们为提高忠诚的，同党和人民有紧密联系的党的活动家与领导者的威望而热情地斗争。

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并不排除统一的领导。只有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集体领导制与党内

民主得到充分发揚的新条件下，党才能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建設起来，党的领导的威信才能由于它依靠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由于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創造性和主动性而日益增长起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体會議之后，以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为首的我們党的领导的威望，也由于它在所有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向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学习而不同寻常地大为增长。凡是向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吸取力量和经验的地方，党的統一领导的威望就会增长。

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不会瓦解党的队伍，而为党的团結創造最有利的条件。这不仅是合乎邏輯的，而且是很容易理解的。党的紀律与統一只有当它是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和任何人所强加的时候才会有力量。这种統一与紀律的力量什么时候更大一些呢？是民主和批評受到束縛的时候呢，还是为列宁的这些原則的生效开辟了广闊天地的时候呢？当然是这些原則起作用的时候。正是个人迷信大大破坏了这些原則。这样，我們怎么能认为压制批評和集体领导制，进行迫害，破坏法制反而会使党的队伍团結起来呢！

还有，教条主义者把个人与党混为一談。誰批評和否定个人，誰就是否定党。好个半吊子理論！怎么能够支持这种論点呢？个人可能犯錯誤，可能走入歧途。他們的活動可能带来許多損害。列宁写道：“工人領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們犯了錯誤，党就去糾正这些錯誤。”^①如果他們不願糾正，党的紀律就要进行制裁，党就要找他們清算。但是，任何类似这样的表現，任何对党的路线和紀律的背离，都只能有不持久的暫時的性质。正如历史所教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总是能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0頁。

找到力量粉碎非党的表现，清除它并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具有高度党性榜样的个人，对共产党人和人民永远都是可贵的。人们敬重他们，爱戴和尊敬他们，他们的形象将永远不会被人忘怀。然而，如果“领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走下历史舞台并给人们留下不好的记忆，党和人民仍然生活、战斗和胜利。党和人民高于一切！

教条主义者的见解没有逻辑。他们的大作整个儿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相背离的。他们不想看历史的真理，他们不想睁眼看看历史事实。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说得很对：

“他们不相信事实，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

誰看不到或不理解事实的語言，誰就是錯誤的。

(譯自1963年第16期保《党的生活》杂志)

反对經濟理論上的主观主义 和唯意志論(节譯)

柳·格奥尔基耶夫

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論这一对政治冒险主义的长期伴侣，是中国教条主义关于当代世界进程及其規律观念的一个組成部分。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論从头至尾处处貫穿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两个世界社会体系間的关系、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与矛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以及从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和手段等的观点中。本文仅就中国教条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最重要经济規律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論的极为錯誤的态度做一个分析；中国教条主义的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夸大了一些規律，但同时又完全抹煞了另一些与前者互相关联和类似的規律，筑起“中国长城”反对与他們那些关于世界和自然发展及变化过程的不高明的錯誤概念相抵触的社会規律。

一、抹煞帝国主义发展的“联合”趋势

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态度，不仅要求看到有利条件，而且要求看到革命力量的道路所充滿着的困难。譬如說，中国共产党完全抛弃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发展的“联合”趋势所造成的許多困难，这样就过高估計了帝国主义的矛盾，貶低了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間的矛盾。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刊

“人民日报”断言：“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来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更加迫切、更加直接、更加现实。看不到这些，就是否认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的尖锐化，不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的实质”^①（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人民日报”爱用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世界阶级对立以及产生这种对立的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的实例。“人民日报”写道，巴黎一波恩轴心的巩固是早已摆脱西方军事集团的戴高乐对美国的大胆打击。^②

列宁曾经指出，“分裂”趋势和“联合”趋势，都是帝国主义的一般发展趋势，特别是成熟了的（即正在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后者是垄断集团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和被剥削民族的解放斗争，捍卫大资本的共同利益而实现的联合。可是，中国领导人只是完全任意地对“分裂”趋势加以解释，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以为这种矛盾比起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迫切、更加直接、更加现实”。

的确，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更加具有说明帝国主义矛盾加深及其“分裂”趋势（按照列宁的说法）加强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矛盾加深和加强的过程达到了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至于法国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P·阿萨这样写道：“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利用他们所喜爱的矛盾概念的良机。”^③

目前，帝国主义发展的“分裂”趋势的最大的表现乃是美国

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② 1963年7月25日《真理报》。

③ 保加利亚通讯社1963年3月8日讯。

垄断集团与大陆欧洲垄断集团之間斗争的尖锐化；大陆欧洲垄断集团在巴黎一波恩的庇护下已“結成了”“共同市場”。这种“分裂”趋势首先是在重新分割商品銷售市場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的。正如苏共綱領所指出的，現代資本主义使得市場問題极端尖锐化了，帝国主义是无力量解决这一問題的。^① 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總裁P·杰可布逊先生1963年2月发表的預报中指出，战后经济扩张在美国和欧洲結束了，“今天出现了与1930年至1940年这十年的头几年中所具有的一系列共同特点的局势”。^②

在当代世界中，两个社会经济形态之間的矛盾和斗争是各种影响国际舞台的势力之間一切矛盾和斗争的紐結。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的斗争是世界舞台上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同盟者和統治发达資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互相对立的具体表现。今天，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像列宁时代那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之間进行的，而是在两大社会体系之間进行的。这一斗争已具有控制国际关系范围内所有进程的規模。甚至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进程今天也不能仅从揭示資本主义規律的观点出发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不去注意对这些进程发生影响的共产主义。因此，正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綱領性文件中所断定的，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

当代的基本矛盾对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的表现，发生着强烈的影响。这一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基本矛盾的发展限制了資本主义剝削的范围，加强了“分裂”趋势的作用，即使竞争和帝国主义的所有矛盾尖锐化。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6頁。

② 1963年11月20日《泰晤士报》。

另一方面，基本矛盾的发展促使了国际帝国主义彻底崩溃的来临，加强了“联合”趋势的作用。例如，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虽然不断地在加深和加强，以及它们为资本主义剥削范围斗争的尖锐化，但像1914年和1939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那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今天还是最小的。

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即社会主义已开始变成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帝国主义发展的“联合”趋势在经济和政治上最重要的现实性是垄断集团的“整体化”，特别是“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所以产生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产生在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最重要的交界线的大陆欧洲，即两大社会体系最积极竞争的世界上最头痛的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本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企图通过大陆欧洲垄断集团的卡特尔以制造新式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摆脱自己在内外经济和政治上所遇到的困难。

看不到资本主义在总危机第三阶段政治重于经济的现象，就无法科学地分析体现帝国主义发展的“联合”趋势的垄断集团的“整体化”及其最高形式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最近十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获得巨大成就以来资本主义政治重于经济的程度，可以从美国大银行家和财政部长狄龙的一篇体现华尔街战略路线的有名演说里看出来：“美国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而加强了‘共同市场’，尽管这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失。”^① 另一方面，下面的情况也表明经济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继续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从美国的最终的用意来看，美国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是由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与西欧资本势力相勾结以阻挡共产主义在此地区进攻的

^① 1962年第12期保文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89页。

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计划中，世界垄断集团对于帝国主义发展的客观的“联合”趋势的利用，表明了“整体化”（“共同市场”等）在当代帝国主义政策措施的体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一作用显然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与它的关系，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资本家阶级合作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也是资本反对劳动及维护其所有其它利益的“神圣同盟”的形式。赫鲁晓夫写道：“帝国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不断加强及其计划经济的事实面前，在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的面前，被迫寻求缓和自己阵营内部矛盾的途径。他们不害怕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并试图使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超过他们内部的矛盾。”^①

当代资本的“整体化”具有关税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等国家垄断集团联合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和利润为基础的。资本的“一体化”同样是各国内部不同领域中个体资本之间及大资本之间的“共济会”；马克思根据平均利润律的作用的分析，指出了这种“共济会”的特征；不过，今天只是具备了新的帝国主义条件：剩余价值主要是通过垄断利润体现出来，垄断集团控制了国际基础，垄断资本主义已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超过世界帝国主义。马克思在指出利润变为平均利润表明了每个资本家和每个部门的资本家集团剥削整个工人阶级时写道：“我们有像数学般精确的解释，资本家为何对他们之间的竞争表现出这样少的兄弟博爱并组成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共济会。”^②

^① 1962年第9期保文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8页。

^② 《资本论》保文版第3卷第211页。

一个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各部门的资本家集团之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之间等的斗争，一句话，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的竞争和其它方面的斗争，都是瓜分和重新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无疑地一个资本家被另一个资本家击败了，一个资本家被另一个资本家吞没了。但是，一国之中的资本家集团或国际资本家集团则继续发挥它们的职能，进行剥削和不断成长。1963年，美国垄断集团“克雷斯勒”购买了法国商行“西姆卡”的绝大部分的股票。在“西姆卡”屈服“克雷斯勒”后不久，戴高乐便提出要求失掉独立的法国汽车制造厂总厂长代替“莫秀·比果齐”。吵鬧更加厉害了，比果齐被迫辞职。但是，戴高乐的愤怒并未能破坏“克雷斯勒”和“西姆卡”的联合，因为“西姆卡”的法国资本家让出了一部分资金，以保持它与“哲涅拉尔—莫托尔斯”、“福特—莫托尔”、“福尔克斯—瓦根维尔克”和其他更为强大的垄断集团的致命竞争中的那部分利润，他们甚至还利用“克雷斯勒”的帮助，通过扩大自己的国际活动以增加自己的利润。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评论华盛顿和巴黎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矛盾、争论和分歧，但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却执行着类似的方针之后写道：“古巴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法国和戴高乐在一年前世界遭到危机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关于戴高乐和法国遇到同苏联的其它的冲突时所持的立场问题，在美国也是基本上没有疑问的……戴高乐和北大西洋集团已经摆脱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甚至迫使法国总统以共同事业的名义来遮盖自己的思想。

结果，法国总统现在认为，他可以保险地把法国引向自己利益的道路，而不需要恐惧和操心安全。”^①

美国资产阶级作者康克的这一思想同样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于“个人利益”与“共同事业”(也就是说“恐惧和操心安全”,即在革命进攻面前保全资本)之间互相关系的现实见解。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写道,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对于垄断集团来说比起它们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更加迫切、更加直接和更加现实”,并以为通过唯意志论的武器就可以战胜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甚至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②

“联合”趋势和“分裂”趋势,都是成熟了的(即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决不能被某个民族、某个政党或某个人物所推翻。中国共产党企图抛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政治冒险,对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具体形势和任务得出抽象的概念,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一系列其它充满着毁灭性后果危险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

二、关于“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规律”的臆造的“理论”

在中国的概念中,不仅对帝国主义问题,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存在有主观唯意志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有害的影响。

列宁总结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形态的两个阶段的原理,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动取酬……社会主义是直接

① 1963年10月5—6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②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这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①

共产主义不能不通过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和政治经济的基础上产生。

这是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它无疑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实了的科学真理。但是，这个原理遭到了歪曲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民族条件的借口下发生了争议。中国领导人公开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和“亚洲化”的伟大功绩。刘少奇写道：“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欧洲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亚洲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条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创立了中国式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指东南亚国家。——作者）。”^②

让我们首先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的文章来了解一下中国教条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不高明的理论的冒险主义企图，在这种理论中主观主义的决议*代替了关于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作用的科学分析，而唯意志论代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第30卷第252页。

② 1963年第15期《共产党人》杂志第49页。

* 例如刘少奇写道：“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的。不错，这六亿多人口在经济上暂时还比较穷，在文化上还几乎是‘一张白纸’，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说来，这又算得什么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除了别的特点以外，这六亿多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摘自1958年5月29日《真理报》。）

替了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口号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口号忽视了自然（特别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例如，“三年紧张劳动——万年幸福！”“两条腿走路！”（第二条腿是“小型炼钢”、“简陋的、群众性的小型企事业”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等等。^①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指中国的经验——作者），提出我们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性的观点，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②

“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③（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有人（指苏联共产党——作者）会说，他们那里已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④

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任意地，荒谬地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理论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原理。

中国共产党把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本质上已经固定的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阶段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

① 中国共产党口号索引于1963年第39期《经济报》第36页。

② 1960年8月5日《人民日报》，引文根据1963年第13期《共产党人》杂志。

③ 同上。

④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复信》，1963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主义逐渐过渡的时期混为一谈。这种情况还在“我們对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规律性的观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論点中表现出来。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說法,所有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之間的社会发展过程^①,就其内容上組成了一个总的过渡时期。这种看法在下面中共中央的荒謬論点中得到了說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即在苏联今天所处的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必要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不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斗争……”,也就是說,在已达到广泛开展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居绝对統治地位并进行建設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完全和彻底胜利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已经結束了。改变了多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社会主义、小商品和资本主义三种基本成分),同时也消灭了社会上敌对阶级的界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全胜利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和合作社所有),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間存在阶级差别,但不存在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逐渐地过渡中,工人和农民甚至不是实际概念上的阶级。列宁对阶级下了一个簡短的定义:阶级是一些社会集团,其中有的集团由于它們在社会生产制度中具有不同的地位,能够占有其它集团的劳动。

^① 《中共中央給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复信》第十三条。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中，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工人和农民之间（虽然还有非本质的阶级差别），存在着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如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和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如苏联）的共同的根本利益。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①

混淆共产主义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几个性质不同的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新社会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忽视不同时期规律的差别，把一个时期特有规律的作用运用到另一个时期，从而提出了冒险越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根据。也正是这种理论成了中国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石。

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在其幼年时代就获得了关于物质刺激在新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问题的实践经验。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写道，我们曾经考虑过，或者可以更正确的说，我们没有充分地预见到，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的职能来建设国家经济，

^① 1963年7月15日《工人事业报》。

并在小资产阶级的国度中按照共产主义方式分配产品。生活证实了我们是错误的。应具备一系列过渡的阶段：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准备（进行多年的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

苏联建设新社会的历史经验无疑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一结论。它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付酬”）是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发展的必要阶段；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不能起动力作用的；尽管革命热情和其他精神上的因素具有多大的重要作用，不过它们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是不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的，等等。苏联政府1963年9月21日声明宣称：“我们当时特别地意识到，公社作为农民组织的形式，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是不适当的。我们党根据列宁合作社计划决定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任务。”

尽管存在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国领导人改变了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宣布了以极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为基础的“三面红旗”的方针。这一冒险主义的方针，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一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阶段和“按劳”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开始常常诽谤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拒绝按劳分配原则，并开始在人民公社中实行平均分配……在中国开始把我们（指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作者）称为保守分子，同时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将会使中国越过建设新社会的整个阶段并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①人民公社真正地被认为是通过社会主义“登上”共产主义的“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天堂和天梯——这是共产主义和人

^① 《苏联政府声明》，1963年9月21日《真理报》。

民公社之間关系的最恰当的比喻。”^① 中国领导人认为，“我們應該积极地利用人民公社这一形式并通过这一形式获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②

中共中央由于在公社中实行了平均分配的原則——吃飯不要錢和享用一定的公共設備——从而在理論上和实践中踐踏了列宁关于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設中作用的原理。“凡是在经济現实中和大多数人民意识中还没有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維埃都不会‘实行’，都不打算‘实行’，而且也不應該实行。”^③ “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論证的时候，我們才珍視共产主义。”^④

馬克思在写道每个民族都能够而且應該学习其他民族时指出，甚至在向資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带有自我发展的自然規律的遺痕）也能够减少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列宁关于物质利益的作用的科学結論（如按照中共中央的說法）在最大程度和最直接的意义上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即适用于所有建設新社会的国家的原理。

物质利益永远是和经济条件及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确，物质利益在每个社会中都起了相应的作用。恩格斯說：“每个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⑤ 但与此同时，正如我們从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中所看到的，利益，由于其内容为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它永远是物质的（客观上受生产关系的約束而不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約束）；而在階級社会里，

① 《广州日报》，引文根据1963年8月24日《真理报》。

② 《广州日报》，引文根据1963年9月21日《真理报》。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頁。

④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3頁。

⑤ 恩格斯：《反杜林論》1950年保文版第123頁。

利益是具有階級性的。普列漢諾夫寫道：“利益從何而來？它是否是人的意志和思想的產物？不，利益是從人們的經濟關係中產生的。”^①

在剝削社會里，帶有階級矛盾痕跡的物質利益具有對立的性質。剝削階級感興趣的是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勞動，而被剝削階級關心的則是更多地獲得自己勞動的成果。所有時代的剝削階級，首先是資本主義階級，為了占有更多的剩餘勞動，為了增加剝削，過去和現在一直利用勞動者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利用飢餓和失業對他們的威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物質利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具有完全新的內容，這種新的內容由於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和人剝削人的消失決定的，是由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決定的，這一規律的作用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需要的增長之間的直接聯繫。

社會主義社會力圖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率，以同樣的勞動量創造出更多的物質和文化財富，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不斷地提高生產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的物質利益起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直接動力的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物質利益的內容是由經濟關係和生產關係的類型和性質所決定的；生產關係首先表現為物質利益，而經濟關係則是通過物質利益直接表現和體現在人們實踐活動中的。因此，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它通過這個方面起着發展生產力和一般物質生產的動力作用。列寧特別重視關於生產關係及其與利益（即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和表現）之間互相聯繫的論點；他批判了關於生產關係的庸俗的經濟觀點；生產關係是一種處於社會之上的不可避免的力量。中國教條主義把思想

^① 普列漢諾夫：《哲學選集》第2卷1956年俄文版第260頁。

因素提到首位，說什么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资产階級化”、“退化”等等。

物质利益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誰生产的多，就得多。这样广泛的采用物质利益原則，就能够促使每个劳动者进行更多的生产劳动，提高技能以及最经济地消耗原料和别的劳动对象。与此同时，物质利益原則还对社会全体成員带来好处，因为这一原則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而也增加了全体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苏联共产党的实践证明，物质利益原則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时期，继续发挥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作用。苏共綱領指出：“党以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建設应该依靠物质利益原則的原理为出发点。在今后二十年中，按劳付酬仍将是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基本源泉。同时，必須不断縮小高收入和較低收入之間的差別。”^①

我們可以从商品发展方面，从降低劳动报酬与扩大社会消費基金之間的差別方面，看出物质利益的发展和提高；物质利益是根据社会主义物质刺激到共产主义平等的方向，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最近十年来，苏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三倍、农业增加了67%、商品流通量增加了二点六倍。苏共二十大以来，每月收入不到四十卢布的人員减少了四倍，收入四十到六十卢布的减少了两倍，而收入一百到一百六十卢布的則增加了两倍。二十年规划規定，社会消費基金从1962年的二百八十四亿卢布扩充到1980年的二千五百五十至二千六百五十亿卢布。

关于平均分配的人民公社（“通向天堂的天梯”）的作用以及把物质利益看成是“资产階級原則”的唯意志論的理論被中国本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0—1451頁。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翻了。这种理论破坏了经济状况，降低了生产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苏联政府1963年9月20日声明指出：“中国工业和农业严重地遭到了破坏，中共领导几年来不得不从事所谓‘调整’经济，这实际上表明他们承认‘三面红旗’方针的彻底破产。”^①

中共中央的“自力更生”原则也属于中国教条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规律”的臆造的、主观的和唯意志论的“理论”。中共中央写到：“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②

毫无疑问，各国社会主义不能不主要用自己的力量并依靠国内资源建立起来。但这并不是“自力更生”理论的内容。“自力更生”理论包含着明显的否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客观发展规律，即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成分；针对这种分工，中国共产党反而提出了自给自足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经济。

让我们还首先看一看中共中央和中国报刊有关“自力更生”理论内容的文章，再来对中国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实践和后果进行考察。

我们可以在《大公报》(1963年6月27日)欧阳欽的一篇文章里读到，“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正确地贯彻了主要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的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我标的。——作者)

1959年以来中国过渡到“自力更生”的方针无疑是事实；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贸易统计资料中明显地看出来。1950年至1957年，社会主义

① 1963年9月21日《真理报》。

②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复信》。

国家和中国的貿易总額在中国对外貿易中从占33%增加到占77%，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苏联的，在个别年代中曾經超过了50%。众所周知，对于沿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国家，同在工业化方面先进的国家进行貿易联系是有着极为重大意义的。对于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这个問題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活动，給中国带来了良好的机会：首先在国外市場推销消費品；其次，购进具有生产意义的商品。

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貿易結構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出口的只是消費品，而从苏联进口的仅仅是具有生产性质的商品。尽管存在这些有利条件（苏联貸款援助的四亿三千万美元和技术帮助除外），以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到“自力更生”的方針的时候，从1960年开始减少它同社会主义陣营的貿易。最近三年来，中国与社会主义陣营的貿易額降低了两倍，而同苏联的貿易降低了二点七倍。

“自力更生”的方針（还有平均分配等）乃是减低中国社会主义建設速度的原因之一。

显然，“自力更生”論的形式的后面暗含着民族经济自給的理論；正如中国1958年以来的教訓所表明的，这种自給的民族经济拖延了发展的速度，使社会主义建設不得不付出多余的代价，忍受不必要的痛苦。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威力是根据其发展的速度和它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衡量的。速度是由积累量和投資效果决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自給的经济是影响各部門投資效果的两个因素。自給的民族经济不得不生产所有或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业品，这对中小国家和工业

不发达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条件下，自給論的概念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在实践中陷入死胡同。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在一国范围内的效果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效果和結合的基础上，为专门化、减少品种、增加大批生产、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等創造了条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家全盘自动化制造厂不久即将开工。沒有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規模自动化的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生产要求减少到只有数种主要的产品，其中大批产品需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固定的市場。类似的情况可以举出很多。

托·日夫科夫同志在分析保证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速度的因素时指出：“这（指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作者）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之間互相援助的必然結果，是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全面合作的必然結果，首先是我們祖国从伟大的苏联不断地获得大量的物质和科学技术等的帮助……这种互相援助更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了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

毫無疑問，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的唯意志論观点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也損害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利益，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而且也限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規模自动化生产的可能性，降低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投資的效果和发展的速度。

* * *

中共中央和中共报刊，指責苏共、意共、法共和其他共产党“沒有能力认识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① 托·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1962年保文版第91頁。

“毫无根据的主观主义的假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錯誤观点，等等。^①

的确有“沒有能力认识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和“毫无根据的主观主义的假定”，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錯誤观点！但是，中共中央不去在它們存在的地方，而到远离自己千里之外去寻找！

（譯自1963年第12期保《新时代》杂志）

^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頁。

社会主义国家問題

雅·拉代夫

近几十年来苏联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要求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第二阶段的問題，以便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情况和它将来发展的趋势。全民国家論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首先，苏共二十二大本身不仅提出了全民国家論的基本理論原理，而且还有这一理論很重要的細則。

針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論的发展，立即出現了教条主义式的批評，中国的理論家們就是这种批評的最极端的代表。作为他們的批評的基础的东西，是认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在剝削階級消灭之后(包括在完全消灭階級差別之前)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理論家們所利用的理論提法，特別令人信服地表現了一种教条主义思想的特征。他們把一些在社会发展过去阶段有意义的理論原理絕對化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組織继续发展的更高形式。

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是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因此，对馬克思主义的推崇或修正的任何思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无产階級专政的問題。从理論上，中国領導人的教条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差异。但是，由于他們从完全相反的立場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达到了同样的实际結果。第一种理論宣称无产階級专政是階級完全消亡之前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組織，第二种理論否认无产階級专政对資本主义社会按革命方式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如

果在理論上两种思潮是完全相反的，在实际意义上两者却都否定政治組織向更完善形式的发展。

还須立即补充，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特有的过程的教条主义的解釋，并不是他們的批評的全部內容。他們的批評表面上同馬克思关于国家学說的观点的革命发展是相联系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像是保卫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坚决斗争。

—

照中国同志們看来，苏共二十二大的提法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說相违背的。因此，他們的批評是从論述经典作家开始的。他們认为，馬克思和列宁把推翻资产階級政权到消灭階級差別为止的全部时期看作是无产階級专政时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們引证《哥达綱領批判》的下述地方：“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无产階級的革命专政。”^①在論述这一思想时，中国理論家們把重点放在“共产主义社会”上，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理論上和实际上早已证明，旧社会按革命方式轉变为新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两个阶段之間的科学界线，馬克思在中国理論家們所援引的著作中的第一部分已指出，在两种情况下，馬克思都用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一語。这样，馬克思并不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中国理論家們所描繪的那样。他們沒有看見“共产主义社会”一語的意思的本质，因此，把意思引到詞句上去。

馬克思在这一情况下，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表示共产主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頁。

的低級阶段，这在分析过渡时期特有阶段时更加清楚。这一时期的本质，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按革命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结束的。后面，馬克思本人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时期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下一阶段的界线。在指出过渡时期的历史界线和这一时期国家的性质之后，馬克思继续道：“但是，这个纲领既沒論到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沒論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①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时期。馬克思規定了第一时期的国家性质，对第二时期只限于最一般的提法。当时的历史经验，并没有为理論上作出結論而提供材料。

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运用了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过渡时期的定义。中国理論家們不去研究列宁所清楚表达出来的观点，而改变了他的意思，以便加进自己的理解。列宁特別鮮明地区别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第一时期。他不止一次地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馬克思这一意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界限限制在建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时期里。为了证明这点，我們將指出列宁的两段意思：“同志們，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有一个长久的、比較困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②在另一处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絕對必需的，……”^③指出列宁說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的所有地方是困难的，因为太多了。好像列宁已料到在說明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時間的过渡时期的历史必要性时錯誤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頁。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8頁。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頁。

地解释馬克思的意思的可能性，而指出这一时期国家的性质。“所以馬克思說，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① 中国理論家們通过解释经典作家所要证明的东西，和这点正完全相反。

錯誤的理論論述，成为中国理論家們修正馬克思的社会学說基本原理的理論提法的独特运用。中国理論家們把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看作是“統一的完整的时期”，而不区别共产主义单独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照他們的发现，有一个不断的革命过程。“我們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积极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創造条件。”^② 一句話，中国理論家們把革命看作是社会的经常同路人和 社会进步的经常因素。“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階級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③ 后面沒有任何证据，也沒有理論上的說明，到底这一时期革命的性质的方法是什么。

同一文集給革命所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們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概念中所包含的意思。“所謂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階級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④ 著名的馬克思原理宣称，随着社会內部階級斗争的停止，革命暴力和革命战争也消除了。因此，革命便成为多余的了。照中国理論家們的看法，在任何階級差別消失以前，社会中的階級斗争是不会停止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頁。

②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頁。

③ 同上书第95頁。

④ 同上书第32頁。

的。因而，中国理論家們的革命定义对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有效、相应地也适用于共产主义关系的性质。

对革命的中国式的理解，即从对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庸俗理解开始到一个改变了的“超革命”的不断革命論告終，毫無疑問，其中不能加进任何馬克思主义的意思。整个这一超革命的理論設計，不过是对馬克思主义进行小资产阶级的修正，为类似公社^①的某种学究式的实验作独特的辯护。

不断革命观点的表面革命的性质，只要同原来理論詞句所要求的实际关系发生联系，就会表现出来。每一个革命都改变社会的性质。馬克思說，“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②这一定义是一般的，而且涉及到每一次革命。不同時間革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性质，按照推动革命的阶级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一定义的一般在于，每一推翻旧社会制度的革命，就其內容而言，都是以另一个阶级的統治来代替一个阶级的統治。由于每一次革命都要推翻旧政权和每一次革命都給社会关系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改变，那么就要問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后果面出

① 公社是一种生产关系发展到較高阶段的組織形式。在中国，它在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中使用。社会組織的形式同样是社会的产物的——它們在经济改造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着。每一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創建着較完善的組織形式，它們能够作为那些較迟具备采用新形式的前提的国家的典范。但是那个采用现成形式的国家，一定要达到采用現成的发展阶段，或者至少是这一形式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在形成中。那时，較发达的組織形式就加速了运动。当在社会中采用不符合于当时社会所处的状况，那时这种形式将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因为形式本身并不产生它們所需要的条件。把不适合他們的内容加到这些形式中去，就使得在别的物质条件下进步的形式，变成发展的障碍。既然形式不符合内容，那么它在使用时就成为对現有关系反常的形式。在群众的意识里，对这一形式不管进行什么样的理論上“頂峰”的解释，而它都失去了自己的进步意义。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頁。

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这些关系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是什么？什么地方也沒有回答。只有理論上无限制的和冗长的詞句，說那些革命將具有“別的性质和方法”。在“別的性质和方法”中加进任何解釋，革命都不是社会进步永恒的火車头。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排除了階級对抗这种性质，因而共产主义社会由一个社会状况革命地轉变为另一社会状况的可能。“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①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將导致社会組織的更发展的形式。但是这种发展將不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

二

中国理論家們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的組織的理論中，除了資產階級观点之外沒有发现什么別的东西。“任何一个具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謂‘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鮮的东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資產階級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②

可能是中国理論家們接受不了这个名称，要不怎么使他們想起資產階級观点？但是名称本身并不是观点本质的证明。不要忘記每一个術語都應該同它所表現的內容一致。如果中国同志們发现了更确切地表現作为全体人民組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的更恰当的名称的話，可以采用它。

但是，批評針對的并不是名称，而是全民国家論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資產階級的国家学說，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呢？”^③“社会主义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8頁。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頁。

③ 同上书第33頁。

的全民国家”的概念又一次被歪曲了，以便在其中加进恰恰相反的意思。

但是，当同样这些理论家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叫“人民的国家”^①，对他们又能说什么呢？看来，只要这一术语落在中国理论家们的口上，就立刻获得革命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它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更高阶段，这便导致以资产阶级的国家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每一个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批评家，应该揭露对“人民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原则区别。任何别的态度或是不了解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或是试图用玩弄词句来偷换争论的实质。人们早就知道，在同一个词句里，可以加进相反的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没有财产的群众和刚刚从这些群众中分出来作为独立阶级的无产阶级，赋予“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同资产阶级对其理解是有不同的意思。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把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人民的国家”，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当作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民主。但是只要剥削者还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国家就不能是全民的，并且任何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理解都是对剥削阶级和他们的政治组织的保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并且在事实上每天都使它更加确信，资产阶级国家是压制他们和使他们屈从的敌对阶级的组织。因此，任何关于“人民政权”的理论，只要剥削者还持有政权，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的保护。这一被千万个事实所证实了的真理，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的财富。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但是，由資產階級國家，其中包括最發展的議會共和國仍然是剝削階級統治被剝削階級的機器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社會發展不導致全民國家的結論。只有無產階級可以建立真正人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國家把政權交給構成人民的勞動階級，而在這個意思上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可以叫做人民的。因此，列寧的“人民政權”一詞是同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①的階級定義在一起碰到的。就其本身來理解，“全民國家”的名稱更符合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二階段。

在提出用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嚴厲責難之後，中國理論家們立即發出下列的致命問題：“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呢？”^②在兩種情況下，問題都是指示：任何地方如果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變成全民國家時，社會主義國家就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了。

整個這一沒有證據的、以問題和有條件的結論作基礎的理論破壞行動，整個這一“當……”，接着是“是不是”和最後“如果一切是這樣”這些字占着證據地位的文字遊戲，一點也沒有揭露“要用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只證明了一種“具有另一種性質”的思維方法。用整個這一作法同樣可以很好地回答中國理論家們。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全民國家，而這點正是那些叫做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們所否定的，這種否定是不是否定馬克思關於唯有無產階級能夠建立全民國家的學說？是不是拒絕承認政治組織向更高形式的辯證發展，以便當向全民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在這種意義上也就是向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國家逐漸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時，從理論

① 《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頁。

②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頁。

上为政治组织所存在的停滞和墨守不发展形式的状态进行辩护？如果一切是这样，任何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个較低的阶段向較高的阶段过渡不就意味着历史的大倒退嗎？在他們来回顛倒的形式的問題中，已经揭露中国理論家所持观点的真正的实质了。

下面对他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的观点的分析給这一結論以新的证明。

三

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开始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政”这一概念給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第一时期，下了特別簡短而准确的阶级定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对剝削者进行阶级統治的组织(还可以加上在经典作家的定义中最常見的——机器、工具、机构、机关)。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十月革命使整个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用他們的法律术语來說当时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通过生产資料轉变成全社会的所有制剝削者被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轉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在经济法令的压制下自动地完成的自发过程。对于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須有一个国家组织，以便剝夺剝削阶级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职能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来行使的。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都证实了生产資料不能在沒有国家干預的情况下就可直接变为全社会的所有制的这一論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使用的暴力是反对剝削者斗争的必要措施。因为剝削者不会自願地退让通过剝削所得来的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组织成为統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把生产力从資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创造了使生产力更迅速发展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联合全体劳动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的方面来。这也是它所能做到的，因为它掌握能够满足这些群众生活利益的经济资料。

简言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同在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起，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发生了迟早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导致它向全民国家的转变。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其发展中就转变为全民国家。国家所经过的接连不断的阶段是在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只要为存在一定的政治组织所依赖的条件改变时，那么根据情况迟早在政治组织中会发生变化。

在苏联的社会中，最先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的物质前提。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向全民国家的过渡。在某些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这一过渡已经开始了并将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转变为全民民主的地步。这一过渡的特点是，它不是突然的飞跃，而多少是个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每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速度为转移的。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在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意味着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在不同国家里阶级相互关系所具有的形式虽有不同，但是这一过程迟早都要经历的。在苏联，剥削阶级的消灭经过了二十年，并且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斗争达到了剥削者作出最尖锐和野蛮的反抗的程度。根据1913年的材料，剥削者同他们的家庭一起占全体居民的16.3%。其中11.4%是富农家庭。1928年剥削者的数量减

少到4.6%，他們之中的基本部分是4.2%，是富农家庭。在三十年代中期，剝削者作为階級被消灭了。在同一时期，劳动階級的成分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工人和職員在1913年是全体居民的17%，1936年达到36.2%。集体农民和参加了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在1928年刚刚是2.9%，到1937年达到57.9%。在这一时期，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从74.9%减少到5.9%。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同样认为在苏联社会中已经消除任何剝削階級和这些階級的残余。在爭論的开始时，几年之前，他們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現在正在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①在一年左右之后，他們轉到相反的认识上，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中有剝削階級。一开始，中国理論家們通过一句話給自己制造了批判的材料：“有人会说，他們那里已经是沒有階級的社会了”，以便紧接着对这个文字的虚构給以“毁灭性的”打击：“我們回答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接着毫无根据地轉到如下的結論：“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剝削階級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懶汉、流氓、盜窃国庫者，等等，那怎么能說，沒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呢？”結尾是一个新的問題：“那怎么能說，无產階級专政已经沒有必要了呢？”^②这些就是中国理論家們对社会主义各国的階級成分頒布的观点。

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里，也沒有建立无階級的社会，同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党也沒有支持中国理論家們拋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頁。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頁。

出来的观点,以便使它遭到反駁。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保留有社会阶級的差别。社会的阶級結構在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生变化。在无产阶級专政时期,消灭了剝削者阶級。在这方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至于在苏联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剝削阶級已经完全消灭了,在另一些国家里,还保留剝削者阶級的各种不同的残余。因此,这些国家还是保留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

对决定保留无产阶級专政的社会环境,中国理論家們談到犯罪分子和社会寄生虫。社会寄生虫任何时候都不成为单独的阶級,因为它不是建立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经济上独立的集团的基础之上的。通过盜窃把社会产品攫为己有,并不产生盜窃者“阶級”。资本主义传统的保卫者,正如列宁所說的懶汉、騙子、盜窃国庫者等等,并不同剝削者阶級的消灭一起消失。而教会他們遵守劳动紀律并不一定要无产阶級专政。只要全民国家吸引全体居民无例外地去监督懶汉、騙子等等,逃避这种普遍监督将越来越困难而最終将成为不可能的。

然而这并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有关要求保留无产阶級专政的阶級基础的全部。当在剝削阶級残余和各种社会寄生虫中发现无产阶級专政的社会基础之后,中国理論家們指出了基本的原因。“只要这些阶級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說是沒有阶級的社会,就不能說无产阶級专政已经不必要了。”^①最后,基本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现阶級差别。但是,正如我們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是同阶級社会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这个阶段并不继续到所有阶級差别的消灭。由于将具有共同規律但同时还各有特点的两个历史阶段混淆起来,中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頁。

國理論家們製造了理論上的混合物，這個混合物把第一階段政治組織所具有的特點變成在完全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政治組織的特點。

同消滅剝削階級和階級對立一起，決定着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的必要性的條件也消失了。隨着剝削者的消失，對他們所採取的暴力也成為多餘的了，也就是說，為管束剝削者在社會內部建立起來的工具成為多餘的了。

在這方面，剝削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着根本的區別。沒有一個剝削階級本身是要消滅自己的階級統治的，因為階級統治是它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相反，工人階級是在自己作為階級消滅之前取消自己的政治統治的。隨着在社會內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的停止，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成為多餘的了。

從理論上，還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之前，這點就得到了證明。這一政治統治的過渡性，在1864年9月8日日內瓦代表大會通過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中，就以極為科學的準確性規定了下來。馬克思在一開頭就寫道：“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新的階級特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① 列寧也同樣在自己一系列的著作中，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性質。“危險（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作者）的消失，就意味着戰爭（即階級鬥爭。——作者）的終結、無產階級專政的終止，當然，現在我們誰也不會這樣夢想。”^② 當被推翻的剝削者瘋狂地反抗蘇維埃政權時，無產階級專政對除去這種反抗和作為階級把他們消滅是不可避免的。在復辟的危險消失之後，在社會內部的階級戰爭停止之後，由於社會主義建成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9頁。

②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第77頁。

的結果，无产階級專政國家將成為多餘的了。

中國理論家們認為，无产階級專政在消滅剝削階級之後也是必要的，以便“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关系。”^①

當然，工人階級在全民國家中還保有自己的領導地位。同最進步的生產形式相聯系的工人階級，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也是社會的天然領導者。在自己的發展道路前進時，工人階級將作為一個階級消失，與此同時，它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也將消亡。代替階級社會，將建立起既沒有階級，也沒有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那些組織的團體。

然而，无产階級專政的國家，只是對消滅存在着的剝削階級而不是也對取消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階級差別是必不可少的。階級差別的逐漸消失，不是使用階級暴力和消滅任何階級，而是通過在共產黨和全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來完成的。

中國理論家們特別頑固地強調國家的暴力方面，同時卻以沉默的態度避開了一個原則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達到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機構，在其發展中應該發生哪些變化。理論上避開這一問題和經常強調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

任何階級專政的必要特點，都是對被統治階級的暴力鎮壓。但是暴力自身不是目的，而是保持勞動人民政權、保留勞動人民的民主的工具，也就是保持大多數民主的工具。

無產階級專政之中的主要東西是民主和對勞動階級實行民主原則。無產階級專政給民主的實質和形式帶來了根本的改革，給在資本主義時期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里受壓迫和千

①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頁。

方百計地使之不能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被排擠在國家管理之外的勞動人民，开辟了通向政權的途徑。群眾的民主、剝削者的從屬地位、剝削者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摧毀，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內容。勞動人民的民主越廣泛，就越容易保持住剝削者的從屬狀態。

社會主義民主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是排除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使用暴力這一政權的特點的。這一步是在全民國家時實現的。政治暴力作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在全民國家時期是不存在的。剝削者的社會基礎縮小到什麼程度，社會使大多數人享有民主的國家變為全社會享有民主的國家所創造的條件就會達到什麼程度。無產階級專政向全民民主的轉變，必不可免地將引起由實現民主的新條件所要求的民主的形式和機構的變化。沒有剝削階級的民主，這就是全民國家時的民主。全民國家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比無產階級專政優越。這一優越性首先表現在民主的形式和機構的改變上。代表們按期地更換、居民直接選舉執行機構的領導機關、代表機關的罷免權轉變為選民的罷免權、直接立法——這些以及其詳細的形式和原則，都表明了全民國家向哪個方向發展。就其性質而言，它賦予無例外地吸引日益廣泛階層的公民直接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成為可能。沒有全體居民無例外地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就不可能有對共產主義關係的發展所必須的生產力的新的大規模的發展。只有用全社會的努力，才能建立起共產主義制度。

四

中國理論家們的原則性不同意見之一包括在下列一個意思之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只要是國家，總是具有階級性的；只要還有國家存在，就

不可能是‘全民’的。”^①但是，从哪里得出結論說全民国家丧失了任何階級特点的呢？这只有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国家的本质出发。不是階級的国家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作为階級的組織而出現、发展和消亡的。因此，全民国家也是階級的，但不是旧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作为一个階級对另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組織并不涉及全民国家，因为政治統治已经消失了。就这方面，它丧失了在此以前存在的国家組織的传统特点。然而，它沒有丧失作为国家的特征的階級組織的特点。在苏联社会中，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被消灭了，但是社会的階級划分沒有被消灭。还有决定着国家的性质的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与階級差別消失的同时，国家的階級特征立即改变了，直到最后同国家一起消亡。

作为全社会的組織，全民国家揭示了无階級社会的組織的最初的特征。随着共产主义关系的发展，国家将日益丧失階級組織的特点。因此，“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才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②在逐步取消階級差別的过程中，同时随着社会自治的发展，国家将丧失政治組織的特征，在最終阶段将逐漸消失在社会自治中。民主越是充分，則共产主义自治就发展得越快。一开始日益增多人数的公民，之后所有公民将无例外地习惯于管理，直到全社会都变成自治的团体。这就是辯证地把国家变成社会自治。

中国理論家們給全民国家对社会进步处于什么关系做了規定。他們使政治发展的过去的阶段向后退，并把它說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組織发展的界线，同时还作出全民国家是“历史的大倒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頁。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425頁。

退”^①的結論。

沒有向上的發展就沒有進步。國家是階級社會的政治組織，它經過發展的不同階段。從奴隸制國家開始到社會主義國家為止的一個國家制度被另一國家制度的歷史更迭，揭示了向較高發展的國家組織轉變的過渡階段。每一個后面的國家制度都比前面的更為進步。政治組織發展的每個階段，對決定着它的出現和發展的那些條件來說是必要的，在其他條件下則是多餘的。

對國家的發展來說，還有另一特點。每一個國家制度單獨來說，都有更發展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否定，不管它達到的成熟程度如何，它以更發展的制度和機構代替了資產階級議會制。社會主義國家是這樣一個政治組織，它從自己的第一個比較低級的階段轉變為第二個較高級階段，這樣就向政治組織更發展的形式前進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它的社會主義階段，而且是向較發展的國家組織全民國家過渡的階段。

從較低級的國家組織向較高級的國家組織轉變的歷史進程可以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的影響而延緩，但是正如蘇維埃國家所經歷的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的，它從來也不能被取消。在符合社會發展所達到的新階段的政治組織的發展形式下，比起在已成為多餘的和阻礙其發展的政治制度下，社會發展得難以比擬地較為迅速。

* * *

理論，甚至是歪曲歷史進程的理論，都是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產物。中國理論家們的觀點，是其國內存在的構成建立整個觀點體系的現實基礎的社會關係所產生的，是這些關係的精

^①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頁。

神蒸发。因此，在中国理論家們的理論中，辯护着的正是他們的实际行动的本质。

他們想要賦予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理論以包罗万象的意义。但是，它并不是世界革命运动的綜合表現。就中国领导人援引世界革命运动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言，他們根据中国的社会关系把这一经验改变了模样，尽管他們自认为超乎那些关系。在这样的真实基础上，产生了反对全民国家的批判。在革命詞句的掩飾之下，这种批判变成对理論中任何新的进展的否定。发展理論的权利被譴責为违反馬克思主义。而教条主义則变为思維的法則。这样一来，批判就达到了书刊检查的水平，这种检查應該停止理論思想的发展。

对于理論，正像对人一样，是就其实际效果来評价的，而不是根据他們自己說自己多么革命的宣言来評价。这里，不應該忘記，现在的经验仅仅是将来的前奏。目前存在的情况并不是每一个将来的社会情况。现实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历史朝向更发展的形式的运动，正排除一切障碍，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因此，中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将向官方理論家們現在誣为违反馬克思主义的全民国家发展。

(譯自1963年第12期保《新时代》杂志)

在反对分裂主义者的斗争中 我們將加强团结一致

《工人事业报》社論

昨天刊登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決議和苏斯洛夫同志在全会上的报告。今天本报又刊登保共中央全会今年3月21日的決議。在这些特别重要的文件中反映了两个兄弟党对克服分裂的危险、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关怀和努力——这也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怀和努力。

大家知道，在最近几年中（实际上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领导开始逐渐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它从前在一系列問題上曾经坚持的观点。特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以后，中国领导人的向后退更加强了。正如苏共中央全会決議所指出的，苏联共产党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历史意义，最近以来采取了一些新的步骤来克服或者暫且限制一下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間的分歧，来加强苏联和中国之間的经济政治合作。苏共中央的这些步骤得到了包括保共在内的其他兄弟党的支持。所有兄弟党共同的并且一贯的愿望是要制止中国领导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进程和他們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对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克服現有分歧、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深切的关怀和不倦的努力，中国领导人是怎样回答的呢？《真理报》本月3日报道說，自1963年11月以来到今天，即兄弟党停止进行公开論战，寻求克服

分歧的途径这一时期，仅在《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和其他材料，誹謗和謾罵苏共和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今年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令人激憤的标题：《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之下发表了恶毒的誹謗性和謾罵文章，而今年3月31日，这两家北京刊物又发表了新文章，这篇文章就其内容和腔調来讲，超过了中国领导人反苏宣传武庫中迄今为人们所知悉的一切。这些文章——用苏斯洛夫同志的話來說——同共产党人之間关系的起碼准則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对整个列宁的党、对全体苏联人民的侮辱。对此应当补充說，这些文章是对所有兄弟党、是对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的侮辱。因为怎么能评价2月4日文章中关于苏共“勾結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这种白痴的說法呢！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党在兄弟共产党的队伍的前列进行着斗争，保加利亚人民有权在革命人民中間占有地位。北京领导人为什么竟然这样厚顏无耻地对我們、对我們共同斗争的兄弟、对我們伟大的导师和盟国——苏共和苏联进行如此恶意的誹謗？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我国全体劳动人民从内心感到憤怒和厌恶，他們大声和坚决地抗議北京领导人的种种庸俗和誹謗性的狂罵和无賴式的侮辱！

中共领导拒絕停止不应有的論战和誹謗运动，他們不願意进行同志式的会談和寻求摆脱不正常局面的途径，这就最明显地表明，现在已经不能再談論什么两党間可能出現的分歧，这种分歧本来应该而且能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会談来消除的，而要談的是中国领导人公然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是他們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既定方針。苏斯洛夫同志

在报告中說得完全正确，他強調指出，“中国领导人为了掩盖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背离，最近拼命地耍花招、掩飾自己的目的和陰謀，令人厌恶地反复強調自己的‘革命性’、‘勇敢’、‘果斷’等等。但是，事态愈向前发展，中国宣传的調子愈歇斯底里，就愈加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的真正計劃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現在，中共领导在极端革命的詞句和口号的掩盖下，集中主要火力不是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主要是反对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成果进行疯狂的攻击，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

中共领导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沿着公开分裂的道路滑下去，现在已经走上“新的”立場，这种立場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托洛茨基冒险主义和大国主义奢望。中共领导人从这个立場上出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大跃进”的痛苦的折磨，这种“大跃进”倒真正是大跃退。北京从这个立場上出发对和平共处政策点起了大火，仿佛准备使人类在热核战争火焰中烧死。中国领导人从这个立場出发力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中破坏他們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团结。

显然，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政策和顛覆活动，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来说，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来说，是当代主要的危险。正如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決議中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使用了托洛茨基的方法：他們在自己分裂活动旗帜下糾集了各式各样的叛徒、被开除出党的人、寻找不坚定的分子和卖身变节者，以使用他們拼凑小集团和派别，来在兄弟党的队伍中和兄弟党之外进行顛覆活动。北京领导人力图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他們未能得逞，他們便恶化国与国之間的

关系，片面地拒絕相互提供已经商定的貨物，粗暴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等等。

正如保共中央全会的決議中指出，中国领导的分裂活动“給社会主义陣营带来巨大危害，給世界共产主义陣线的团結一致造成严重的威胁。全会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必須同中国领导人的有害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分裂活动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彻底揭露他們的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揭露他們的派別和顛覆活动”。

各兄弟党和全体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国家和建設新社会的全体劳动人民，在中国领导人的顛覆活动和分裂主义奢望面前，不能、也决不会默不作声和袖手旁觀。他們决不能容許，北京的狂妄行动把为夺取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多年斗争成果置于危害境地。他們决不能容許，中国领导人的冒險主义阻碍世界的革命运动，阻碍人类的进步发展。

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和我国的全体劳动者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決議。他們完全贊同以赫魯晓夫为首的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在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揭露它的敌人方面所进行的活动。我国的劳动人民坚定地、毫不动摇地拥护以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为首的保共中央，并将尽一切努力来贯彻今年3月21日党中央全会的決議，不惜力量地为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純洁和光輝而斗争。

赫魯晓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說得很对，在反对分裂者的斗争中，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結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他們通过这个斗争将更加得到鍛炼和壮大，他們将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历史性胜利。

（譯自1964年4月5日保《工人事业报》）

保共中央三月全會的決議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听取并討論了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米·格里戈羅夫同志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問題的報告。全會完全一致贊同報告作出的評價和結論。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確認，近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利用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停止公開論戰的機會，加緊和加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离，加緊和加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分裂活動。這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很大危害，給世界共產主義陣線的團結一致造成嚴重危險。全會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必須同中國領導人的有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分裂活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徹底揭露他們的教條主義、民族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他們的派別活動和破壞活動。

為了克服中國共產黨領導造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曾作了很多努力。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倡議，1963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行了兩黨代表的談判，由於中國領導的過錯，這次談判沒有取得結果。最近幾個月以來，蘇共中央委員會曾多次建議恢復雙邊談判，中國領導人對此遲遲未給予任何答复。為了給討論爭論問題創造更良好的局面和更心平氣和的局面，蘇共中央委員會建議停止公開論戰。儘管中國領導人沒有響應這一建議，而蘇聯停止了公開論戰。我國以及其他兄弟黨也都停止了公開論戰。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3年7月31日和8月1日

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呼吁中国领导人走上消除分歧、加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道路。我们党的领导一贯支持苏共、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和所采取的步骤。

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要求克服分歧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努力和步骤的回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加强派别活动，加剧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誣蔑运动。引起保加利亚共产党队伍严重担忧、不安和愤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停止公开论战的愿望和它的挑衅性声明：将继续并且扩大自己的分裂活动，继续并且扩大恶毒的反苏宣传和公开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分裂。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主要的危险是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各国兄弟党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造成巨大的困难。

在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越过了一切界线，他们完全背叛了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并且最终地制定了自己新的政治方针，企图强加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他们在分裂活动的初期，说只是在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上的某些问题上同兄弟党有分歧和不同意见，而现在他们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已走上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在有关时代、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在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一方、在以中共领导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分歧。中国领导人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顽固不化地继续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发展和加深自己错误的有害的“理论”。

中国领导人宣称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反对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和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和平倡议，给爱好和平力量在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方面造成巨大的困难。他们愈来愈执拗地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推动革命、通过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论点，以对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因此，他们同帝国主义阵营最富有侵略性和最反动的势力站在一个行列中，促使国际局势尖锐化、世界紧张局势加剧。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其活动中使用了最粗暴的蛊惑手段和两面手法。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并就某些问题取得互相谅解，加强并扩大同它们的经济联系和其他联系的时候，他们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修正主义”、“叛卖”；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接近甚至援助某些反动势力时，他们就把这说成是真正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

在对待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奉行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加深这条路线。在这方面，他们力图建立在他们领导之下的亚非阵线。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同苏联割开，并使之相互对立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竭力加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破坏活动，力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单独的组织等等。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他们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用反对所有的白人这个口号代替阶级观点。中国领导人为了使民族解放运动失去在其大规模胜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来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巨大援助和影响，他們首先給各国人民爭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带来最严重的危害。

中国领导人通过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着手建立派别集团的国际联盟，想以这个联盟来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此，他們公开号召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制造分裂，力图在这些党内建立反党集团，组织并联合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的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堕落的人、沽名釣誉的人和冒险分子，因为这些人能成为他們在派别斗争中的支柱。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机构以致警察，都在这方面給中国领导人以积极援助。为了掩飾自己的分裂活动和破坏活动并为之辯解，中国领导人还制造了一套关于分裂的专门理論，說什么分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合乎規律的現象，这种理論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根本违反历史发展的。

近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民主组织中进一步加剧了挑釁活动和分裂活动。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国代表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它們的工作，給它們制造各式各样的困难，詆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的意志和決議。

中国领导人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继续恶化这些关系。他們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阻挠它的整个活动和发展。由于中国领导的过錯，苏中之間的互助合作以及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同的互助合作大大削减了。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苏中边界进行严重的挑釁。

中国领导人为了誹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替自己錯誤和冒险主义政策而造成中国劳动人民处境恶化进行辯解，便捏造了所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恢复资本主义、资产阶級

化的假理論。他們甚至斷言，當世界上還存在帝國主義的時候，蘇聯沒有權利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在中國領導人看來，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越快，那麼，資本主義恢復和資產階級化的過程也越快，他們否認蘇共綱領并把蘇共的和平、勞動、自由、平等、博愛和幸福的偉大口號說成是資產階級原則。

中國領導人在其分裂顛覆活動中，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首先針對蘇聯、蘇聯共產黨及其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這不是偶然的。中國領導人敗壞蘇共和蘇聯的聲譽，是為了使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頭頭，使之瓦解，把自己的有致命後果的、有害的總路線強加於它。在反對蘇聯和蘇共的鬥爭中，在猖狂的反蘇活動中，他們的行徑，同過去和現在蘇維埃國家最凶惡的敵人一樣。他們的主要武器是最卑鄙的誣蔑，誹謗和捏造。中國領導人現在不知羞恥、毫無良心地散布駭人聽聞的指責和誹謗，硬說蘇聯同美國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來主宰和瓜分世界，硬說蘇聯和美國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硬說蘇聯力圖奴役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硬說蘇聯指揮着兄弟黨，等等。過去，中國領導人廣泛地強調蘇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援助，現在，他們則完全否認這種援助。他們對蘇聯和蘇共十分惱怒，竟然在反蘇活動中指責蘇聯黨的領導和國家領導。中國領導人用最大的瘋狂性保衛和頌揚有害的、永遠被摒棄的個人迷信。

保加利亞共產黨人認為自己神聖的國際主義職責是，斷然鄙棄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和蘇共的離奇的誣蔑和捏造並再次聲明，誰敢丑化和抹黑偉大的列寧的黨，他就要蒙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離者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叛徒的恥辱。

保加利亞共產黨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蘇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陣線的最強大和久經考驗的隊伍，它擁有最豐富的革命經驗，

并且是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列宁缔造和教育出来的苏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出最巨大的贡献的党。

同过去一样，保加利亚共产党今后仍将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同苏联共产党走在同一的行列中，并同它肩并肩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斗争。苏联的兄弟援助和日益增进的保苏友谊，过去和将来都是在我国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在不久前以托·日夫科夫同志为首的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签署的保苏联合公报中，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兄弟关系又一次得到了肯定，保苏友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会议再次表示全体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和我国劳动人民对强大的苏联及其光荣的党怀着深深的爱戴、忠诚和感谢，表示无限感谢和信任列宁主义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赫鲁晓夫同志，因为他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倦地为加强这个运动的一致和团结而斗争，他们并给予我国巨大的援助。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会议热烈赞同和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关于今年秋天召开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会议的建会议。我们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想推迟和延缓这一会会议的召开的企图，因为这会导致局面的复杂化，导致分歧的进一步加深。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会议以后的几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和胜利。它遵循会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巩固并扩大自己的队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和威力增长了。由于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以及苏联和整个进步人类斗争的结果，世界和平得到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

規模更加擴大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起來了。各國人民反對壟斷資本和反動派的一般民主鬥爭規模日益廣泛。

在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大搏鬥中，生活完全證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正確性。與此同時，生活是最好不過地證明，中國領導人的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政策是多麼錯誤和有害。

由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以堅定不渝地忠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出來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現在和將來都要始終如一地遵循這條總路線，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純潔性而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64年3月21日于索非亞

（譯自1964年4月5日保《工人事業報》）

誹謗者和派別分子 在共產黨員的法庭面前(節譯)

格·鮑科夫

世界共產主義報紙不斷揭露中國在對斯大林個人迷信問題上的立場的虛偽性。一些報紙指出，中國共產黨曾在自己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贊同譴責個人迷信的理論和實踐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現在又如此拼命地維護這種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極為格格不入的現象呢？看來，這是不難理解的。大家知道，在中國，個人迷信具有了很惡劣的形式。把一切都同毛澤東的活動聯繫起來，把他捧到天上。把毛澤東比作太陽，當作偶像，按照佛教和儒教的教典向他膜拜。他被封為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最有才華的詩人、學者、哲學家、戰略家。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醫學方面的成就，甚至連理髮館的成就，也都用毛澤東思想來解釋。中國報紙寫道，中國醫生們在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之後，治好了“痢疾”（請讀者原諒！）；為了研究一些導演問題，戲劇和電影工作者“研究了毛主席的思想。”不久前有一家北京報紙說：“本着不斷革命的精神，我們也鼓勵了敢想、敢干和敢創造的作風。我們在理髮館進行了技術改革和技術革命。如果我們能夠說，我們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就，那麼，這是我們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結果。”不久前《中國青年報》說，舉行婚禮的男女青年在毛澤東像前三鞠躬。學生和士兵們也摹仿這種禮節。人們被建議逐字逐句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掌握著作的智慧和精神。

（譯自1964年4月11日保《工人事業報》）

中国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节译)

薩·加諾夫斯基

显而易见,在我們的时代里,正如我們所說,超出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而变成左傾机会主义、变为別树一帜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教条主义代表是中国领导人。

中国领导人的“新路线”,不是像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所要求的那样建立在对现时代及其規律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主观主义意图的最专断的方式之上。他們的“新路线”丧失了具体性、效果和目的性,它沒有科学根据,是建立在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础上的。

中国领导人抱着主观主义的企图,想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蓄意企图以民族解放运动来对抗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这对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所有这一切有利于帝国主义,是站在我們时代基本的辩证矛盾的反动的一边。

中国领导人以民族解放运动来对抗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并且认为,它們沒有共同的利益,它們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沒有阶级态度,他們滾到种族主义立場,而种族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可怕敌人。

此外,中国领导人正在发展一种“新理論”,根据这种理論,目前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穷国和富国之間,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間的矛盾。这个“新理論”是完全反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論。它抹煞对现时代的看法采取阶级态度,把資本主义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同起来，以民族的种族特点来代替阶级差别，灌输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不信任。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反对中国领导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新“理论”，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反对他们的新“理论”的还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历史。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这一“理论”是错误的、专断的。它不但暴露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信任，而且还暴露了他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观强求。

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不了解我们时代基本的决定性的辩证矛盾、不了解它的本质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中国领导人错误观念的主要哲学根源之一，是他们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

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在反对“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平主义”的响亮词藻下，事实上力图实行自己的、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所谓不断革命、通过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推动”革命的概念，否定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

当然，中国领导人口头上是赞成和平共处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否定它并且反对它。重要的不是口头声明、而是中国领导人的概念的实质，由于这种概念，不可避免地得出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过战争也包括用核火箭战争来“推动”革命的论点。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理解时代的性质和它的规律，因而不可能理解和平共处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和平共处是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它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斗争

的途径，是解决矛盾的手段。

中国教条主义者不同意把和平共处作为总路线，而宁愿进行热核战争，以便通过一场人类的核灾难来解决矛盾。他们实际上把准备发动世界战争来推翻帝国主义看作是革命性的最重要的准则。

中国领导人由于主观主义自负低估，或者根本不理解，热核战争对于他们的人民以及对全人类的可怕后果，他们不愿重视，也不想理解，热核战争不可能是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手段，以及这种手段完全不符合追求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劳动人民缔造幸福和安宁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观念已经不只是严重的错误，这已经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犯罪和背叛。

按照中国教条主义者的逻辑，战争可能比和平共处政策更快地导致帝国主义的消灭。由此可见，他们实际上认为，新的世界核战争是我们时代的革命进步的发展，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不可避免的形式；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狂人”的立场上，即：靠热核战争来解决矛盾，但是这对帝国主义有利。

在自己的宣传中，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公开地力图败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声誉，这是符合他们分裂主义的目的的。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发生争吵和误解，他们竟不耻于利用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谎言和诽谤。

这样，中国教条主义者从关于我们时代的完全错误的方法学的哲学概念出发，低估热核战争的惨重后果、对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和对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教条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說

法，事实上，他們是否定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实际上是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我們时代的对抗矛盾方面加强进步的社会主义趋向、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他們以此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而走上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

中国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新的总路线”以及他們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强加于其他党的作法是完全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辯证法的，完全违背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量变和质变的。它完全违背科学、社会进步、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爱好和平的全人类的利益。这是一种冒险主义的、不負責任的、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在現代最主要的問題上，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場同唯物主义辯证法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其他基本法則相对抗，同关于否定之否定法則相对抗，这也暴露出他們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学。

由此可見，中国领导人的“新的”总路线，是名符其实的非科学的、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及其第三法則——否定之否定是无共同之处的。它不去促进社会进步，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人类的幸福和美好（这正是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陣营的任务，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政策的任务），反而实际上把人类引向火箭—核灾难。这条路线有利于当代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并为它們效劳。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新路线”，今天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險。这就是为什么必須不仅同右傾机会主义，而且首先要同中国领导人的左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原因。

（譯自1964年第3期保《哲学思想》杂志）

个人迷信思想的保卫者 和传播者(节译)

維·多布里揚諾夫

中国共产党领导过时地维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其攻击苏共、攻击共同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基本项目之一。

既然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是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原则性问题，既然保加利亚共产党以苏共为榜样，在克服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迷信，恢复党和国家领导的列宁准则方面进行过坚决的斗争，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中国教条主义者恢复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使共产主义运动倒退到老的迷信的立场的企图采取行动。

中国领导人维护个人迷信的任务不仅是要证明斯大林正确。他们暗示兄弟国家不接受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把那些正在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亚非国家，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毁灭性道路。

中国领导人为斯大林个人迷信洒下的鳄鱼眼泪，不过是个烟幕而已，想掩饰中国茂盛成长起来的个人迷信的莠草。中国共产党迷信作法的表面形式首先表现了过份颂扬和盲目崇拜毛泽东。在结婚的时候，也向毛行礼，外科手术的成就也被解释成“毛主席思想”，宣传机构叫个不停并且暗示，一切都应感谢主席，一切都可以解释成毛的英明，因此，宣传机构推荐并要求反复阅读他的著作，要背得烂熟。多年来，就提示，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体现”，“毛泽东主义”是现代的列宁主义等等。

中国领导人吹得天花乱坠，說他們发揚了民主，可是他們又大力保持他們在党内建立的不能忍受的制度。“汇报”是中国党和国家多年发展的一种制度，汇报的时候，每个党员应当系統地向书记报告，或者准确地向书记白白这一切：看到的，听到的，談到的等等，造成一种告密和对談真实信念的恐怖气氛，不让共产党员影响党的路线。而那些一贯站在国际主义立場上的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來說，仍然不明。

对党生活和国家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則和准則的彻底践踏，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的发展。讓我們看一看所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針。这种社会試驗是空前的毫无根据、主观主义和具有空前的严重后果和冒险主义。在沒有得到党和人民的許可，沒有科学研究，就突然宣布这种試驗。試驗的失敗是如此迅速，同大张旗鼓地宣传試驗的开始截然不同，他們閉口不談試驗的失敗。只有貧困的经济、瓦解的经济和失去信心的工人和农民才是对毛澤东迷信的思想和行动的起訴书。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做了仔細的分析后說明，中国领导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当然，中国曾实现了工业国有化，为了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群众利益曾实行了一些措施。但是，正像庫西宁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令人信服地所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中国工人階級在国家政权系統中沒有地位——馬克思列宁主义給工人階級确定的地位。”中国领导人把农民，而不是把工人階級看作是自己主要的支柱。按照思想和社会的涵意來說，中共领导的現行政策是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的偏向，而就其直接的表现和所执行的政策，是毛澤东迷信的专政。

毛澤东领导的現行政策，集中表现了个人迷信时期最恶劣

的一切，这一政策同社会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是与各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

在三月举行的保共中央全会指出，在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估价确定了我党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义者的始終不渝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这一估价表现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整个工人阶级、全体人民对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纲领性的文件的忠实，也表现了我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的支持。

(譯自1964年6月18日保《工人事业报》)

沿着格·季米特洛夫的道路，走向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节译）

勒·阿夫拉莫夫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分裂与破坏活动中，主要的打击首先是指向苏联、苏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当然，这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謾罵苏共和苏联，企图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首領并使它混乱，把自己极有害的总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管听起来是多么奇怪，但是，他們在反苏、反苏共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同苏維埃国家最坏的敌人过去和現在的作为一样。忠实于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遺訓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最坚决地摒弃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駭人听闻的誹謗和捏造。

（譯自1964年6月19日保《工人事业报》）

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柱 和可靠的盾牌(节译)

伊·多涅夫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拼命分裂当代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使这些力量彼此对抗，唆使它们反对苏联。他们尤其热中于使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使新兴民族国家与苏联相对抗，毫无根据地否定苏联对被奴役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以及对加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无法估量的援助。但是，中国分裂者的诽谤是一回事，而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中共领导人想以“左”的詞藻和响亮的口号把自己說成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民族解放革命的唯一“真正”拥护者，把自己說成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唯一的“真正”支柱。但是，在这些响亮的詞藻的背后看得出他们所追求的是：使正在为本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脱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支柱和兄弟般的无私的支援，把它们引到冒险主义的危險道路上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民族解放运动，并利用它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欲望服务。

然而，中国领导人用响亮的革命詞藻和廉价的自我吹嘘欺騙不了任何人。除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左”的詞藻和响亮的口号之外，被奴役的各国人民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相反，尽管北京进行“革命”叫喊，但是，一些事实不能不使他們产生印象。例如，不能隱瞞这一事实：几乎中国所有还未彻

底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邻国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边界冲突，并且要把“非法掠夺去的”领土让给它。所谓的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即当世界被置于热核战争深渊威胁的面前，当古巴人民面临着来自美帝国主义者侵略危险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入侵印度，从而用武力解决自己同它的领土争端的最好的机会。北京的“不断革命”的战略家显然指望：在1962年10月，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为进一步实现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计划扫清道路。但是，战争没有爆发。甚至连美国帝国主义集团都比北京明智。全世界由于这次原子风暴从我们的星球刮过去了而松了一口气。中共领导人狂怒了，因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美苏没有发生冲突，它们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亚洲领土的唯一主宰者、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决定性力量的希望落空了。怒气冲冲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进行“攻击”，更加狂妄地诽谤苏联。它被指责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在古巴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表现出“背叛行为”。

中国领导人很早以前就把帝国主义说成是“纸老虎”。但是，如果“纸老虎”的确没有使北京好战的战略家害怕，如果他们不会指望借他人之手火中取栗，那么，他们早就会给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做出榜样，把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赶出中国的领土香港、澳门和台湾了。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即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不是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拿来对准帝国主义，而是用来对付苏联，他们对保卫古巴没有做任何事。

中国领导人自命为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建立强大的能够抵抗帝国主义者奢求的独立国家而斗争的最真诚和坚定不移的后盾。但是，他们的这些空话很难同他们所施加

的压力相吻合，例如，压印度尼西亚給予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华侨，尤其是中国商人和高利貸者以特权。类似要求同他們所提出的各国的民族主权是完全違背的。他們沒有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团结，沒有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奢求的斗争中变得更加强大。在一个国家里給这个或那个民族集团以特“权”不会使它的基础得到巩固，而只会使它动摇。

动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团结一致，并使其与新兴的民族国家相对抗，不管中共领导人願不願意，这将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增加他們进行侵略的可能性，向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国家人民进攻，使世界和平遭到威胁。

北京分裂主义者妄想挡住历史車輪的前进，分裂和削弱反帝反殖的力量。他們无理地（他們在自己的分裂活动中已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宣布苏联不是亚洲国家，从而无权参加亚非国家會議。这种蠢話的荒謬性一戳即穿。只要看一下地图就明白，苏联不仅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只要粗略翻一下亚洲近代史就明白，在我們星球的人口最多的大陆上，任何一个重要問題沒有苏联的参加并注意到它的意願，都不能解决。还不仅如此，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內，沒有苏联直接或間接的援助都是不能摆脱奴役枷鎖的。

中国领导人力图把苏联孤立于亚非团结組織之外。他們竭力分裂国际新聞組織，分裂世界工会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按照种族特征把北京分裂主义者所领导的其他亚非組織与它們相对抗。在所有的情况下他們的目的是：孤立苏联和其他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政策的国家，建立自己的領導权，并利用这些組織为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服务。然而，許多事实却表明北京沙文主义者的欲望落空了。他們到处遭到应有的回击。

（譯自1964年第7期保《新时代》杂志）

爭取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結！

《工人事业报》社論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进行集体审議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沒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話，都不得阻碍會議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別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會議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伸出来的民主原則共同解决涉及到我們整个运动的各种問題。

在从昨天发表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給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里摘引出来的这几句話里包含着·一个极端正确的和唯一有建設性的基础。在解决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所产生的差异和分歧，或是在这种或那种国际局势下确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的相互关系只能，也必須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今年3月21日举行的保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热烈贊同并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天举行各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建議。正如全会的決議所說：“我們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想推迟或延緩这一會議的召开的企图，因为这样会导致局面的复杂化，导致分歧的进一步加深。”

的确，在今天的局势下，像中共中央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拖延“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会造成什么結果呢？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中继续誹謗苏共“一心要同美帝国主义結成

聯盟”、“宣布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大阴谋——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諸如此类令人憤慨、使人厌恶的舌战，会造成什么結果呢？显然，如果中国领导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放纵不羁的无原則論战和誹謗性宣传运动，如果他们拒絕停止攻击和詆毀的行为，如果没有任何意願来举行双边的严肃的会談和从他們方面作出真誠的努力逐步消除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的話，就是有意加深分歧，加剧党与党之間的关系，如果不是有意进行分裂，也是有意准备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由于1960年以后的四年中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召开像1957年和1960年會議那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會議，已成为必要的了，各国兄弟党代表有必要集体地創造性地分析世界上经济、社会政治的新現象和过程，深入地评价变化了的和继续变化着的和平与战争这两种力量之間的对比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两个世界社会制度之間和各国之間的相互关系，协调对国际发展基本問題的評價和立場，根据这些来总结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共同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

毫無疑問，为了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为了保证这次會議为社会主义与和平陣线的巩固和团结做出富有成果的工作，必須做好細致的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正如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建議的那样，首先是停止論战，使中国领导人停止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誹謗性的运动，放弃兄弟党的队伍中的派別活动和分裂活动。的确，中国领导也在讲，在召开国际會議之前必須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但是，事实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广泛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在于糾集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节者和叛徒，組成反党集团，甚至还給

其中某些集团貼上“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标签。使人不得不相信中国领导的这种“准备工作”是力图建立尽可能多的听命于北京的反党集团和“政党”，把他們糾集在一个集团中，同他們一起出席會議以达到把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强加于人的目的。显然，中国领导人因此需要四、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所說的“广泛的准备工作”并不是为了會議开得成功，有利于共产党和兄弟党的团結一致，而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分歧，甚至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难道这点还不清楚嗎？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一贯站在牢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以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进行活动，并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团結一致，为一切爭取社会主义、民主和世界和平、反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剝削、反对奴役和黑暗势力的力量团結一致而努力。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現在正是抱着这种立場和以这种精神竭尽全力制止中国领导人所从事的，公然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陣营、违背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利益以及殖民地国家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有害傾向和行动。从这种立場出发，由于受到了为爭取社会主义、民主和世界和平斗争取得更大成就的願望所鼓舞，我們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尽快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这样一个能够、而且应该导致消除分歧、达到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結以有利于我們共同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會議的建議。

（譯自1964年7月17日保《工人事业报》）

中国领导人阻挠各国 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节译)

鮑·彼得科夫

首先,中国领导人不真实地罗列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广大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不承认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两次莫斯科会议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阶段所作的估价和评述,公开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歪曲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前途和任务。按照他们的说法,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民族解放运动。

硬说什么,今天,当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已经大大提高了的时候,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及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说什么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范围里来,即转移到刚刚出现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离开阶级立场、不承认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布朗基主义的革命概念作出主观评价,并且加以宣扬。这种论断是北京的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点、种族主义观点和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的萌芽和表现的劣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地开展创造了新的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使这种革命的规模、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给它们的发展揭开了新的前景,中共领导人不但不能正确地估计到这一切,甚至利

用这一切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

中共领导人装出一付为各国人民自由而斗争的唯一保护者的姿态，他们闭眼不看起码的真理，即随着民族解放斗争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社会历史进程这两股强大的洪流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形式也起着变化。

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不能、也不愿意理解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间的一致性。他们成了领袖欲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和企图的俘虏。为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中争取威望，中共领导人公开奉行这样的路线：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使刚解放了的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而首先是苏联对立起来，使中国成为这些国家团结的中心。他们的这种政策具体地反映在：他们拒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商定的决议，顽固地把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思想强加于人，在各国共产党中间、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党中间进行分裂活动和派别活动，对苏共和其他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肆诽谤和诬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把革命中心转移到东方的概念并坚持宣扬“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难道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政治霸权的目的吗？难道说，他们散布自己的那套“自力更生”、中国和被欧洲白人奴役和剥削的亚洲、非洲各国人民在利益上有“历史的”共同性等理论还有其他什么目的吗？（这就是周恩来在走访亚非国家时讲话的主题）

从走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公认的先鋒队——苏联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和不诚实的政治思想斗争的道路以后，中共领导人更加不择手段了。最近时期，他们有计划地、一个劲地力图煽起刚解放了的国家人民的民族主

义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偏見，千方百計使他們同自己最忠实最眞誠的朋友——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例如，在莫希举行的亚非团结国际會議上，中国代表对亚非国家代表說，对“白种人”——俄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不能有什么指望”，因为他們“一直在同白种人——美国人談判”，而召开第二次万隆會議的筹备會議上，中国外交部长公开声称反对苏联参加會議，因为它“不是亚洲国家”。中共领导人不仅阻挠一切进步的群众性的国际組織的工作，而且着手建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分裂主义的組織（工会、青年、妇女、新聞工作者等等），以便使它們同原有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积极参加的世界組織相对抗。

不难理解，北京分裂主义者的理論和实践不仅不能促进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开展，相反，削弱了民族解放的力量，妨碍他們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确定方向，妨碍他們团结起来、組織起来和順利地进行反对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譯自1964年7月24日保《工人事业报》）

苏联共产党是創造性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节譯)

保共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意识形态委员会
扩大会議的材料

格里戈罗夫同志在报告中詳細地談到关于苏共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他指出，就在現时代，苏共完全不辜負其他兄弟党的高度信任，它无愧地起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大家公认的先鋒队的作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的作用。它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而进行着不倦的斗争。它目前在揭露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以及他們的分裂顛覆活动方面的功績是特別巨大的。这就是苏联对所有兄弟党的非常宝贵的支援。

保加利亚共产党坚定地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对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傾向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它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及其分裂活动。在当代的一切問題上，我們党同苏共、同絕大多数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完全一致，我們党坚决支持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建議。

(譯自1964年8月9日保《工人事业报》)

在艺术上也是庸俗化者(节译)

——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的特殊方针

《人民军报》编辑部文章

这个方针是中国领导人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教条主义狂热到极点的必然的继续。这种狂热的行为，也被带到了文艺创作领域。攻击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它是在自命不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1956年）开始的，后来被修改为：“我们宣布反对一切毒草。”（1957年）这就是对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所作的独特的辩解。忠于共产主义的作家都被划入“毒草”之列，随之而来的“劳动改造”措施是把马克思主义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它与创作者必须联系生活这一点毫无共同之处。

在《北方文学》杂志（哈尔滨）上详细说明了的对现代题材的恐惧心理也扩大到西欧古典文化遗产上来了。伪善者很善于进行这种活动。中国活动家断言，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萧邦、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反映孤独的知识分子的哲学的东西（《文汇报》1963年1月9日）。一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又大肆攻击了歌剧《里戈莱托》中的公爵叙事一歌和同名歌剧中的卡门咏叹调，说这些是颓废的东西。

提出使各种艺术“中国化”口号是积极宣扬民族主义的直接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贯重视文艺的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是以民族的形式发展着的。中国的理论家们忽视使各民族文化相接近的要求，而使它朝着与世隔绝的方向发展。对

待历史题材首先就这样作了。认为历史题材有宣扬中华民族特别伟大的作用。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好战精神是群众歌曲的特点。这些歌曲的标题就是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特殊概念”的产物。在郭沫若的《和杜波依斯博士问答》和程光锐的《和馬雅可夫斯基谈话》两首诗里谈到，北京今天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地球上能够找到避难所的唯一的地方。

令人奇怪的是，最近几年，真正的国际主义题材在中国的文学中已经绝迹了。同西方各国人民的文化有关的一切全被取缔。同时对待苏联的一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把它看成是西方的东西。大规模地采取了文化隔绝的行动。正在造成一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心理，把战争描写成是儿戏。宣扬“实力地位”，这在《地雷战》、《红日》、《停战以后》等影片中得到了反映。

创造者有意识地避开文学中的现代题材。强加于人的标准要求创造无个性的人物，因此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意见，描写某个人的命运就是修正主义。公式化的人物是他们美学的理想。

雷锋就是这种放弃个人利益和禁欲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拼命赞扬对毛的崇拜。现在已经不是像往常那样同太阳相比了。现在是太阳同他相比了，甚至太阳也比不赢了，因为它只是白天发光，而毛的思想却不间断地照耀着人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就是这样灌输到人民的意识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把经济方面的方针机械地搬到艺术创作上来。“大跃进”也强加于文艺方面。报道了在一天之内或在一个晚上写出许许多多作品的消息。这就导致在所有文学中都存在着赶时髦、简单化，导致公式化和投机的现象。

中国的理论家们正是从他们这种唯心主义庸俗化的概念出

发,攻击苏联的文学和艺术。斯米尔諾夫在《答文艺报的批評家們》一文中,詳細地分析了黎之和張光年的投机行徑,他們利用讀者的无知,誹謗了許多苏联詩人,把不存在的缺点归咎于作品,企图丑化丘赫萊依的影片。

这就是中国活动家的“特殊方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針。这种方針同真正的革命性和艺术創作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必遭失敗。

(譯自1964年8月13日保《人民軍報》)

召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會議！

《工人專業报》社論

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和迫切的問題。在討論这一問題的过程中，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共产党已经指出召开这种會議是完全必要的。《真理报》最近发表的社論，再次表示了苏共的立場。苏共的立場是明确的坚决的，召开會議是必要的，必須进行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

我們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完全贊同主张必須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立場。在今年3月举行的討論有关中国领导人有害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分裂活动問題的中央全会的決議中，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指出，中央委员会热烈贊同和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會議的建議。《真理报》社論对目前形成的局势作了深刻的闡述。提出了关于召开国际起草委员会（委员会12月15日在莫斯科开始工作）和关于在明年年中举行国际會議的具体建議。我們党中央委员会贊同这些建議，并将积极参加會議的准备工作以及會議本身的工作。

召开新的国际會議的必要性原因何在，为什么它的必要性成熟了？首先这是完全符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这两个文件強調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国际會議是在爭取共同目标胜利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場的有效形式。从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以来过去将近四年了。这是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期間在世界上，在党和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必須在国际共产党會議上加以討論的重要变化。此外，出現了以中共领导为一方同絕大多數

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另一方之間的深刻分歧，这就使召开會議更加必要和不容拖延了。各兄弟党、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团結、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筹备和召开會議，以便集体討論迫切的問題，寻找彼此能够接受的解决問題的办法。

有着充分的，甚至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以勇敢地筹备和召开国际會議。但是，目前，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主张召开會議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而中共领导人却坚持对抗的立場。他們要求四、五年后才召开會議，并且蓄意地开始就会議的筹备工作挑起了糾纏不清的爭論，以便使會議根本召开不成。由此可見，在中国领导人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粗暴地践踏了两次莫斯科會議的思想立場，采取反列宁主义方針以来，他們現在又抛弃了同其他党的集体协商和召开會議，践踏了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共产主义运动明确的組織原則。

为了拖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召开，中共領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說“准备不充分”，沒有充分进行协商，在召开會議以前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归根到底，这些理由都是毫无根据的。今天，每个誠实的共产党人都很清楚，問題不在这里。原因是，中共領導拖延召开會議，爭取時間，保持活动的自由，以便继续搞分裂活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战线与和平力量的团結。

新的會議，实际上将是继续上两次會議的工作，同时两次會議的決議——宣言和声明将是它的出发点。除此以外，會議將討論和闡明几年来发生的新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問題。因此，維護共同文件、主张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希望它用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每个党、每个共产党人，都支持苏共关于召开国际會議的建議。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历史表明，它历来为自己的团結

一致，为革命理論的純洁性进行着斗争，并且不断前进。我們党——世界上最老的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过去和現在都积极参加这个斗争。它在反对形形色色的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傾向的斗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們党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学說，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它过去、現在和将来都要同苏联共产党牢固的兄弟般的友誼和紧密团結地并肩前进。保加利亚共产党为筹备和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将不惜自己的力量。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深信，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克服現存的困难，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取得新的胜利。

(譯自1964年8月14日保《工人事业报》)

中国领导人的两面性、自相矛盾 和十分无原则性(节译)

《工人事业报》编辑部文章

中国领导人不顾苏共和其他馬列主义政党提出的停止公开論战、克服分歧、筹备和召开兄弟党會議的恳切呼吁，继续发表和散发大量的恶毒攻击、侮辱和誹謗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中共领导人在他們的誹謗运动和斗争中远远离开了兄弟党共同制訂的莫斯科會議文件。事情越进一步发展，就越加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率領人們越来越脱离革命的路线和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十分无原则性，陷入小资产阶级取消派的泥坑。

当中国代表在莫斯科會議文件上签字时，他們承认有必要在今后协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行动，而且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會議对討論迫切問題和在共同斗争中制定一致观点的有益作用。但是，在中共领导采取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以后，它对召开国际會議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反对召开这种會議，尽管絕大多数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召开會議，并把會議看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迫切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正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样，中国领导人的十分自相矛盾和无原则性是很明显的。今天他們支持一个口号，而明天他們支持另一个口号；今天他們有一种观点，而明天他們又有另一种观点；他們就是以此来符合他們的反苏奢望、他們的分裂活动和爭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

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生活中的整个思想立场和行为证明他们根本离开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他们不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实质上，他们力求分裂它们，以便推行独树一帜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他们不是加强发展中的国家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合作，而是燃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他们不是赞同在国际民主组织和运动中兄弟党的统一路线，如同宣言和声明所要求的那样，而是推行自己的路线，加剧分裂主义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的各个发展阶段，不仅同旧世界的势力，而且同自己队伍中的思想敌人、同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尖锐斗争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颠覆活动，用伪装的革命性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给兄弟党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严重损害。但是他们在理论原理和实践活动中的无原则性、不一贯和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不断地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揭露，这些党进行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和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而斗争。也正像过去一样，所有脱离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学说的人往往是在思想上被历史发展全部进程所粉碎和抛弃，而现在这些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我们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人们也将落得如此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将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前进，并将取得新的、更加巨大的胜利。

(译自1964年8月25日保《工人事业报》)

北京玩忽各国人民的命运

《工人事业报》评论

大約在二十天前，西方出現了毛澤东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談話的消息。这位中国领导人在談話中发展了众所周知的所謂“中間地帶”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他肆无忌惮地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位于苏联东海岸的千島群島的要求，他自己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分割广闊的苏联領土并把这些領土归并中国的要求，同时又提出——又是直接或間接地——重划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領土的問題。

不久以前，理智的人們还不相信这一消息，甚至那些直接观察到和清楚了解中国领导人背离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立場的人也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毛澤东所說的話超出了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所有可能和允許的界限，——当然，即使北京领导人的概念和意图还能称为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話，——而进入了最肆无忌惮的大国民族主义和种族扩张主义的范畴。

然而，共产党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們十分痛心地和无限憤慨地得知：中共主席的确发表过由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上載述的駭人听闻的談話。这番話反映出中国领导的政治路线——在“中間地帶”和扩张主义要求(同日本反动派一道)的幌子下同日本垄断集团和西欧帝国主义者拉关系，从而掠夺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大領土，别有用心地企图煽起社会主义陣营国家之間的边界和領土爭端。《真理报》在本月2日已对中共

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这一最新的反苏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作了应有的答复。兄弟机关报的文章以深刻的分析和不可爭辯的論据揭露和駁斥了毛澤东的怀有敌意的言論。

毛澤东对日本一批社会党人的談話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北京領導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苏和反人民的概念和意图，从实质上彻底揭穿了他們的忠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假面具，揭穿了他們的不妥协的革命者和反帝战士的假面具。他們戴上这些假面具是为了迷惑和欺騙中国和外国的轻信者和天真者。

越来越明显，北京的領導竭力想同日本垄断集团即毛澤东贊为日本民族的那种力量建立联盟。毛澤东称赞地說，日本民族“进行了反对美英的战争，袭击了珍珠港，侵占了越南、菲律宾、泰国、馬來亚、印度尼西亚，說它的进攻曾到达印度的东部边界”。他“巧妙”地避而不談这个“伟大的民族”通过日本垄断集团和軍国主义分子曾经占領并蹂躪了大半个中国。毛在呼吁北京与东京之間“团结、合作与互助”的同时急于向其帝国主义的伙伴們“偷偷地提出了”苏联的領土——千島群島。中国領導人在日本垄断集团面前所做的过于恭維的姿态就是这样的。

然而，他也向西方——向他心爱的欧洲“中間地带”的伙伴，特别是向西德卑躬屈膝。人們不难想像，北京实际上否认由于战胜了希特勒侵略者和有必要确保社会主义陣营的独立和防止来因河两岸尚未被消灭的垄断資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可能的新的侵略而在东欧建立的边界，这对波恩复仇主义者來說是一剂多么好的定心丸啊！正是为了取悅于美国在波恩的最忠实的盟友，毛澤东才提出了現在已不存在的东普魯士問題（这里包括了直到奥得—尼斯河的波兰西部的地区），并断言說，这块領土是作为所謂“补偿”合并于苏联的波兰土地而轉交給波兰了。而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毛談話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即如

果“补偿”的借口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东普鲁士”就会恢复“德意志帝国”的旧边界。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呢？北京领导人甘愿蹂躏这些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如果能够争取到波恩帝国主义者充当中国在它臆造的“中间地带”的范围内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的话。可以设想，最肆无忌惮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狂妄的将军们是怀着多么满意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的心情搓手称快啊。他们自己是不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打开缺口的，可是，现在北京来给他们帮忙了……

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说：“苏联的土地面积为两千二百万平方公里，而其人口为两亿……日本的土地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而其人口为一亿。”这是什么意思？你会开始感到，希特勒从坟墓里站了起来重复他的关于必须把苏联的人口稀少的领土分给九千万德国人作“生存空间”的种族纳粹主义的说法……这岂不是在号召日本，号召中国人民，号召黄种人起来远征，到苏联争夺“生存空间”吗？的确，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想法和疯狂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是由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要求产生的。尼·谢·赫鲁晓夫说得完全对：“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中国领导人甚至就领土问题提出奢求，提出几乎要瓜分苏联的领土”。

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意图现已暴露无遗。无止境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肆无忌惮的大国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扩张政策、对远近国家人民的领土和利益的史无前例的侵犯——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政策和活动的实质。这一切的根源，是不难看出的。理论上的紊乱和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经济建设上的庸碌无能、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无望和失去信心——这一切由于迷信专制的领导方法而倍增，把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推上

了对自己的邻国实行大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扩张主义的途径。而关于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性和反帝斗争的言論,已经无法掩盖北京反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反对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令人憤慨的意图和行径了。

《真理报》本月二日的文章說：“一切珍惜社会主义利益、保卫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人不能不最坚决地譴責中共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譴責他們在涉及各国人民命运的問題上进行玩忽。”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我国的劳动人民坚决支持这一评价,同时无保留地响应譴責中国领导人的危险观点和敌对行动的呼声。

(譯自1964年9月6日保《工人事业报》)

在保德友好群众大会上 的讲话(节译)

托·日夫科夫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和派别活动，他们反对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制订的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总路线，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的纲领强加于人。同他们的公开争论主要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问题，而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和和平、各国人民的未来的命运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

中国领导人还不惜污蔑伟大的列宁的党和国家。他们毫无根据地企图煽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上的敌视，特别企图修改苏联地图，这证明，中国领导人背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情况达到何等地步。

(译自1964年9月19日保《工人事业报》)

第一国际的遺訓(节譯)

科·巴伊琴斯基

各国共产党遵循着第一国际的遺訓，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团结一致。但是，中国教条主义者叛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他們企图把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于人，企图把社会主义各国的边界从和平友誼的边界变成民族冲突和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它的天然的同盟軍——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割裂开。他們想用暴力的辯解詞句来代替光輝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用軍事行政命令的和个人迷信的方法，以及对毛澤东个人的神化来代替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

共产主义运动早在第一国际成立时就不动摇地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論，同左傾学究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同右傾机会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忠于第一国际的遺訓，給予中国教条主义者和所有民族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并高高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各国共产党、所有反帝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的旗帜。

(譯自1964年9月27日保《工人事业报》)

卓越的紀念日(节譯)

《工人事业报》編輯部文章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給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有效的经济支持。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二百一十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为汽車工业、化学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建設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还建立了国防工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給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兄弟般的无私的经济帮助。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援助，在工业、农业和文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确信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順利发展，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活动所破坏。中共领导致力使中共和中国人民完全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兄弟家庭。中共领导以极其不体面的方式誹謗列宁的党——伟大的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头队伍，向苏联提出領土要求，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世界地图上消灭。中共领导人竭力离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建立自己的分裂派別，唆使它們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世界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

(譯自1964年10月1日保《工人事业报》)